

當代港澳

STUDIES ON HONG KONG & MACAO



2000

第1期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出版

当代港澳
2000 年第 1 期
(总第 14 期)

目 录

主 编:

许锡挥

郑佩玉

副 主 编:

周运源

孟庆顺

郭天武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

电 话:

(020) 84113279

传 真:

(020) 84036749

邮政编码:

510275

出版许可证:

粤 O 第 1105 号

刊 期:

逢 6 月 15 日

12 月 15 日出版

本期出版日期:

2000 年 5 月 15 日

百家 论坛

世界经济区域化与港澳珠经济合作 陈广汉 (1)

香 港 研 究

国际资本在香港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林江 戴锦辉 (4)

香港服务业发展前景展望 陈丽君 (9)

香港政府解决失业的对策及对广州的启示 孟庆顺 (14)

香港医疗卫生服务在回归后的发展与变化 蒋廉雄 (18)

香港住房政策的发展: 政府角色的变迁 王小宁 (20)

试论中国加入 WTO 对香港经济的若干影响 刘清溪 (23)

专 稿

战火中的“世外桃源” 许锡挥 (26)

澳 门 研 究

中山大学的澳门研究 中大港澳研究中心 (30)

试析澳门外贸行政管理的产地来源制度

..... 林锦峰 吴锦松 (32)

澳门金融业的现状和发展路向 程 静 (36)

浅析澳门的文化精神及意义 曾清慧 (39)

澳门经济转型中工业企业的发展 孙 昭 (43)

内 地 与 港 澳 关 系 研 究

依托内地粤港合作推动中药现代化发展 郑佩玉 (46)

论新时期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中的若干问题 周运源 (51)

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特征与形成机制

..... 毛艳华 郑天祥 (56)

对粤港澳经济研究中的一点思考 袁持平 (60)

粤港合作发展老人服务问题的分析 黎熙元 周 静 (63)

香港与澳门固定汇率制度的宏观经济学比较 张继东 (66)

新时期珠澳经济互补合作再认识 邓咏莲 (70)

本刊重要启事 (31)

世界经济的区域化与港澳珠经济合作

陈广汉

【内容提要】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的区域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以香港为中心,珠江三角洲为腹地的港澳珠“增长三角”已发展成亚洲地区充满活力的经济区。本文探讨了新一轮世界经济区域化的特点,并从功能性经济一体化和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深化港澳珠合作领域和提升合作层次的思路。

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亚洲地区各种次区域化的“经济圈”和“成长三角”的形成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以香港为中心、珠江三角洲为腹地的港澳珠“成长三角”已成为亚洲地区发展比较成熟、协作程度较高、经济活跃的经济圈。中国加入 WTO 和澳门回归为加强粤港澳经济合作提供了机遇,世界经济区域化趋势使深化这种合作的要求更显迫切,而一国两制下三个独立关税区经济一体化的有效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的建立给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提供了挑战。探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与特点,有助于港澳珠经济合作的提升。

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趋势

1. 经济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但区域化仍然占据优势。

随着前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和世界范围内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日益鲜明的发展趋势。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扩展导致的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新一轮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全面运用、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日益加强、以及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是经济的区域化。冷战后,经济的竞争逐步取代军事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地区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竞争的日益国际化推动和加速了经济的区域化进程。据日本贸易

振兴会的一项统计表明,1996 后全球区域性经济联合组织大约有 101 个。1990 年以后创立的为 69 个,接近总数的 70%。尽管 80 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的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但经济的区域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2. 发达国家主导着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欧盟和美国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两支主导性力量。欧洲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最早的地区。早在 60 年代前后,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分别组成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二战以后,欧盟从共同市场、经济共同体,最后走向单一货币经济与政治联盟的过程成为当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范。1997 年 6 月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确定了欧盟国家通过努力实现经济货币联盟推进政治联盟,加快欧盟向中欧、东欧扩大的步伐和深化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蓝图。

作为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反应,美国正在积极推动美洲的经济一体化过程。1989 年底美加自由贸易区成立,1994 年初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美国从 90 年代初一直志立于建立南北美统一的美洲自由贸易圈。1990 年布什曾提出“美洲倡议”,旨在建立两个半球经济圈。1994 年在迈阿密召开了美洲 34 国首脑会议,克林顿提出在 2000 年建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试图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中心,逐步向中西美洲地区拓展,以实现其建立一个“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自由贸易区。美国在“南下”同时,积极“东进”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为主的亚太经济合

作组织将会发展成一个包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与政治体制国家的多层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这是我国在世界上正式参加的唯一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在亚洲区域性的经济合作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由主权国家参予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区。其中以东南亚的自由贸易区最引人注目,东盟利用“9+3”首脑会议扩大与中日韩的经济合作,扩大了它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第二,地缘性的经济区和“增长三角”。这种经济圈的特点是利用地缘的优势和某些特殊政策,绕过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直接同全球经济相结合。珠港澳经济区就属于这样一种经济合作形式。在日本贸易振兴会统计的101个区域性经济联合组织中,北美和南美占40个,欧洲占39个。从数量上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还是在欧美地区。欧盟和美国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两支重要力量。

3.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地区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推动了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减少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范围和产业分工,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曾经指出“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措施;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之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①因此,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就本质上讲就是通过共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建立,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产业分工和经济增长。斯密将分工作为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源泉,认为分工取决于市场大小,而市场大小又决定于运输条件。从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看,运输成本只是交易成本的一个较少的部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从斯密的分工学说和新制度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中得到解释。

二、世界经济区域化的特点

发起于80年代末,盛行于90年代初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与50、60年代流行的区域性经济贸易合作组织相比具有新特点,被称为一种新地区主义。

1.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致力于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关税总协定或世贸组织(WTO)对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采取了宽容

的态度。作为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总协定(GATT)1999年第24条允许缔约方在其领土之间建立关税联盟或自由贸易区,或根据建立关税联盟或自由贸易区的需要采取某种临时协议,其条件是这种区域性经济联合要真正有利于区内贸易的自由化,同时不能提高对其它非区域内的缔约方的关税和贸易限制。这表明世界贸易组织承认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存在,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2. 发达与不发达经济共同参与和合作。在50、60年代一般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组建了一些南南合作的经济贸易组织。新的区域一体化开创了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经济体制差异和文化价值多元的合作模式。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欧盟的东扩都体现了这种特点。

3. 区域一体化中的开放性与排他性并存。区域性的经贸合作一般都对非区域内的成员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歧视性。同时为了避免30年代“以邻为壑”区域集团贸易战的重演,以及适应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性加强的要求,90年代出现区域性经济合作均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强调“开放的地区主义”,反对通过违背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方式实现亚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4. 多重区域性经济合作的重叠。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多层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区域性经贸合作与跨区域间的合作相互交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就包括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自由贸易区。美国正在推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将会包括若干个次区域性的贸易组织。

5. 功能性与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相互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实际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和产业分工的发展要求突破国界和地区限制的内在要求。经济的一体化包括两种形态:功能性一体化和制度性一体化。功能性经济一体化是指某一区域世界经济各领域中实际发生的障碍经贸活动因素的消除和经济的融合。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各成员建立的

国际协议,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前者是在一种自发的市场力量支配下进行的经济活动,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具有不稳定性。后者反映了功能性一体化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一体化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因此,只有二者的紧密配合和相互促进,才能不断推进和深化世界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欧盟的一体化过程就充分反映了二者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合作

80 年代中期一些学者就提出了港澳与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设想。经济的一体化是指通过共同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形成,消除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各种人为因素,通过产品的自由贸易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组合,创造最适应的国际经济结构。董建华先生提出加强穗港澳之间的合作“让人、货、资金等各种资源尽量依循经济规律自由流动组合,以达至新的飞跃”的构想,表达香港特区政府进一步深化港澳珠经济一体化的愿望。

第一,在港澳与珠江三角洲之间能否实现真正的经济一体化?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港澳与珠三角地区是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三个独立关税区,港澳均属于自由港。在这种制度背景下,港澳珠之间能否实现经济一体化。首先从上节分析可以看出,只要港澳和中国内地能够遵守各自在 WTO 框架内的多边贸易协议,那么港澳与珠三角之间在经贸方面的有利于地区资源流动和自由贸易的安排并不违背 WTO 的原则,具有可行性。其次,港澳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应适应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种经贸合作应该是开放性的。在多边贸易体制和一国两制下,建立港澳珠区域经贸合作体制和组织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

第二,港澳珠区域经济整合的形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主要有四种:1、关税同盟。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组成,其成员国之间不设关税壁垒,而对世界上的其他非成员国却采取一致的关税壁垒,因此各成员国边界上不设置海关。2、自由贸易区。在贸易区内,各成员国取消相互之间的

贸易壁垒,但各自仍保持对外部世界的贸易壁垒。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仍设置海关,并对一些为了逃避某些成员国的较高贸易壁垒而通过较低贸易壁垒的成员国进入或离开这一区域的商品征关税。3、共同市场或经济共同体,在共同市场或经济共同体内,除了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外,各成员国之间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4、完全的经济同盟。这是一种更高阶段的经济一体化,各成员统一所有的经济政策,包括货币,财政和福利政策以及有关贸易和要素流动的政策。港澳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的经贸合作应类似于经济共同体。在产品市场方面类似于自由贸易区,而在要素市场方面向经济共同体靠拢,逐步形成港澳珠经济共同体。粤港澳三地政府应该把共同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建立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长期目标。

第三,港澳珠经济整合的进程。经济整合的过程包括功能性一体化和制度性一体化两个方面。经济合作中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的应该相结合。在探讨港澳与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时,要将功能性研究与制度性研究结合起来。一方面从功能性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研究港澳珠地区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深化合作领域;另一方面从制度性一体化角度,探讨一国两制下三个独立关税区经济合作的有效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提升合作层次。随着港澳珠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与产业分工的深化,经统一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强。但在港澳珠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制度性一体化远远落后于功能性一体化的进程。这种特点使港澳珠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一定自发性和不稳定性。通过加强制度性一体化来巩固功能性经济一体化的成果是今后港澳珠经济合作的重点。在深化功能性一体化中,不断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制度性安排是一项长期任务。

注释:

① 贝拉·巴拉萨 (Balassa, Bela):《经济一体化理论》,伦敦,1961 年版,第 1 页。

【责任编辑:多天】

国际资本在香港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林江 戴锦辉

【内容提要】 国际资本在香港直接投资对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 国际资本在香港的直接投资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其行业分布主要是制造业、金融业和贸易及零售批发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是, 对制造业的投资会有所放缓; 在金融业方面, 近年来中资企业异军突起, 有可能与其它国际资本分庭抗礼; 而欧美资本在贸易及批发零售业方面仍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东南亚资本也会继续利用香港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

国际资本在香港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是国际投资者在香港建立企业、创办机构, 而海外投资者对所投资的企业, 拥有持久的权益, 并在该企业的经营决策方面具有影响力。一般来说, 直接投资是较为稳定的投资形式, 伴随着资金的投入, 外资企业为香港提供了就业机会, 带来新的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 甚至是海外市场, 这直接有助于香港经济的发展。

在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之前, 国际资本对港的直接投资一直维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如表 1 是香港政府统计的各国际资本直接投资的数据。由于此类数据在统计工作上需要较长的时间, 所以目前最新的数据只有到 95 年的。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些较为次要的国家的投资有所波动之外, 日、英、美、中国内地等最主要的投资国的直接投资皆呈现稳定增长的势头, 主要投资来源的比重也变化不大。由于直接外来投资额的缺少 96、97 的数据, 所以我们同时将海外公司在港设立地区总部和地区代表处的情况作为补充。虽然表 2 和表 3 统计只是在港新设公司的家数, 但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金融风暴前香港外来直接投资的状况和对香港的信心。表 2 中, 虽然 96、97 年新设立的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的家数比前几年略少, 但仍属稳定增长。

表 1

主要投资 国家和地区	外来直接投资资产净值总额					
	以账面净值计算					
	93 年	93 年各 国比重	94 年	95 年(1)	95(2)	95(2)各 国比重
总计	5610		6159	6871	7188	
日本	1284	22.9%	1477	1694	1808	25.2%
英国	1334	23.8%	1419	1482	1497	20.8%
中国内地	1121	20.0%	1217	1362	1381	19.2%
美国	652	11.6%	702	741	841	11.7%
意大利	171	3.0%	170	174	177	2.5%
韩国	91	1.6%	112	132	135	1.9%
法国	102	1.8%	128	120	121	1.7%
德国	53	0.9%	78	115	118	1.6%
印尼	68	1.2%	85	114	115	1.6%
瑞士	99	1.8%	106	107	115	1.6%
其他	635	11.3%	665	830	880	11.4%

注: a. 93、94、95 (1) 不包含各国在港制造业的投资, 95 (2)

包含各国在港制造业的投资

b. 其中英国投资并不包括本地的英资

资料来源: 香港经济年鉴 1997

* 此文为广东省教育厅资助的研究课题: “香港国际资本的走向和趋势” 的部分成果

表 2 根据开业日期而分的在港设立地区总部及地区办事处的海外公司 (单位: 家)

开业日期	地区总部	地区办事处
1979 年以前	148	251
1980	21	26
1981	17	24
1982	19	25
1983	23	35
1984	25	57
1985	39	51
1986	47	69
1987	42	81
1988	51	94
1989	52	93
1990	40	65
1991	47	88
1992	58	93
1993	58	124
1994	77	148
1995	77	173
1996	58	96
1997 (首五月)	15	13
总数	924	1491

资料来源:《1997 年海外公司驻香港地区代表调查》

下面我们重点探讨国际资本投资于香港制造业、金融保险业和贸易及批发零售业的发展趋势。

一、制造业

外来投资者在香港制造业的投资总额总体上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从 90 年至 94 年平均复合增长率达 12%，较为稳定，年平均流入额为 30 亿港元。95 年投资存量总额达到 483 亿港元（以原来成本计算的固定资产总值和营运资产的原值计算）。国际资本在香港制造业的投资虽然呈不断上升的势头，但投资的总额并不大，而历年新增的投资绝对额也较小，每年仅 30 亿左右。这显然是与香港经济转型，日益成为亚太地区的商业服务中心，制造业不断萎缩的趋势有关。

据近几年，工业署对外来制造业投资者关于香港投资环境的调查资料表明，投资者总体上还是对香港的投资环境表示满意。其中对基础设施、银行

财务设施这两个方面评价特别高，对管理技能的供应，亚太地区的位置，政府的经济政策，专业技术技能的供应等方面也有六成以上公司表示满意。93 年底投资于制造业的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政治气候有三分之一表示不利，三分之一表示中立，这显然与当时的中英争执有关。随着九七的临近，这一先前的不利因素渐淡化。香港现已实现了主权的顺利交接，一国两制得以充分地执行，为外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另外有两个因素却一直没有得以显著改善，即劳工和办公室厂房的成本近几年一直被五至六成的外资制造业公司认为不利于他们的经营，而约七成公司认为其还在不断恶化。人工与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以使香港比较优势受到削弱。即使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后，地产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工资增幅大大减少，但相比于东南亚各国来说调整幅度的吸引力仍然不够，而且工资尚有一定的刚性，所以仍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香港其他方面的优势。

无论是从公司的数目、雇员人数、还是总投资额上看，电子业、纺织及制衣业、电器业、化学制品业这四个行业都稳居国际资本在制造业上投资的前四位，见图 1。电子业持续几年吸纳最多的新增投资，在总投资额中的份额就不断上升，94 年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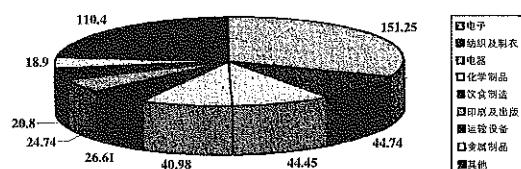


图 1 1995 年香港制造业海外投资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香港制造业海外投资调查》

超过 30%，95 年达到 31.3%。其次吸纳新增投资的行业为印刷出版业和化学制品业。由 90 年的而纺织制衣业由于新增投资较少，所占比重略有下降。由于香港劳工成本、房地产价格日益上升，在港投资劳动密集型行业将缺少前途，但如果将创意和新技术应用到传统工业中还是会有生存发展空间的。如果香港能够多吸引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来港投资，对香港产业结构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

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对香港制造业规模过

小、档次过低、日益萎缩等状况不无忧虑。他倾向于政府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加以扶持。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要使香港成为一个不仅面向本港更是面向华南和整个亚太地区的“产品发明中心”，不再以廉价作为市场的竞争优势，而是通过高附加值的产品立足市场。具体措施有：发展科学园；兴建第二所工业科技中心；兴建第四个工业村；向应用研究基金再注资五亿港元以支持是将资讯和其他高科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等等。根据董建华先生的一些公开讲话以及其首份施政报告，他似乎已认识到香港制造业没有及时转型，只是采取大量外移的方法，而香港经济结构因此留下了隐患，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势在必行。

但是目前香港制造业日益萎缩的确是多年积累而成的。一方面香港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的高昂使得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难以在香港生存，而另一方面香港本身又缺乏科技人才，大型财团对从事高增值、高科技产业没有什么热情。虽然现在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各类措施需要一段时间才有可能逐渐产生效果，而且更需要后续措施的配合。所以，短时间内还难以得到较大的改观。可以想象在今后几年国际资本对香港制造业的直接投资的热情不会太高，相对于其他行业的直接投资只会占一个较小的份额。特别 1998 年东南亚国家以及韩国的货币大幅贬值，平均幅度在 30% 左右，而香港仍维持 7.8 的联系汇率，港产品的成本相对这些国家处于偏高水平。国际资本肯定会考虑这一因素，放缓甚至减少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如果特区政府在制造业投资方面有大的动作，则另当别论，但估计特区政府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仍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推动香港经济尽快复苏上。

二、金融保险业

香港自 70 年代末以来，逐渐演变为国际金融中心，许多国际金融机构直接在香港投资设立各类金融企业，而又同时通过这些机构来调拨资金，将香港作为资金的集散中心。

(1) 香港外资三级吸收存款机构数量的变化

我们知道，香港的三级吸收存款机构，即持牌

银行、有限制持牌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其业务范围涵盖了银行的零售业务与批发业务。本地华资拥有的金融机构已日渐式微，至 97 年底在港注册的 31 家持牌银行中只有 16 家实际权益拥有者为本地华资企业，而且多是中小型商业银行。另外只有 2 家有限制持牌银行和 15 家接受存款公司。不少原先的本地华资银行由于实力不强、管理经营不善而倒闭或被外资收购。由于自 1978 年以来获准在香港开业经营的外资银行只能开设一家分支机构，这样外资也乐意收购资本基础薄弱但拥有多家分行的本地银行来开展零售业务。于是香港持牌银行几乎是外资的天下。从 85 年以来，非香港本地资本的持牌银行从 120 家增加到 164 家。

日资所拥有的持牌银行增加得最多，10 年间由 20 家增至 44 家。日本银行为了摆脱国内的各种约束，来到香港这个异常自由的国际金融中心大量开展离岸业务。另一原因是日本对香港及内地的贸易和投资急速增加，需要日本金融机构在港开设分支机构，以提供金融服务。

但随着亚洲金融形势的恶化，日本银行业的坏账问题愈来愈暴露出来，不少日资金融机构被迫根据其集团的总体业务规划缩减在港的分支机构。自 97 年 7 月以来日本债券信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已经相继撤出香港，或降级为接收存款公司或在港办事处；有限制持牌银行数目基本没什么改变，接收存款公司也有所减少。

正 85 年以来，美资拥有的持牌银行数减少了 10 家，这是因为美国银行业大规模兼并收购所造成的。这种由合并所引发的银行除牌，并非意味着其原有在港业务的结束，而只是对以往的业务进行调整和重组，以利于进一步的发展。美资银行在数量明显减少的情况下，资产保持稳步的增长。估计美国银行业的收购兼并还将演化下去，所以在港美资银行的数量可能还会减少，但不会影响投资规模。美国银行界对开拓中国大陆的银行业务有极为浓厚的兴趣，而香港的各类服务设施和政治经济环境又符合其要求，所以估计美资仍会增加对香港银行业的直接投资。

在过往的十来年中，中国内地在港的持牌银行由 13 家上升到了 18 家。特别自 97 年以来，中资

向香港银行业进军的动作颇为引人注目,中资机构主要通过收购香港的中小持牌银行和有限制持牌银行(主要是投资银行)的股权来达到进入银行业的目的。由于在港的中资(除了中银集团以外)以前很少涉及银行业务,缺少银行运作的管理经验,而且也难以达到要求自行申请牌照,所以收购中小银行正好能利用这些银行现行的运作构架,管理经验以及银行牌照。例如华润创业 97 年 9 月成功收购华人银行控股集团 37.2% 股权,中远太平洋也宣布向廖创兴家族收购 20% 廖创兴银行的股权(后来由于香港股市的巨大变化,有关交易条件需重新洽谈)。

其他亚洲和澳洲国家在港的持牌银行也增加较快,其中如澳大利亚现拥有 4 家持牌银行,85 年前却是空白;菲律宾增加了 3 家;台湾资本的持牌银行也无到增加至 4 家。台湾银行中尚有如中小企业银行等多家银行正处于申请阶段,主要为台、港、大陆之间的贸易提供融资方便。

而欧洲的持牌银行家数大致维持稳定,这和欧洲银行进军香港较早有关。主要是以业务和企业规模扩张为主。

(2) 国际资本在香港保险业和基金业管理的投资

在这里也有必要谈论一下国际资本在香港保险业上的投资。香港的保险公司之多,居亚洲第一,各种资本的保险公司在香港的保险市场上激烈竞争。各外资保险公司一般来说规模较大,实力较强。而本地华资的保险公司数量较多,但规模很小。在激烈的竞争中,有一些倒闭了或被外资收购。原来在香港英资保险公司的实力最大,因为伦敦是世界最大的保险业中心,有许多大的英资保险公司在港设有分支机构。英资财团,如怡和集团等也都有下属的保险公司,依靠其集团作为庇护,因而业务最有相当的保证。

近几年美资和中资在保险市场上异军突起,已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美资在香港保险业上热情异常之高,据美国商务商的资料表明,美资在港保险业上的直接投资从 89 年起复式增长率高达 34%,尤其 94 年的增幅竟高达 93%,94 年底总额已达 31 亿美元。中资在港的保险公司原有民安等 6 家,现

在中银集团又新成立了自身的保险公司,国内的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也在港设立了机构。96 年中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已达到了 21% 的份额,这股力量绝不可小视。当然,中资保险公司在业务的创新、服务的完善等方面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

香港已是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资金管理中心。当然这里指的是管理机构本身,而不是其管理的庞大资产。在香港的资金管理机构除了加拿大怡东(长实和加拿大国际商业银行合资)新鸿基等几家外,绝大多数都属于外资(包括本地英资)。其中英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如亿顺、怡富、吉懋、亨宝、获多利、宝源等占有主导地位,另外还有美国的富太、万国宝通,德国的丰盛也颇具盛名。基金管理公司虽然本身不需要大量的投资,但却管理着异常庞大的资产,对管理水平和人源素质要求也非常高,需要大量的高级金融、财务、法律等人才,因而在基金管理业上英美资本独霸香港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三、贸易及批发、零售业

香港以贸易起家,现在尤其是转口贸易是香港主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即使港产品的出口也要依靠贸易来进口原材料,再出口制成品。香港曾有购物天堂的美称,自然其批发、零售业也异常发达。国际资本最初直接投资于香港,多是出于贸易的动机。目前在香港主营贸易的外资企业数目一直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海外公司在港设立地区总部或办事处,从事贸易、批发、零售业务,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资本在香港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从事贸易及批发、零售业的外资企业的地区总部或地区办事处,其国别来源分别集中于美、日、欧、中等地,与香港的贸易地理方向大体上是一致的。香港拥有的独特地理条件和完善的服务设施是任何欲大力拓展与亚洲特别是中国内地贸易联系的企业所不可忽视的。

欧洲国家和香港的贸易关系源远流长,香港早在开埠之初已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英资的许多本地财团也是依靠英国与大陆地中转贸易而起家的。欧洲联盟现在是香港的重要贸易伙伴。由于欧洲国家较多,而且多希望通过香港占领亚洲特别是

中国内地市场,所以在香港建立的贸易机构数目众多,有一些已具相当规模,另有一些则在香港试探性地设立办事机构为将来开拓市场做好建立业务网络、市场调查等先行工作。亚洲地区的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在金融风暴之后,虽然亚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受到了较大影响,但欧洲国家也不会轻视其市场潜力。而且欧亚国家间的产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相信两者之间贸易机会仍大量存在。而香港优越的地理和经商条件正是欧洲国家加强与亚洲的贸易,设立贸易机构的理想之地。在批发零售业务方面,英资怡和旗下的牛奶国际在香港从事大规模的零售业务,特别是牛奶国际下属的惠康是香港两大零售百货连锁集团之一。另外众多的欧洲精品店来港设立分店,颇有自身的独特风格,吸引着大量的顾客。

据美国商业部公布的数字,美资在贸易及批发零售业的直接投资在 89-94 年间复合增长率为 17%,到 94 年已达 42 亿美元之多,毫无疑问,此与亚洲和美国之间贸易关系日益密切,特别是中美贸易额迅速增加有关。美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大量的贸易机构,进口亚洲价廉物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宣传推销美国的产品,开拓亚洲市场。在零售环节,美资经营石油产品的美孚及埃克森,在香港占有重要的份额。美资麦当劳、必胜客、肯德基等则以特许经营权的方式进行投资,这种投资方式在香港颇为流行,据估计在港这种投资方式的 80% 来源于美国。

自 85 年以来,中国内地已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在 80 年代前,早期在港的中资企业主要从事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航运业等,成为中港贸易中重要中介。虽然目前在香港的中资机构业务已多元化,但进出口贸易仍是其业务的重要构成,中国内地对美国的出口由于贸易壁垒,网络渠道不完善等原因而大量经过香港转口,也使得大陆看重香港的贸易中介地位,增加在香港贸易机构。中信泰富收购的大昌行是香港最大的贸易行之一,业务涉及机电、化妆品、纺织品、工艺品的进口、批发和销售。另外在零售及批发业务上,中资的五丰行、

广南行不断扩大规模已经几乎垄断了在港的鲜活食品的零售、批发业务。华润超级市场开设的分店已有 50 家以上,在香港的超级市场上的占有率仅次于惠康和百佳。华润百货在香港的分店已超过 10 家。

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估计,94 年底日资在对港贸易及零售批发业的直接投资额达到 35 亿美元。据日港经济合作委员会调查显示,日资十分明显地把香港定为亚太地区的分销和采购中心,且在 97 后,仍将吸引大批的日本公司将香港作为地区性的分销和采购基地。值得一提的是,日资在香港百货零售业的发展。在 60、70 年代,就有日资的三越、伊势丹等日资百货公司在港开业。到了 80 年代,更有八佰伴、吉之岛、崇光等进军香港。凭着其经营手段灵活,市场定位准确(以中档商品为主),市场管理销售概念不断创新,店铺装饰、地点选择得当,使得日资百货在香港百货零售业中占有绝对优势。销售额所占的比重由 85 年的 17% 急增至 92 年的 60%,大有垄断香港零售业之势。但其后由于香港店铺租金、职员工资的上升,日本长时间经济不景气而导致来港日本游客人数和购买欲的大幅下降(因为日资百货的一个重要客源就是来港的日本游客),使得日资在百货业上的经营日益困难,伊势丹已关闭所有在港的分店。八佰伴在大规模缩减沙田分店营业面积,大股东和田一夫将其拥有的近一半股权转让给太平协和之后,八佰伴(香港)仍难逃脱清盘倒闭的厄运,这些均显示日资在百货零售业已有所收缩。

其他例如东南亚资本、台资等对贸易、批发、零售业的直接投资,绝对数额虽不大,但是相对于其自身来说却占一个较大的份额,这正是由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所决定的。东南亚国家在此次金融危机后,更须利用货币贬值的机会,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以带动经济的复苏,这样反而会使香港这个国际贸易中心更加受到重视,以便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更好地利用香港接触世界各地的客户,增加出口。

【责任编辑:多天】

香港服务业发展前景展望

陈丽君

〔内容提要〕 香港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服务业已较为发达。由于香港具有发展服务业的优越条件，如高度开放的自由经济政策，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等等，加上与中国内地关系日益密切及中国内地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将使香港服务业前景继续看好，国际贸易、金融、旅游中心地位将继续维持，且会取得新的更大发展，这些将支持和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亚洲大都会。

一、香港贸易前景展望

（一）香港转口贸易发展前景

自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在香港转口贸易中，中国内地是最大市场。但今后情况将会发生变化。

1. 作为中国内地对外转口贸易港的地位将下降。

随着中国内地港口建设的大规模进行，香港港口装卸成本提高，以及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内地对外贸易越来越多地采取直接贸易的形式，即直接与海外国家和地区贸易。此种情况下，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对海外贸易的中介地位明显下降。99 年底中美两国正式达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的双边协议，标志着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最大障碍已排除，中国加入世贸，一旦 2005 年中国完成各项入世承诺，中国内地市场开放迅速扩大，而海外国家市场同样将对中国迅速开放，此种情况意味着中国内地纺织品等传统行业产品对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不再需要利用香港的配额和优惠税率，也意味着中国内地与同是世贸组织成员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联系将加强，中国内地与他们的贸易交往将多采取直接而无需要中介的形式。因此，届时香港作为内地与国际贸易联系中介地位会进一步削弱。

2. 仍可保持为华南尤其是珠三角的对外转口

贸易港地位

香港始终有其独特优势。一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二是发达的基础设施，三是发达的服务业，四是法制环境，五是政府廉政、透明及较高效率，六是与西方国家制度一致，七是广泛的国际联系和发达的信息网络。香港贸发局在海外 34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50 多个办事处，通过网络，香港在国际市场上拓展了许多商路。这些条件是中国内地的城市无法比拟的。且香港已经与华南尤其是广东建立了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已经成为华南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加上华南地区尤其是珠三角与香港交通网络十分发达和方便快捷，且经济势头强劲，生产厂家很多，这些均使香港作为华南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对外贸易的中介地位仍有可为。

3. 将从中国内地商品贸易转口港向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港发展。香港已有发达的服务业，而内地相形之下仍有较大差距，中国加入世贸后，外国进入中国内地进行投资、商贸活动机会将大大增加，香港可以利用其发达的服务网为外国进入中国内地商贸活动提供各类中介服务。

（二）香港本地产品出口贸易将会逐渐回升

香港制造业北移内地后，本地制造业在 GDP 的比重不断下降，因此本地产品出口也呈下降趋势。本地出口产品主要是服装及服装饰品，其次为电子元件、纺织品、钟表、电讯设备等等。这些多

为传统密集型行业,其在香港土地、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已越来越难生存,因此,本地产品出口才呈下降趋势。

但香港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已开始看到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难有出路,不得不向高增值、高科技行业发展。随着香港工业升级成功,高增值、高技术产品的增多,香港本地产品的出口中高增值、高科技产品比重必然不断增大,由此也将使本地产品出口逐渐回复上升趋势。

(三) 中国内地将继续保持为香港最大贸易伙伴

香港贸易从地区上划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亚洲地区,其次为北美,第三为西欧。按国家划分,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内地,其次为美国,日本第三,第四为欧盟。随着中国入世贸,中国内地将会继续保持为香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美、欧、台等则会继续维持为其次的贸易伙伴地位。

二、香港金融业前景展望

(一) 银行系统前景展望

1. 完善的管理监管体制将进一步加强

在亚洲金融风暴刚刚有所缓和时,国际资本就表示对香港前景充分看好,国际风险评级机构“政经风险顾问”99年发表的对亚洲地区金融风险的评估报告,将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体系最为健全、风险最低的地区。这一报告所用的评估系数为1-10,1为最佳,10为最差,香港的风险系数为2.64,新加坡为2.68,台湾为4.8,印尼为9.2。显然香港风险系数最低。香港金融体系低风险最重要的是其银行管理、监管体系较为完善及银行赢利水平高。从99年香港各大银行均公布了良好的经营业绩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大多数银行实现了纯利的增长,一些银行的增幅仍接近或达到两位数;香港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继续保持在17%的较高水平,同时为了防范亚洲金融危机后可能扩大的不良资产压力,香港各家银行大幅提取了拨备金,体现了香港金融业一向稳健审慎的经营作风。经历了亚洲的金融风暴后,金管局将香港银行资本充足比率由8%提至12%,这将使香港银行体

系抵御坏账能力进一步提高。

2. 国际存贷、银行中心地位不会改变

香港银行与房地产业关系密切,银行贷款中以房地产按揭及地产商贷款为最大,由于房地产业在97、98金融风暴前很火爆,因此银行业利润也很可观。自金融风暴后,房地产业受到冲击,加上政府刻意压制楼价,扶持创新科技、制造业及旅游等业,银行贷款不得不逐渐改变过于偏重房地产的状况,进一步向内地及海外拓展贷款市场。由于中国加入世贸已为期不远,中国内地开放步伐必然加快,内地各行各业加快发展以适应开放需要已是势在必行,因此内地对资金的需求巨大。世界银行99年底一份研究报告预测,95-2000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基建投资达13000至15000美元,其中中国占50%以上。因此香港银行向内地拓展贷款市场前景可观。同时香港作为外资进入中国内地中介的优势,加上香港营商环境的优势,将使香港能够吸引更多国际资本进入香港。因此香港作为国际存贷中心、银行中心的地位将继续维持不变。

(二) 证券业发展前景

1. 创业板块的建立将使香港金融体系更为完善

香港证券市场目前必须注入新的活力,不能仅靠房地产股、金融股,今后必须转向更多的依靠高新技术公司的股票,这样,才能尽快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确保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为了促进创新产业的发展,一些国家先后设立了第二板市场:如美国的Nasdaq市场,法国巴黎的NouveauMarche市场,英国的AIM市场等等。其中以美国Nasdaq市场最成功,在美国《商业周刊》所列出的最具成长性公司中,92%是Nasdaq上市公司。从1990年到1997年,Nasdaq上市公司在一级市场上发行所得近1000亿美元,若按上市公司数的比例推算,Nasdaq市场在8年时间里为美国高科技产业注入近750亿美元。目前,Nasdaq已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

一切企业都是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的,第二板市场为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这些企业又将是进入主板市场的后备力量,两板市场的相互支持将为股票市场建造合理的更新机制。因此

香港设立第二板市场极为必要,其将有助香港股市的成长、为香港金融中心优势地位提供新契机。既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又可以完善金融体系,还能避免与新加坡发生直接冲突,它对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香港第二板市场是面向全球的,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主的区域性国际市场,将增强香港股票市场对于东南亚各国的辐射能力。它的设立与运作有利于香港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的容量和规模,增加市场层次,同时必将带动香港和区域内中小券商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活跃,促进风险投资基金和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必将增强香港证券市场的国际辐射能力。为饱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香港股票市场注入活力,从而增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2. 两交易所合并将强化证券系统管理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香港金融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99年,香港在放开利率,联交所与期交所合并,推进电子化交易等方面已迈出实质的步伐。

99年3月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的财政预算案中公布了证券市场架构改革,其中主要部分是合并联合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以及两交易所联营结算公司,目的是增加香港证券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99年7月30日两交易所和中央结算公司终于达成合并协议,计划新交易所于2000年上市。99年10月,方案由港府交立法会讨论,2000年3月前完成立法工作。新交易所方案中,联交所和期交所在新交易所的估值比例为7:3,新交易所上市后最初两年不会发出新交易权,现有会员可以在未来10年转让交易权一次,新交易所愿用现金回购经纪牌。新方案中,交易所股权不再由经纪控制,交易所的所有权及管理用家利益分开,避免经纪私相授受,同时,在新交易所中经纪的交易权力不受限制,任何人士只要符合资格并支付规定的费用,便有权进行交易。两交易所合并还可减少人手,提高效益,加强协调、统一结算制度,加强风险管理,其对于增加香港证券业竞争力及巩固和加强香港作为亚太区证券交易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3. 美国7家巨无霸上市公司2000年来港上市

将推动香港证券业全球化

99年12月香港联交所主席利汉钊及行政总裁同美国纳斯达克(Nasdaq)证券市场的主席 Frank G. Zarb 及国际总裁 John wall 签署监管协议,正式引进 Nasdaq 上市公司到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首几家 Nasdaq 到港上市公司包括微软、英特尔、思科系统、戴尔电脑、半导体公司应用材料、网上咖啡商 Srarbucks 及生化公司 Amgen 等等将 2000 年始在港挂牌,其中微软市值最大,最新市值 37800 亿港元,几乎达到港股总市值 42000 亿港元,思科系统市值为 25300 多亿港元,英特尔市值为 18800 亿港元,几家公司总市值达 97000 多亿港元,等于香港股市总市值的 2.5 倍。预料今后会有更多美国上市公司到香港上市。这些市值庞大的跨国公司到港上市,必将吸引更多的本地及亚洲区内投资者到港进行股票买卖,对于香港股市的全球化及 24 小时交易目标均有实质作用。

4. 债券市场将取得较大发展

香港债市一直以来相对不发达,因此资本市场是股市一枝独秀。但特区政府成立后,较为重视债市的发展,97年按揭证券公司推出港元债券发行计划,98年10月该公司又发行200亿港元债务工具,且其债券在联交所上市。99年金管局将外汇基金债券在联交所上市。且政府还推出了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其对创造债市的需求起了较好的作用。特区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对刺激债市的发展起了较好作用。而中国内地企业到香港发行债券在未来将会逐渐增多,且中国政府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也将到香港发债筹资。这些因素均将有力地推动香港债市的发展,使香港债市有望发展成为亚洲债券中心。

(三) 亚太区金融服务中心地位不会改变

香港积极参与亚太区经济事务,发挥区域内金融方面的领导作用,例如搞东南亚基金,发展债券市场,以多种形式(而不仅仅是股市)为更多的亚太国家和地区提供融资机会等等,使香港亚太金融中心地位得到强化。香港作为国际重要的金融贸易中心,既是华南地区的交通和航运枢纽,又因其经济腹地和服务业的覆盖范围远远超出华南的范围,成为内地和整个亚太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在地域上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分工将更加明

确,随着内地与香港经济实现一体化和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为香港金融服务业提供更广阔的业务空间,使香港进一步加强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一旦中国加入世贸,香港将为内地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融通和支撑作用。

近年来亚太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一个相当完善而有效率的地区性金融中心,以助其经济发展。在中国庞大的经济力量支持下,香港金融贸易业方面的发展将更上一层楼,不仅成为中国华南地区的第一大港,更是中国金融中心之所在。其拓展所涵盖的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有关的范围,而将随着亚太地区经济起飞,而成为区内最重要的商贸和金融中心之一。

三、香港旅游业前景展望

(一) 迪士尼主题公园建设及将对香港旅游业的影响

为克服香港旅游景点较缺乏等问题,将香港旅游业推向高层次,以提高其竞争力,香港政府于 99 年时经过努力争取终于在 99 年 11 月与美国迪士尼公司签订协议,并于 12 月 10 日签署最终协议,在香港大屿山竹篙湾兴建主题公园,港府与迪士尼公司合组联营公司,迪士尼公司投入 24.5 亿,占四成三股权,港府连同贷款及基建等开支共需 224.5 亿元,占五成七股份,为大股东。迪士尼乐园将建成多个不同的主题游乐区域,全部提供充满奇幻色彩、惊险刺激的独特游戏项目,包括:美国大街小巷风情、睡公主城堡梦幻情怀、变化多端卡通世界、探奇冒险与新发现、险象环生西部风光、进入未来遨游宇宙。工程将在 2000 年 4 月进行填海,2002 年后分阶段将地盘交予迪士尼进行兴建工程,预期首个迪士尼公园“梦幻王国(睡公主城堡)”将在 2005 年启用,第二个“明日世界”会在 2007 年落成。

香港迪士尼主题公园是世界第 3 个(法国、日本各一个)迪士尼主题公园。迪士尼公司之所以选中香港,是经过多方考察比较,最后放弃珠海与上海的选址,定下香港。原因主要以下:(1)香港地

理位置适中,是亚太区交通交汇点,靠近东南亚、台湾、澳洲、新西兰及中国内地华南地区这些生活水平较高消费能力强的国家和地区;(2)香港本身旅游业发达,已具备较多旅游项目与资源;(3)港元可在国际自由兑换,解决了迪士尼收益的汇率问题;(4)香港交通发达,新机场年吞吐量可达 8000 万人次;(5)香港作为自由港,人员自由出入境;(6)香港是一自由开放的城市,可兼容各种文化产品。

迪士尼公司出于以上理由而选择香港建主题公园,日后也是以上理由可以保证迪士尼主题公园争取到众多游客,取得丰厚利润。由于香港迪士尼在一段时期会是东南亚、澳新这一地区唯一的迪士尼乐园,这里的居民多会选择到香港迪士尼而不会到日本、法国。且届时香港会争取中国中央政府支持放宽内地人到港限制。因此,据港府预测,2005 年启用时,每年会有 500 万人次参观,估计会有 25% 的经济回报率,40 年后会带给香港 1480 亿港元收益。

(二) 香港建环球片场的可能性及对香港旅游业的影响

迪士尼是香港现时的旅游核心项目,其对香港旅游业前景无疑是很利。但是过了十几二十年,在东南亚地区或中国内地可能会有第二个迪士尼。届时为提高香港旅游业的竞争力,香港可能会兴建环球片场(电影梦工场)主题公园。事实上环球片场已在 99 年时与港府接触过,后因港府与迪士尼谈判,就暂停了与环球片场的接触。但在 2010 左右,即迪士尼 2005 年建成的 5 年后,为提高竞争力,可能会重与环球片场谈在香港建环球片场一事,届时香港将会有多个大型主题公园。

海洋公园作为香港主题公园的老大哥,99 年底已与美国某水族馆洽谈购入四条杀人鲸,且计划于 2003 年迁入新建成的“海洋奇观”展览馆,届时海洋公园将以其新项目而获得更大吸引力,对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有利。

香港旅游协会属下旅游发展基金,已建议把上环文武庙、荷李活道及嚟嘢街、兰桂坊、中山史迹径及咸鱼档等辟成海味街旅游景点。港府拟斥资 4700 万发展此项目。咸鱼档、海味铺、文武庙、

兰桂坊等等充分反映香港文化特点,是发展香港特色旅游的重要资源。

(三) 旅游总体前景预测

随着香港各项主体旅游项目的建设完工,香港将成为亚太区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届时东南亚、东亚、澳洲及中国内地将会有大量旅客进入香港旅游观光。据世界旅游局 98 年底在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发表的《中国与香港特区:旅游的经济效益》报告,香港现旅游业雇用人数为 74100 个,连同有关的活动所支持的职位有 23.6 万个。到 2010 年旅游业雇用人数将达 100100 人,相关职位支持职位将达 35.26 万人。而就旅游需求来看,98 年已达 3280 亿港元,而到 2010 年则可增至 13300 亿港元,实质增长 5.9%。由于世界旅游局的报告于 98 年作,未考虑进香港各大型主题公园建设因素,因此现时来看,实际的前景会比世界旅游局的预测更好。

四、亚洲大都会之目标展望

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其第 3 份施政报告《培育优秀人才,建设美好家园》中,将香港未来发展目标定位为:亚洲国际大都会,即是享有美洲的纽约与欧洲的伦敦那样地位的国际大都会。

事实上,正象董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所讲,香港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已具备类似纽约、伦敦的条件,如发达的基础设施,优良的营商环境、中西文化交汇以及国际金融、贸易、旅游、运输中心地位,与世界广泛的联系等等。这些即是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基础和条件。除此,要发展为国际大都会所应有的其他条件香港或者已经具备,或者有计划努力创造。

良好的区域网络是发展国际大都会的基本条件之一。香港已经在与东南亚、中国内地、东亚地区经济联系中做了许多工作,与这些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尤其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发展极为迅速,而与中国内地的密切联系又是香港成为国际大都会的最主要的独特的优势。中国内地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非常迅速,据 2000 年初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部刘世锦部长预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将维持 20 年。因此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且无疑在 21 世纪将成为经济大国和强国。香港作为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和城市,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已经非常重要,其通过加强与内地经济合作、联系,发展成为中国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从而发展成为亚洲地区的国际大都会应是完全可行的。

其他发展成为大都会的条件包括:教育水平、人才、科技基础,营商成本、环境、政府领导能力等等。这些条件中,教育、人才、科技、政府领导能力等等已有了一定基础。且香港已有发展金融、贸易、旅游、教育、科技、环境的计划,且已制定引进中国内地科技人才计划。在发展与中国内地经济合作上,香港与内地中央政府部门已成立了第一个高层次正式沟通机制——内地与香港商贸联合委员会,负责协调两地经贸事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将更加加强,香港将以其发达的服务设施网络,在内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发挥独特功能,从而使其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因此,只要港人与特区政府共同努力,加上内地的支持,香港作为亚洲的国际大都会的目标定能实现。

【责任编辑:钟言】

香港政府解决失业 的对策及其对广州的启示

孟庆顺

【内容提要】近年来，香港劳动力供需失衡，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区政府主要依靠香港政府在帮助劳动力就业方面形成的一系列惯例和制度来缓解失业问题的影响。香港政府在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秩序、提供劳动力供需信息、严格监管职业介绍以及对失业人员再培训、保护弱势人群等方面的做法为广州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香港劳动力市场的近期变化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香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在香港回归前，香港劳动力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劳动力供应甚至略显紧张，但香港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经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日益明显，失业成为影响香港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影响香港劳动力供应的首要因素是人口的变化。近年来，香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1994年为0.69%，1995年降为0.61%，1996年又进一步下降到0.49%，1997年仅为0.40%。自然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从1992年到1997年，出生率从1.23%持续下降到0.9%。与香港本地人口增长缓慢的同时，外来人口的净增长大幅上升。九十年代初的几年中，香港居民移居海外者每年高达60000人，足以抵消内地赴港定居的人数。由于香港在回归前保持繁荣稳定，海外谋生艰难等因素，移民海外人数下降，1996年降为

40300人，1997年再降为30900人。移民回流香港和内地赴港定居者增速迅猛。1992年，这两部分人仅有30200人，1997年增加到近170000人，五年之间增加了4倍多。1998年底香港人口总数为680万，比1992年增加了92万人。1986-1997年香港平均每年人口增加1.5%，但1995至1997年三年中人口增长高达3%，这是1979年以来最高的人口增长率。人口的增加必然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产生影响。

对劳动力供应影响最直接的是劳动人口的数量及劳动人口参与率。从统计数据来看，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香港劳动人口参与率没有明显变化，基本维持在62%左右。但由于香港人口的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相同的劳动人口参与率实际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劳工市场求职。香港的人口老化现象近年日益明显，65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比例从1986年的7.7%上升到1997年的10.4%；人口的年龄中位数由1986年的28.8岁上升到1997年的34.9岁。同时，接受大学预科教育及专上教育的人数比例有较大增长，1986年为13.7%，1991年增长到16.2%，1996年达到21.3%。这种变化导致处于接受大学教育年龄段的人和老年人口大量退出劳动市场，如在1990-1996年间，15-19岁年龄组的劳动人口参与率从28%降到20.5%，20-24岁年龄组的劳动人口参与率从84.7%降到78.1%，60-64岁年龄组的劳动人口参与率从37.0%降到31.4%，65岁以上年龄组的劳动人口参与率从12.7%降到7.6%。而青壮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则有所上升，同一时期，25-29岁年龄组的劳动人口参与率从88.0%上升到89.4%，30-34岁年龄组的劳动人口参与率从

1994-1998年按主要组成部分划分的香港人口增幅

年份	年底总人口	年内 人口增长	其 中：	
			年内出生 与死亡人 数差额	年内抵港 与离港人 数差额
1994	6119300	121300	42500	78800
1995	6270000	150700	37700	113000
1996	6421300	151300	32800	118500
1997	6617100	195800	28100	167700
1998	6805600	188500		

77.4%大幅上升到82.9%，35-39岁年龄组的劳动人口参与率从76.1%上升到77.1%。处于这三个年龄组的人基本上是劳动市场的主力，1990年这三个年龄组的劳动人口合共130.5万，占全部劳动人口的47.5%，1996年增加到150.3万人，所占比例上升到48.6%。由于人口的增加，不论劳动参与率是否上升，劳动人口总体在增加。1990年香港劳动人口总共有274.8万人，1998年增加到335.9万人，八年增长了22.2%，平均每年增长2.5%。但近年劳动人口增速持续加快，1996年增长3.1%，1997年增长3.9%，1998年增长4.4%。仅1995-1998年，香港劳动市场就增加了35万名劳动力。

1994-1998年香港劳动人口及劳动人口参与率

年份	劳动人口(千人)	劳动人口参与率(%)
1994	2929	62.0
1995	3001	62.0
1996	3094	61.8
1997	3216	61.8
1998	3359	62.0

与旺盛的劳动力供应情况相比，劳动力需求则难以同步增长。1991年9月到1997年9月，香港就业人数从275.1万人增加到312.2万人，6年增长了13.5%，年均递增2.1%，低于同期劳动人口增长率0.4个百分点。总体说来，这一时期劳动力需求强劲，失业者数量除个别季节超过11万人外，多数年份都在4万到8万之间；失业率除1995年末和1996年初达到3-3.5%外，其他年份多在2.6%以内，就业不足率也大多不超过1.5%，香港保持着充分就业。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香港经济受到极大冲击，1998年，香港经济实质增长率仅为负5.1%，人们投资意愿低落，经济萧条，各种公司纷纷倒闭，失业率大幅飙升，劳动力市场陷入寒冬状态。失业率从1997年的2.2%上升到1998年的4.7%，1999年初又超过了6%；失业人数同期从7.13万人增加到15.76万人和21万余人，失业率创下二十多年来的高位。就业不足率也从1997年的1.2%上升到1998年的2.5%和1999年初的3.0%，同期就业不足人数从3.79万人增加到8.55万人和10.44万人。一些人因失业生活陷于困境，因失业寻求社会保障援助者从1996-1997年的14964人增长到1997-1998年度的31942人，增长了1.13倍。失业问题成为香港特区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香港失业与就业不足情况统计

年份	失业人数(千人)	失业率(%)	就业不足人数(千人)	就业不足率(%)
1994	56.2	1.9	41.4	1.4
1995	95.6	3.2	62.8	2.1
1996	86.1	2.8	51.7	1.7
1997	71.3	2.2	37.9	1.2
1998	157.6	4.7	85.5	2.5

二、香港特区政府解决失业问题的对策

为了解决严峻的失业问题，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如政府专责小组提出了十二项解决失业的对策，包括开设新职位，加强和改善就业辅导等等。这些措施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特区政府针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另一类是政府劳工部门长期以来在协助居民就业方面一直采取的措施。

失业人数短期内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不景，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因此，当务之急一是保住现有在职人士的工作，避免更多人加入失业大军，二是尽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香港的大多数企业是中小企业，它们成为香港劳动人口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机构。从1997年香港各主要行业（不包括公营机构和建筑行业）雇佣人数来看，每个机构平均雇员数量不足8人，除在解决就业方面作用甚小的采矿及采石业、电力及燃气业每个机构雇佣人数较多外，其他行业每个机构的雇员数量均不超过20人（见表）。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银行信贷急剧收缩，许多中小企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为帮助缓解中小企业的困境，1998年夏，特区政府推出2.5亿港元的中小型企业特别信贷计划，帮助了五千多家中小企业应付困难，减少裁员或保持原有人手。1999年10月，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表示，政府决定将原来拨款的可担保贷款额提高一倍，作为对中小企业的进一步支持。

按选定主要行业划分的香港机构数和就业人数（1997年）

行业类别	机构数量	就业人数	每个机构平均雇员数
采矿及采石业	5	418	83.6
制造业	26397	309160	11.71
电力及燃气业	25	9792	391.68
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	183746	1026562	5.59
运输、仓库及通讯业	9526	177566	18.64

金融、保险、地产及 商用服务业	47651	415943	8.73
社区、社会及个人服 务业	25091	313861	12.51
总计	292441	2253302	7.71

特区政府帮助解决失业问题的直接措施就是通过投资基建创造就业机会。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年中,特区政府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九广铁路西铁第一期、地下铁路将军澳支线、扩建落马洲边界通道设施等。陆续展开的各项大型基建工程和各种工程计划,估计在未来 15 个月中可创造四万六千个就业机会。特区还对下一步的基建投资进行了规划,包括兴建七号、九号及十号干线等。五年内香港各项工程投资总额达 2400 亿港元,将在完善香港基础设施的同时为劳动人口提供大量工作机会。

香港政府在帮助劳动力就业方面已经形成一系列的惯例和制度,即以劳工处为主负责协助居民寻找就业机会并尽力保护受雇佣人士的利益。其主要措施有下列数项:

1. 提供就业信息,充当雇主与求职者之间的中介。香港有许多失业者,也有相当数量的职位空缺。如 1997 年 9 月,香港各行业有近 70000 名失业者,但同时也有 56900 个职位空缺。香港劳工处就业科免费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服务,也免费协助雇主聘请职员。该科辖下的香港就业辅导组透过多个就业中心和就业选配计划,为失业工人提供个别辅导及就业选配服务。1997 年就业科还通过“求职广场”、展览会及招聘研讨会等形式,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接触机会。当年,向就业科登记的求职者共 117424 名,该科接获雇主填报的空缺有 128981 个,转介求职个案 173259 宗,并协助 26162 名求职者获得工作。

2. 为转业工人提供再培训。近十余年来,香港处在经济转型中,结构性失业十分突出。如 1986 年制造业雇佣的工人近 95 万人,占就业人口的 35.8%;1997 年减少到不足 31 万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只有不到 10%。脱离制造业的数十万工人需要学习新的技能,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为解决这一问题,香港政府 1992 年成立雇员再培训局,通过适当的再培训,协助转业有困难的制造业工人重新加入工作队伍。截止 1997 年底,该局的各项再培训课程已提供了 209731 个培训学额。

3. 择业辅导与职前培训。劳工处辖下的择业辅导组通过开展就业教育,协助青年人选择适合他

们兴趣和才能的职业。该组设有两个职业资料中心,向市民提供就业资料,包括视听材料及文字资料。该组为青年人举办各种各样的择业辅导活动,如举行教育及职业博览会、安排学生参观各类工商业机构等。在近两年香港的待业人士中,约两万名是 15-19 岁的青少年,为了提高这些青少年的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香港职业训练局分别为中三和中五毕业生提供了约 4000 个新学额,为其进行英文和资讯技能的训练。政府还积极推动“展翅计划”,为青年提供职前培训,受到企业和学员的响应和欢迎。

4. 为弱能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劳工处的展能就业科负责协助弱能人士在社会就业,帮助他们融入社会。该科通过设在港岛、九龙和新界的办事处,为寻求就业的弱视、弱听、肢体伤残、弱智人士及精神病康复者免费提供就业指导 and 职业介绍服务。就业主任会为每名求职者个别提供辅导及就业服务。该科主要通过举办展览会及研讨会、探访雇主、向开明的雇主和表现杰出的弱能雇员颁发奖项等活动,扩大残疾人士的就业机会。如 1997 年该科在多份杂志上刊登有关弱能人士工作能力的典型案例,以促使雇主接受弱能人士,并向市民派发有关雇用各类弱能人士的小册子及指南。

5. 监管职业介绍所。劳工处职业介绍所组负责执行《雇佣条例》第Ⅺ部和《职业介绍所规例》的规定,透过发牌制度,监管职业介绍所的运作,以保障求职者的利益。凡经营职业介绍所的人士,必须向劳工处处长领取牌照或豁免许可证,除非其介绍所不在雇佣条例的管理范围内。牌照有效期为 12 个月,到期可按指定方式申请延续。1997 年,劳工处共发出 1134 个牌照。

三、香港的经验对广州的启示

同香港相比,广州的失业情况较为稳定。1986 年以来,广州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 2-3% 之间,1998 年失业率在 2.3% 左右,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总数为 15.05 万人。但这并不表明广州的失业问题不严重。无可否认,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经济状况的变化,失业者和下岗人员也在增多。城镇登记失业率未必能确切反映实际的失业水平,据广州万户居民调查情况显示,广州城镇失业率为 5.39%,按照国家统计局确定的我国可参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两套指标,处于轻警戒线(5%)附近。为减少失业者自身的痛苦及其对社会的不利影响,广州市各级政府,尤其是劳动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州劳动部门和香港劳工

处一样,通过对下岗者和待业人员实行培训及劳动预备制度等措施,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但从香港特区政府的做法中,我们仍然可以获得一些对规范劳动力市场有益的启示,吸取某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首先,劳动管理部门应成为劳动力市场正常秩序的维护者和劳动力供需信息的提供者。劳动管理部门熟悉劳工法律,也掌握较为丰富的行政资源,因而负有实施有关法律、维护劳动力市场正常秩序的重任。有些求职者的利益所以受到损害,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了解有关法律以及可以求助的渠道。因此,香港劳工处广泛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劳工处的服务和劳工法例。凡有违反《雇佣条例》的现象,劳工处就要出面干预,以保护劳资双方的利益。由于劳工管理部门同劳资双方都有密切关系,最容易了解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适于充当求职者和雇主之间的中介。香港劳工处及时向社会提供职位空缺的信息,并制作“择业速递”电子公告版系统供有需要的人士通过电脑网络了解香港的就业状况。1998年该处还成立了职位空缺处理中心,到1999年下半年每月透过电脑可提供约12000个职位空缺的资料,平均每月为4000多人找到工作,为失业者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服务。

其次,对职业介绍所应予以严格监管。广州职业中介机构管理混乱,鱼龙混杂,求职者上当受骗的案例屡屡见诸报端,这同政府部门监管不严有极大关系。香港法律规定,职业介绍所须领取牌照,而且必须保存其用于介绍职业的指定登记册和记录,并保留至职业介绍所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最少12个月,劳工处处长或其授权之人可在任何合理的时间前往检查。当求职者获得职位后,职业介绍所收取的佣金不得超过其第一个月月薪的10%。该所为雇主觅得雇员向其收取的佣金数目,由雇主和职业介绍所双方议订。除此之外,职业介绍所不得因介绍职业而收受任何报酬、款项和利益。严密的规定和严格的监管保证了职业介绍所和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利益,避免了职业介绍所随意损害求职者的利益。

再次,失业人员的再培训工作应贯彻政府与社会受益者共同出资、独立管理、鼓励培训、学以致用原则。以香港雇员再培训局为例,该局是一个为本地雇员提供技术训练,以应付香港经济转型的独立法定团体。该局以信托方式持有基金,并按法定的宗旨管理基金。雇员再培训基金以政府七年中先后分三次注资的11亿港元为基础,另向合法雇用外地工人的雇主征取每名外劳每月400元的费用

作为固定收入,基金还接受社会捐款。雇员再培训局是一个独立机构,而非政府部门,其成员包括政府、雇主、雇员、培训机构及人力策划从业员的代表。在该局最多不超过17名成员中,公职人员不得超过3名,而且主席和副主席都不能由公职人员担任。为了使有限的资金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该局不是建立自己的培训机构,而是挑选具有职业技能训练或成人教育经验的机构为认可培训机构,拨款资助其举办再培训课程。为了鼓励失业人士参加培训计划,对失业者提供的所有再培训课程均为免费课程,如其修读超过一周的全日制课程,还可获发再培训津贴(每周933元-1000元)。该局的一个职能就是找出空缺率高的工种或行业,使合格通过培训者得以在该工种或行业就业或重新就业。培训机构设有专业的就业辅导组,负责跟进雇主提供的职位空缺情况,并免费将适合的学员介绍给雇主面试。如果雇主有20个以上的职位空缺,再培训局还可为该批空缺度身订造再培训课程,协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手。这些措施保证了接受再培训的失业者有较高的再就业率,1998至1999年度该局培训了近七万名学员,培训的工种包括资讯科技助理、保安员、物业管理员、家务助理和健康服务助理等,其中七成的学员实现了再就业。

最后,保护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是劳动部门一项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由于先天因素及其他非个人所能控制因素的影响,某几类人在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优势:残疾人因身体或精神疾病受到歧视;年长者转业可能因掌握新技术慢等原因难以找到工作;刚刚步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少年则因为没有经验不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且可能会在求职过程中受到欺骗;外来劳工因不了解当地情况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等。为解决各类人士的难题,香港有关机构对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如雇佣残疾者和年长者(30岁以上)的雇主会受到劳工处和雇员再培训局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新求职的年轻人则会受到劳工处的悉心指导,提醒他们避免陷入“求职陷阱”;至于外来劳工,劳工处专门有一个劳工视察科视察外来劳工的工作及住宿地点,避免有侵害工人利益的事情发生。广州也在许多方面对弱势群体予以关照,但尚需采取一些更具体的措施来帮助他们,尤其是外来工利益受损的情况还发生较多。广州的劳动力市场应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只有既保护广州人又不歧视外来工才能在法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

【责任编辑:陈丽君】

回归后的香港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与变化

蒋廉雄

【内容提要】香港的医疗卫生服务是香港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中比较定型的成分，在服务的福利水平上接近于全民性的免费医疗或国民保健。但由于香港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实行低收费、高津贴，产生了政府在医疗开支上负担沉重的问题。回归后的特区政府对医疗卫生制度进行检讨，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减轻政府负担的医疗卫生制度的意图。劳资医疗供款成为这次医疗服务改革讨论的焦点。在制度本身的发展上，也需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医疗服务制度的福利水平与融资体制的矛盾，二是各阶层利益的兼顾性问题，三是还需要作多方面的操作性的评估。

医疗保障是香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政府自七十年代开始逐步发展对市民的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了类似于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医疗服务体系由政府兴办的公立医院（包括诊疗所）、非牟利机构兴办的补助医院和私营医疗机构组成。1987 年香港政府将公立医院和补助医院统一归纳到医院管理局实行一体化管理，这样香港的医疗机构实际分成了非盈利和盈利的两类。此外，政府还向市民提供家庭服务、社康服务、学生保健、戒毒服务等保健性服务。

香港的医疗卫生服务在性质上接近于全民性的免费医疗。香港八成以上居民在公立医院和补助医院就医，除交纳挂号费和膳费外，其他费用全免。只有极少数富裕人士去服务水平和费用更高的私立医院求诊。香港居民不论贫富，只要愿意都能平等地获得必要的医疗卫生服务。因此香港虽然没有推行全面福利的模式，但其中有些社会保障制度如综合援助计划、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保障水平较高，措施也较完善是其特点之一。

但也正是由于香港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实行低收费、高津贴，产生的一大问题是政府在医疗开支上负担沉重。目前香港政府承担了 97% 的医疗费用。同时私人医院收费昂贵，香港普通居民甚少光顾，使公立医院服务量有增无减。1990 年香港医疗开支占政府公共开支的比例为 9.8%，1998 年这一比例上升为 14.6%，预计 2010 年将上升到 19 - 22.2%。按照目前的趋势，政府在医疗开支方面的压力将无从得到舒解。

面临医疗开支居高不下的压力，香港政府在九七回归后着手对低收费、高津贴的医疗卫生制度进

行检讨，并表现出对现存制度进行改革，试探建立一种全新医疗卫生制度模式的意图。99 年 4 月，香港政府公布了委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所领导的专家小组对香港医疗制度的顾问报告。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应，社会各界纷纷加入到香港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讨论之中。

顾问报告认为，香港现存的医疗卫生制度虽然取得了好的成就，但也认为香港现存的医疗卫生制度存在以下弊端：

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现在的医疗服务体系缺乏定期收集服务信息的手段和统一的评价标准。

现存医疗卫生制度的资金筹付（融资）问题。香港的医疗开支在政府的公共开支中是仅次于教育的第二大开支。目前医疗开支占政府的预算约在 13 - 14%，居民在接受医疗服务中只承担极低的费用。随着医疗经费需求增加，现在的财政制度未必能承担未来不断上升的开支需要。而且不断膨胀的医疗开支日后还会直接影响教育、福利、房屋和基础设施等问题的发展。此外，政府的医疗支出只有一半用在公立医疗上，经费的有效运用也存在较大问题。

对医疗体系的组织管理问题。香港虽然自 90 年成立了医管局，但在医疗机构的架构上，基层医疗、住院服务、社区医疗以及公营、私营服务机构缺乏服务的统筹和连贯性，导致服务重叠，资源浪费，病人的服务反而受到影响。

因此，顾问报告建议对香港医疗服务进行认真检讨，对医疗服务政策、医疗制度的财政、服务架构方面的问题进行改革，以满足香港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顾问报告提出了医疗卫生制度的五种改革方案。

方 案	要点与评价	建 议
A: 维持现状	1. 最简单的办法 2. 政府需要增大拨款, 但随着人口增加、人口老化及需求的增加, 组织架构与财政都无法维持	建议 不采用
B: 政府增加 预算设置 上限	1. 医疗素质下降 2. 居民轮候看病时间增加	建议 不采用
C: 增加收费, 多用多付	1. 将医疗上升的成本转嫁到病人身上	建议 不采用
D: 联合保健 与护老储蓄	· 联合保健 1. 全民参与 2. 雇主、雇员各供款 1.5 - 2%, 政府为失业、老年、家庭主妇等人士供款 3. 成立联合保健公司管理和负责医疗保险计划, 包括与各公营和私营机构洽谈厘定各项服务的划一收费 4. 病人可自主选择公营或私营机构的医疗服务 · 护老储蓄 1. 强制在职人士参与 2. 雇员自己供款 1% 作为储蓄金 3. 供款集中投资, 雇员 65 岁退休后用此购买长期护理保单, 如在退休前不幸去世, 存款拨入遗产	建议 采用
E: 竞争性一 体化护理	1. 重组医管局为十二或十八个地区性医疗一体化系统 2. 由医院与普通科或专科家庭医生设定合同, 共同提供预防、基层医疗、门诊、住院和健康护理服务	建议作 为发展 方向

尽管顾问报告提出了上述五种方案, 但可以看出顾问报告的核心是要解决香港医疗制度的融资问题。因此它建议香港政府采用联合保健与护老储蓄作为香港医疗制度改革的方案。这一方案的直接好处可以在根本上减少政府目前在医疗开支上与日递增的负担。对香港居民享受医疗服务的利益, 方案认为由于各医疗机构采用统一的医疗项目收费, 可大大增加居民对医疗机构的选择的自由。在制度的保障功能上, 通过一定程度的社会收入再分配, 使重病患者、长期病患者得到保障治疗。同样通过政府为失业、老人、家庭主妇供款使低收入或无收入人士不致于因新制度而失去目前享受的医疗服务。

由于顾问报告建议采用联合保健与护老储蓄制度 (或称之为中央保险制度)。该项制度中的劳资医疗供款成为这次医疗服务改革讨论的焦点。多数政党、社会团体及学者对市民供款能力表示担忧。香港在明年将启动强制性公积金制度, 居民供款水

平已达 5%, 若再加上联合保健的 2.5 - 3%, 心理和资金随能力有限。商界也出于供款负担忧虑, 认为在实施强制性公积金供款后再推行医疗供款, 会大大增加营商成本。部分舆论也认为, 月入达到 4 万元人士在住院时须额外垫付一笔“额外费用”, 实行上使中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供款后无病、少病人士实际上是在变相补助有病、多病者, 无异于变相征税。而业界人士对建议的方案也持保留态度, 认为强制供款的医疗保险减少了市民运用财政的自主权, 甚至由保险公司给供款市民指定服务的医院会进一步限制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选择。至于划一的医疗项目收费, 会限制公立和私立医疗的发展。

目前香港政府尚未对医疗制度的顾问方案正式表态, 但为减轻财政负担, 对现在的医疗服务体制的改革已露端倪。去年底, 港府人士透露, 将于 2001 年在公营医院中引入新的收费项目, 包括对使用急诊室及专科门诊人士收取药费。对顾问报告推荐的联合保健和护老储蓄方案也表示赞同倾向。若推行这一方案, 面临一些问题需要回答。一是医疗服务制度的福利水平与融资体制的矛盾。顾问报告推荐的改革方案, 在融资上倾向于用者自付, 与目前政府基本承担全民医疗开支的制度相比, 要保持全民目前的医疗福利水平特别是人人可享用性是有疑问的。二是各阶层利益的兼顾性问题。改革方案虽然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设计了照顾的措施, 但采用供款制度后, 中产阶级、低收入但未至贫困的阶层的利益相对会受到损害。这些阶层的人士按照政府规定缴纳了应缴的税款, 目前能直接享受的福利主要就是医疗服务。如医疗改为供款, 他们是福利制度的纳税人, 但却排除在接受福利的范围之外。特别是低收入人士或家庭, 到时面临沉重的医疗开支压力, 却又不够申领综援的标准, 可能出现生活艰难处境。三是还需要作多方面的具体和操作性的评估。例如在雇员、雇主各自 2.5 - 3% 的供款水平下, 供款人到底能享受何种程度的医疗服务, 顾问方案尚付诸阙如, 划一的医疗项目收费可否实行, 会否给香港的医疗事业的发展产生抑制性影响。在联合保健基金公司的运作下, 病人自由选择医疗服务的权力是否可以实现等等问题。由于医疗卫生制度与综援制度被视为香港居民的最后一道生活防线, 因此香港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不单单是该制度本身的问题, 对香港民生影响重大深远, 需谨慎稳重处置。

【责任编辑: 多天】

香港住房政策的发展：政府角色的变迁

王小宁

【内容提要】对于公共住房资源的管理，香港政府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政府介入干预”，再从住房分配的“行政化”到“市场化”的角色变迁。本文通过分析香港住房政策的发展，透视香港政府公共管理角色的变迁。

一、住房政策的界定

住房政策(housing policy)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优化都是政府行为。英国住房政策专家唐立信(Donnison)认为，住房政策是指政府以影响住房状况为目标的一系列行为，住房政策与投资政策、就业政策、失业救济等政府行为是密切关联和相互配合的。^①美国学者麦佳年(McGuire)也认为，住房政策仍是政府及私人部门(private sector)合力为市民提供住房服务的活动。每一社会的住房生产、供给以及财政负担，即住房资源的配置，皆受政府行为、社会习俗和市场力量的综合影响。^②由于受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住房政策的目的与措施都会因时而变。这些变化着的政策措施，也许称其为住房计划(housing Programme)更为贴切。

香港学者刘国裕指出，一般而言，政府介入房屋市场，主要通过四种方式：直接提供公共房屋单位；津贴；管制；税项宽免。他认为，香港政府除了无提供税项宽免之外，其余方式均有实行。^③

综合来看，住房政策过程是一种政府介入行为，其目标是实现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平分配、优良服务，并通过平衡住房资源的社会利益分配，调节与缓解因住房问题而可能引发的利益矛盾。^④所以，住房政策不仅是住房利益权威性分配的结果，同时也是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

二、香港住房政策的演变

考察香港住房政策的历史演变，发现香港政府角色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从自由放任到政府介入；二是从政府积极干预到政府的积极不干预。

1. 从自由放任到政府介入和积极干预

本世纪50年代以前，港英当局对住房市场采取的基本政策立场就是自由放任主义。这时香港的住房活动基本上是私人行为。这种自由放任的局面在1953年后开始有所改变。所谓“徙置计划”就

是政府把居住在“木屋区”的居民(主要是大陆移民)迁移到“徙置区”。1949年后，由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大量移民涌入香港，导致本港住房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为了安置移民，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港英当局准许人们在指定的区域兴建木屋。这种“木屋政策”具有明显的社会歧视性和消极性。一方面，木屋区分布在社区边缘地段，也就是把移民与原住民隔离开来。另一方面，这些临时性的木屋区，基础设施空白，无水无电，木屋建筑连片密集的结构，又使环境卫生恶化、火警频频，险像频生。1953年九龙石硤尾木屋区的大火灾，烧毁了五万多人的居家。政府为救济这些无家可归的灾民，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成为驱使港英政府介入公众住房管理的一个直接原因。

木屋火警及其他住宅安全问题(例如流行性疾病等)不仅直接威胁着木屋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危及那些延伸至木屋区的银行、公司、教堂、学校等公私部门的利益。这一社会问题驱使港英政府采取行政干预社会的住房问题。表现在政策行为上，就是通过了一个徙置法案，设立徙置事务处，专门负责清拆木屋及安置木屋居民。“徙置计划”从1953推行至1973年，结果在港九地区共建立了25个徙置区，徙置人口100多万。这些徙置区的住房大多是政府建造的公屋，目前仍然是香港低收入阶层的主要生活场所。

如果说“徙置计划”是港英政府住房政策的雏形，那么这个政策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消除已经暴露出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不是为了解决住房的公平分配问题。这个政策举措的目的，正如当时一份官方报告明白指出的那样：“木屋居民并非单纯因为他们需要或值得获得符合卫生和防火标准的居所而被徙置；他们被徙置是因为香港再不能容忍木屋区代表着的火灾和卫生风险，以及对香港公众秩序和声誉的威胁，同时也因为香港需要那些被木屋居

民非法霸占的土地。”^⑤

尽管如此,徙置计划持续推行的结果,改变了政府当局对公众住房事务的基本立场,迫使政府放弃传统自由放任的政策导向。我们可以从第 25 任港督麦理浩的“十年建屋计划”清楚看到这一点。

麦理浩(C. M. Maclehouse)于 1971 年始任港督。在其任上(1971-1982),港英政府的住房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被动的徙置行为向积极主动的住房分配与监控行为转变,从而加强了政府对公共住房资源的配置功能和管理角色。为此而成立的房屋委员会,推行了十年建屋计划和“居者有其屋计划”。

1973 年,港英政府提出的“十年建屋计划”,宣称的目的是为全港市民建造理想的固定居所,计划在 73-82 年的十年间,每年为 20 万人提供居所。“居者有其屋计划”是十年建屋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明显地表明,政府力图在住房事务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并努力塑造“亲民政府”的形象,以巩固英国在港的殖民利益。

“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尽管满足了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要求,但这种“福利化”政策导向无疑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1982 年港府的财政预算就出现了少有的赤字现象。从长远来看,福利化的住房分配制度,将会导致政府对住房市场的垄断,从而限制私人部门介入楼市,最终不利于本港房地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这样的政策导向与香港自由市场的内在机制也是存在矛盾与冲突的。

为了使住房政策与香港自由市场体制协调起来,在本世纪 80 年代初,港英政府秉承撒切尔政府所奉行的“新保守主义”方针,公共部门管理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改革方向,着手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公众对科层官僚制度(bureaucracy)的不满情绪。这些政策原则的变化,对香港住房政策的影响,一是政府开始减少对高工薪阶层的公屋补贴,并于 1985 年推行了“公屋住房资助政策”,即所谓的“富户政策”。二是改革以科层制为运作机制的政府供应制,通过调整房委会的财政安排,使住房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朝着市场化(marketisation)和私营化(privatisation)的方向发展,并希图由此而使政府的住房政策与香港经济的市场机制相衔接。

2. 从政府的积极干预到积极不干预

公共住房的政府供给制是政府对住房资源配置

进行积极干预的基本形式。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对公共住房的规划、设计、建造、分配、管理和服务等一系列具体事务,都是实质上的经营者或“业主”。如果说公屋是由政府直接供应的社会福利项目,那么住户就是这种福利的被动消费者。所谓“被动”就是消费者过分依赖政府的公屋供给,住房的消费者缺乏选择的机会,只能按照公屋分配规则而苦苦等候,并容易引发对有关公共部门官僚主义行为的抱怨。

所谓“积极不干预”就是政府积极主动地把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机制引入住房资源的配置过程,改革住房的政府供给制,减少政府对住房的直接分配行为和干预程度,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对住房资源的配置功能。

这种变革的方向,在 1978 年就出现了端倪。是年,香港政府开始推行所谓“居屋计划”。这一政策鼓励公屋住户自置居所,以便他们腾出公屋让给最有需要的家庭。为了推行这一政策,政府向开发商免费提供土地资源,同时还规定了一些限制性条款。例如,发展商提供的居屋价比私人住宅低 30-40%;居屋购买者可获得各类金融机构的贷款;居屋住户在 10 年内不得转售,10 年后如要出售,须补偿地价给政府。自该计划自 1978 年实施以来,总共向符合要求的家庭出售近 20 万个住房单位。从而在福利性的“公屋”旁边形成了一个居屋市场。目前大部分香港市民所购买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居屋。随着居屋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政府在政策措施上有意削减对公共住房的财政预算,并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公共住房建设。

1987 年,香港房委会提出了“长远房屋策略”,提倡“私人市场主导”,着力改变过去的政府供应制,标志着港府在住房政策上从积极干预到积极不干预的转变。按照该策略意图,港府推出了“自置居所贷款计划”,以满足想买房而又想有多一点选择的人的购房要求。公屋住户及有资格入住公屋的家庭在市场上购买楼花或楼龄未逾 15 年的楼宇,可申请自置居所贷款,可获一笔 30 万元港元的无息贷款或领取为期 48 个月、每月 2600 港元的按揭还款补助金,领取一次性无息贷款的家庭在以后 20 年内按月摊还贷款;至于享受每月按揭还款补助金的家庭,只要遵守按揭还款补助金协议及签订的楼宇转让契约,无须偿还领取的补助金。上述的政策导向推动着香港住房朝着市场化和私有化方向发展。进入 90 年代,香港政府又推出了“公屋

出售计划”。这一计划也是香港住房长远策略的一部分。

香港住房公共管理部门检视了香港住房政策的发展经验,对未来住房发展提出了政策性规划,期望可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就香港住房长远发展策略而言,可供政府选择的政策导向有三:公屋主导,居屋主导,私人住宅主导。作为利弊权衡的结果,香港政府最终选择了私人住宅主导的战略。这个战略的最终着眼点是刺激本港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发展,并由此带动金融股市、资讯、中介服务、市政建设、零售商业等行业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住房政策已成为香港政府通盘考虑香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要素,而不是仅仅作为市民福利的一个孤立的政策措施。

三、结论:政府角色变迁

香港住房政策的历史演变,实质上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干预角色的变迁过程。50年代发生“石硤尾火灾事件”,暴露了这个以奉行自由放任为幌子的殖民政府不负责的性质。当木屋安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后,香港殖民政府才不得不改弦易辙,介入公众住房事务。但港英政府最初对住房问题的介入行为,与其说是为了解决木屋区的安全问题,不如说是为了消除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从50-60年代港英政府所推行的“徙置”政策的实质性目的来看,这一政策显然是为了清除木屋区“霸占”的土地资源,然后拍卖给私人资本家。即使在六十年代,港英政府公屋政策的一个重点,也不是为市民提供良好的住房条件,而是政府刻意为工业资本家提供土地资源,以刺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这种袒护殖民利益和资本家利益的政策,不仅不能,激起了港人的“六七暴动”。而这一暴动直接威胁着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殖民当局从着眼于巩固殖民统治合法性的考虑,对港人采取了一些安抚民心的措施,表示政府有诚意及能力管好香港。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英国当局委派了地位较高的麦理浩,在麦理浩秉承英国统治意图的麦理浩,在教育、医疗、房屋和社会服务是殖民统治的支柱,并将其作为施政的主要方面。在这一背景下所推行的“十年建屋计划”,是为了把殖民政府塑造成一个对社会公共福利管理的力度,逐步形成了住房

供给制。客观上这种政府供给制对营造一个安全的社会生活与投资环境发挥了应有作用,这也就为香港经济的起飞奠定了社会基础。

80年代是香港政治大变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港英政府同样推行撒切尔政府所奉行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导向,体现在住房政策方面,就是力图通过公共部门市场化和私有化的途径,减轻政府在住房福利上的财政负担,发挥自由市场的配置功能。政府通过制定配套的财政金融政策、住房土地专门使用等政策,变“公屋分配”为“居屋购买”。

90年代后的香港政府,更加注重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平衡住房供求关系,鼓励私人机构投资住房市场开发,使高收入阶层有机会选购私人住宅,从而分流社会对居屋市场的压力。而地产市场的活跃,又带动了银行借贷、股票市场、建筑市场的兴旺。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的兴旺已成为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之一。这与香港政府积极不干预的角色定位不无关系。

总之,香港政府在住房政策上的角色,已经从过去的政府供给制为主转变为市场供给制为主。经过几十年的演变,香港的住房类型大致可分为:(1)低廉租金的“公屋”;(2)政府贴息或补贴的“居屋”;(3)质优价高的“私人住宅”。它们分别适应了香港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实际需要和负担能力。由于香港社会结构的中产阶级化以及香港市民收入的稳定提高,政府有条件继续推行以公屋商业化和居屋市场化为导向的住房政策,并在保障住房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继续扮演积极不干预的政府角色。

①Donnison, David & Ungerson, Clare: Housing Policy, Penguin Books, 1982, p.13.

②McGuire, Chester C: International Housing Polic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oronto: Lexington Books, 1981, p.3.

③刘国裕:住房政策与公平——争辩与发展方向,载《香港社会政策的回响》,集贤社香港社会政策系列(二),1990。

④参见郭正林、王金红著:《公共政策分析引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8-9。

⑤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1954-1955)

试论中国加入 WTO 对香港经济的若干影响

刘清溪

【内容提要】中美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双边协议，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最近，中国又陆续与几个国家就“入世”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据估计，今年内中国“入世”问题不大。“入世”对于香港经济发展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本文拟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中国入世为香港提供了大量商机

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后，中国“入世”对于香港经济的复苏，并实现创新科技新路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为香港的对外贸易带来新商机。

首先，中国“入世”后港产品出口率将趋稳定，现时超过 90% 的香港制造商均在中国设厂生产，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就设有数万家企业，雇用五六百万工人。但每年美国有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审议使港商信心受损。因此，近年来，一些有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香港公司，正尽力减少到内地采购货源，甚至打算将设在内地的公司的货品运往他处。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中国可自动享有包括美国在内的 130 多个成员国给予的正常贸易国待遇，西方国家的歧视性贸易政策和条规也会取消。另一方面，中国加入世贸后，尽管“反倾销”问题仍然存在，但却有助消除“最惠国待遇”的不明朗因素，从而为港商投资内地提供一个更稳定的贸易环境。

其次，中国加入世贸是以扩大市场开放为前提的，整体关税水平将降至 10% 以下，这将为香港

产品扩大对内地的出口提供契机，港商在内地投资企业的内销份额有望进一步扩大。目前，香港与内地经济趋于一体化，内地已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据统计，1998 年，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总额达 1338 亿美元，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 38%。另一方面，现时港商在内地加工贸易生产的原料及设备中，80% 以上是靠进口的，关税的削减将使原材料入口价格成本降低香港设在内地的工厂将可降低成本。还有，在“国民待遇”政策之下，内地对外商各类的歧视性收费也会消除，这些都有助于降低港商营运的成本。

第二，中国加入世贸将为香港的服务业带来商机。据有关数字显示，香港本地生产总值有 85% 来自服务业，而内地的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 35%，内地的服务业占经济生产总值仍比香港低，要追上与香港的水平至少也要二十年时间。由于内地将扩大对外开放，国企面临的竞争压力将会更大，迫切需要更多的资金，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给香港这个亚洲服务中心带来了商机。

金融业方面，香港是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银行业、保险业、期货业、股票市场、基金管理、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均相当发达。中国加入世贸后，将允许进一步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香港银行业将大有可为。鉴于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华南各省，有大量港资公司及与香港交易频繁的内地厂商需求人民币信贷，从而成为香港银行业在内地

庞大的潜在客户, 这为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 香港银行与其它外资银行相比, 在内地的运作处于领先地位。到去年为止, 在内地设立的外资银行共 142 家, 其中仅香港就占了 26 家。另外, 香港证券业与内地联系密切。据统计, 内地的外资证券公司共 58 家, 香港占了 18 家, 比美国公司多了 5 家。由此可见, 香港金融市场在内地对外筹资中,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香港是亚洲地区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据香港工业署的统计, 海外公司在港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达 819 家, 地区办事处则有 1630 个。入世后, 随着内地市场的开放, 部分跨国企业会直接进驻内地市场。然而, 鉴于香港对内地市场的掌握, 语言上的优势, 了解内地的情况以及与外资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大部分跨国企业都会乐意和港商以合伙人形式合资做生意, 视香港为投资伙伴, 故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对外桥梁的地位势将提高。另一方面,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必然加快开放电讯市场, 这对香港来说是一大喜讯。现时中国仍禁止外商直接拥有或经营电讯网络, 一旦中国内地全面开放电信服务、传呼服务、流动电话服务及固定电话服务, 将为香港电讯业带来源源商机。目前, 香港传呼服务及流动电话营运商在全球市场非常活跃, 尤其在亚洲尤为突出。他们大可把握中国加入世贸的时机, 联合外国公司或自行大举开拓内地的电讯市场, 由于新机场的启用以及物流中心的筹建, 香港在亚洲航空运输业中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第三, 推动香港向创新中心、资讯中心的方向发展。

长期以来, 西方国家对向华输出高新技术实行严格限制。中国加入世贸后, 这种限制将有所缓和。香港作为内地与国外高新技术合作的中介, 在为内地引进高科技的同时, 也可推动本港向创新中心、资讯中心方向发展。不久前, 香港政府已打算从内地引进优秀人才, 一旦人才大量涌入, 加上西方国家对高科技输出的限制减少, 则要实现特区政府提出的“建立华南乃至亚洲的创新中心”的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实际上, 特区政府对此发展战略较为重视。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任以来, 在施政报告中多次提及香港要发展高增值产业, 发展

资讯产业、高科技产业和中药产业, 为香港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二、香港面临的挑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香港带来大量商机的同时, 也使香港面临着挑战。如何抓住机遇, 接受挑战是摆在港人面前的课题。

第一, 香港的贸易中介角色将受影响

中国未向外界完全开放前, 香港依靠其先进的基础设施, 广泛的资讯及市场网络, 以及人才和管理方面的优势, 能吸引较多的外资以香港作为“桥梁”进入大陆。中国加入世贸后, 为海外投资者大开方便之门, 外资将直接进入大陆, 令香港的中介地位日趋下降, 其“桥梁”作用甚至有可能被上海、深圳、大连等港口城市取代。

另一方面, 加入 WTO 后, 中国与国外的直接贸易量将大大增加, 香港作为传统出口和货物转口的地位必将削弱。一些以往较多依靠香港中转的进口产品如汽车、专用设备, 将会逐渐由海外商家在国内设立地区总部来直接经营, 香港“中转站”的地位将受到很大冲击。

第二, 香港的专业服务业将面临挑战

“入世”后, 随着中国加快同国际社会的接轨, 对专业服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一方面为香港专业人才在内地大展拳脚提供机会, 另一方面, 虽然本港专业服务水平较高, 且已同国际社会接轨, 但由于其高昂的收费和服务成本, 影响了香港专业服务在内地的竞争力。因此, 如何使本港的会计师、律师、审计师以及其它专业服务人才适应中国入世后的新形势、新需求, 是香港未来需面对的一大课题。

事实上, 内地及香港的某些专业团体已意识到了竞争的压力, 纷纷讨论入世后对策。他们认为, 两地的专业团体需自我装备, 提升水平, 加强竞争能力; 其次, 两地要积极建立紧密联系, 加强沟通切磋, 然后制订一套既不太宽松, 也不太苛刻的专业评审资格的标准, 当然, 本地专业团体也必须符合这套标准, 才能在市场竟争。

第三, 港产品在内地的销售压力增大

港商在内地的投资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大

部分产业仍未能跳出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状态,技术升级面对许多困难,中国加入世贸后,海外高科技公司直接进内地设厂,关税的降低又使高科技洋产品长驱直入,港产品的内销压力必然增大,另外,中国入世后为国内同类企业的产业升级和产品换代提供便利,这无形中使港产品在内地市场压力增大。

三、面对机遇与挑战港人的对策

香港能否把握住中国加入世贸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重创经济辉煌,对港人来说确实是一场考验。笔者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配合中国加入世贸培训专业人才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的最根本影响在市场的开放。长期以来,中国在电讯业、保险业、银行业及证券业以及零售等专业性服务,对外资均采用限制的做法,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大量外资将涌入。在上述有关行业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当然是必要的,另外,在下述范围的培训对配合中国市场的开放及外资的涌入大有益处。

首先是加强贸易法规的训练。以前香港有部分从事中国贸易的人以钻中国法规条文空子为营生本领。但是中国入世后,外资将事事以法律条文为依据。可以预见,经过若干年及若干次法庭(特别是涉外的国际法庭或他国法庭)判决及执行后,条文不但被确立而且被遵守的了。做生意的手法从此也必须改变。可以断言,不懂得中国贸易法规是很难再在中国更加开放的市场生存下去的。其次,由于在应用资讯科技进行买卖的加速发展,人才培养也就要加速在应用国内的简体字电脑软件及互联网方面作出相应的改进。另外,应提高内地销售人员培训质量。其实香港的销售人员的优势在于对市场概念掌握及手法上,因此可以把培训内地销售人员的工作借鉴过来,也就是改变成如何训练他们去训练内地人才成为销售能手。

第二,加强港府与中央政府的协调

为了充分发挥香港在内地的竞争优势,加强两地、地方政府在各方面的协调乃是当务之急。

在海关运输方面,应简化边境过关的繁杂手续,加快陆路运输的速度,并加强海运、空运的配合,通过增加航班来应付两地未来贸易的增长;在工业扶助方面,两地政府可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设立“科技发展中心”,引进国际专业人才,充分发挥两地人才和资源的作用,努力提高两地外向型企业的技术应用水平。在吸引人才方面,港府应为海外和内地专才来港提供方便,应为聘用外来专业人才的企业作出税务等优惠。在融资信贷方面,香港应容许更多的香港银行、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在内地经营。香港的银行、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对港商经营状况熟悉,大多非常乐意为内地的港商提供金融、信贷、保险的服务。另一方面,它们资金充裕,也有能力向内地企业提供金融、信贷、保险等方面的有效服务。此外,两地在基建方面、意见表达方面均应加强合作。

第三,提高粤、港、澳三地的合作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三地经济联系密切。面对中国加入世贸的挑战,粤、港、澳可以从下面几个领域加以合作:首先是在加工贸易领域,必须重视三地已经形成的“前店后厂,来料加工”的合作方式。虽然这种合作方式今后仍然有生命力,但随着中国加入WTO的进展,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传统合作方式的内涵要提高,加大科技含量,在高科技领域方面发展加工贸易。其次,三地应加强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特别是有利于提高通关能力的设施和有利于发挥三地整体功能设施方面的合作。另外,在旅游方面,以“一江春水、一串明珠”的粤、港、澳旅游金三角,在国际旅游市场上享有极高声誉,三地若能进一步互相配合,放宽旅游限制,为游客提供便利,则三地旅游业发展有望更上一层楼。还有,在环境保护、联手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方面三地今后也应加强合作。

【责任编辑:多天】

战火中的“世外桃源”

1937 - 1939 香港生活印象追忆

许锡挥

[编者按] 本文作者通过对其亲身经历的追忆，从侧面记述香港的一段历史。

“周围炮火连天、血肉横飞，而这里仍然灯红酒绿，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本地的洋人和高等华人继续过着豪华、惬意的生活。几乎占了当时全港总人口一半的外来难民，他们当中的达官贵人当然可以尽情享乐，而那些穷苦百姓，似乎也可以苟且偷安。”这是我在《香港跨世纪的沧桑》一书中对抗战初期香港社会生活的概括描述，其中也包含着我亲身的经历。

60 多年过去了，有些往事早已烟消云散，有些依然在脑海中浮现。那时我尚处于幼年，但战乱会使人早熟，许多见闻至今难忘。

避难异域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还未满 5 岁，但现在仍依稀记得广州第一次空袭警报的情景，那天我们全家在楼梯底下过夜。母亲带着我们五兄弟姐妹去香港避难，约在 1937 年底。

初到香港，我们一家六口加上祖母和姑姑挤住在一间旧楼房，用布料作间隔，睡行军帆布床，这是我初次尝到的逃难生活。这里是九龙油麻地炮台街的低下阶层集住区，我倚窗外望，只见街道狭窄、脏乱不堪，怎能和我们广州东山的景象相比？香港在我幼小的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是很坏的。

不久，我们迁往港岛铜锣湾金龙台姨妈家中暂住。这是半山区，座落着一幢幢小楼房，我们住在三楼。从阳台和窗户北望，维多利亚港尽在眼前，帆船在巨轮旁缓缓漂过，海鸥低飞盘旋，这时，我才知道香港是如此美丽的地方。

两家人同住，当然挤迫，却也热闹。姨丈远在美国做外交官，姨妈领着六个女儿暂时安居。我的哥姐们与香梅、香莲、香兰、香竹等表姐年龄相近，他们玩得较多，我和最小的香桃表姐跟在后面

淘气。记忆中，1937 年的圣诞节，大家曾度过一个有趣的平安夜。这时，幼小的我只听到周围的笑声、歌声，却不知道姨妈和妈妈都隐藏着与丈夫分隔的痛苦，也不明白他们对战局和生活的忧虑。这段短短的日子，给我留下了快乐的回忆。

60 多年之后，那是 2000 年寒冬的一天，当我重临港岛铜锣湾金龙台下仰望，眼前是林立的大厦，昔日的踪影已如云烟。

广州遭受日军狂轰滥炸的消息不断传来，听说我们的家附近落下一枚重磅炸弹，爸爸的安全令人担忧。惊人的消息是在我们搬到九龙深水埗福华街之后得知的，楼下的梅医生进门的第一句话：“广州丢失了！”妈妈立刻陷入深深的哀愁，幼小的我也尝到了战争带来的震撼。爸爸到哪里去了？家里东西都被日本鬼子抢去了？

几天之后，有人匆匆来告诉妈妈，听说许多重要人物都来不及撤走，被日本人押上了军舰。当这个坏消息传来时，妈妈表现得异常镇静，谁能了解她内心的痛苦呢？！幸而好消息很快得到证实，爸爸已安全撤到粤北，但他们的车队一路被日本飞机追击，历尽惊险。

广州突然沦陷，在香港激起了巨大反响，我记得，妈妈拿着报纸给我讲一首讽刺油诗：“希德不德，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甫（谱）。”这首诗通过对莫希德（防守惠阳的 151 师师长）、余汉谋（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曾养甫（广州市长）的讽刺，表达了对当时政府的不满。许多亲戚朋友到我家来，有的摇头叹息，有的义愤填膺。我上街玩耍，察见路人也有异样的神情。

广州沦陷之后，香港成了孤岛，而人口则急剧增加。我们所住的地方，周围有许多来自广州的逃

难者，其中也有父母的老朋友及亲戚。原来在广州的著名学校纷纷迁到香港，我的哥姐们都就地入了岭南、培道、真光等学校。真光小学就在我们楼下，对面则是侨光中学。

对于处在特殊年代的这个特殊社会，幼小的我是不可能了解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一幕幕身边的景象似乎也是历史的印证。

中日开战，英国“中立”，因此，港英政府对中国人香港的抗日活动有所限制。祖母很关心国家大事，她每天看报并讲给我听。当时中文报纸上常出现“×军”的字样，“×”就是“敌”的意思，英国人禁止称日军为敌军，编者只好以此表达。我在幼稚园学习时，老师小声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避免让外面听见。

当时香港人的反日情绪是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广州沦陷后更为高涨，许多青年人回内地参加抗战。妈妈带我去中环购物总是去“中华百货公司”和“先施公司”，很少进别的商场。当发现货品是日本制造时，立即不买。香港最大的日本百货公司叫“惠罗”，我们常过门而不入，里面也显得阴森冷清，亲友们谈及去“惠罗”买东西，立刻会惹来谴责。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家公司也是日本人的间谍据点。

英国人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很难确定。依稀记得，海面停泊的那艘挂着米字旗的航空母舰令我大开眼界，还将它画下来。在“巴士”或电车上常遇见穿着雪白军装的英国水兵，他们对我微笑，有时也摸摸我的头，而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帽子上的红球和身上爬的小米鼠。印度警察最令人反感，他们倚仗英国老子，经常打骂中国人，我亲眼见过一个印警乱踢街上行人。于是，我也学着别人唱起：“阿差，阿差，捉人唔到吹 BB！”（香港人称印度人为“摩罗差”。）那时的电影院每场完毕时都奏英国国歌，要求观众起立向英皇致敬，我觉得很好玩，而不少中国人则离座而去。

广州沦陷之后，香港不仅成为当时国际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利用的场所，而且是中国抗战后方与外界联系的桥梁，下述经历可算是个小小的佐证。

1939年初的一天，有位戴礼帽穿西服的人到我家，与妈妈讲了几句话就匆匆走了。原来是爸爸要从粤北去重庆开会，内陆交通险阻，只好绕道汕头，转乘外国轮船到香港，再乘飞机赴目的地。爸爸抵港那天清晨，妈妈只带着我，由一人领路，到

港岛上环海旁一家咖啡馆等候。不久，一艘挂着美国国旗的轮船出现，爸爸上岸后同我们一起过九龙，住入弥敦道新亚酒店。当时好象一切都很神秘，爸爸用的是化名，不同任何人联络。第二天，就有人来接他去启德机场了。事后，爸爸返回粤北作了如下记述：“这次是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是在我们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举行的，这次会议正举行在我们对敌人抗战已至二十个月的时候，敌人深入几千里的我们的内地，交通梗阻，诸多不便，而参加的会员来自各省，来自我军的前方，和敌人的后方各处，人数反较前两次的更多了。”

香港到底能偏安多久？当时人们大都无法回答。

龙蛇汇集

“……

你是享乐者的天堂，
也是革命战士的沙场。

……

这儿有出卖灵魂的名姬，
也有献身祖国的姑娘。
这儿有迷恋着玉腿的浪子，
也有担当起国运的儿郎。”

田汉在《再会吧，香港！》歌词中的这些描述，不仅在我身边得到印证，而且这些人物颇具典型性。

清末民初逃往香港的清朝遗老遗少，有的已经破落，有的则另建家业。许应骥算是我的太公辈，曾任礼部尚书、闽浙总督，参与过《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署。他本人早已于清末去世，其家人于民国初年迁居香港。当家的媳妇（我称她为叔婆）以身边的金银手饰，买下大批房产，重振了家业。抗日战争对他们暂时没有什么影响，照常安居乐业可也，只是一些从广州来避难的亲戚，偶尔会求他们帮助。他们住在港岛半山罗便臣道，我去过多次。这个家仍保持着中国封建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子孙们却又在英文书院上学。红白喜事少不了古乐吹打，孩子们则哼着英文歌曲。

50多年后，1992年当我在香港与许应骥的曾孙们重聚时，他们已经完全洋化，而且都入了外籍，但家中仍摆设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赠送的珍品。他们告诉我，日本人占领香港时，日军司令部在其家门贴了一张“立入严禁”的布告，所以一切

财物得以保存。

伯父许崇智此时也在香港。1925年他在粤军总司令任内被参谋长蒋介石胁迫下野后，一直隐居上海英租界。抗战爆发后的1939年初，他为逃避汉奸汪精卫的拉拢，带部分家眷迁居香港。那时，妈妈常带我去他家，他的三姨太 and 几个女儿与妈妈关系较密切，我则同他的外孙辈玩耍。当时他家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经常座客满堂，很难和他讲上话。出入他家的政要和名人很多，现在我仍有印象的只是杜月笙和陈策。陈策是败走香港的海军将领，后来出任中国国民党港澳支部负责人以适应战争形势，矮个子，人们称呼他“策叔”。有一天，妈妈带我去崇智伯父处，伯父破例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原来这天是他生日和迎接四姨太过门，他显得十分高兴。我的姐姐眼见这种气氛和国难当头很不协调，背后说了一句：“醉生梦死”！

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和儿子承志、女儿梦醒都到了香港，我称呼他们是“二叔婆”、“舅父”、“醒姨”。妈妈从小和他们就有很深的交情。这时，何香凝与宋庆龄等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廖梦醒是宋庆龄的秘书。廖承志受中共中央指派建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公开名义是“粤华公司”。这些政治大事我当然不会明白，但我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们一家住在港岛跑马地一座普通楼房，有临街的阳台，这是妈妈带我常去的地方。何香凝与妈妈多谈论亲戚的近况和战局的发展，廖承志偶尔回家匆匆吃完饭又走了，难得见一次面。我印象中他常穿一件灰色长衫，好开玩笑。十多年之后，当他在北京再次见到我时笑着说：“你长那么大了！”回想当年我还是个未上小学的孩子。

谭雅士律师一家也是妈妈那边的亲戚，我称呼他表姨丈，他当时是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中四位华人之一。他们在香港属于高等华人并已挤身欧洲人的生活圈。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次盛大Party，在他们于薄扶林道的花园式豪宅举行，客人中大约半数洋人，我和那些黄发蓝眼的孩子追逐嬉戏，还抽到了一等奖。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香港的洋人生活节拍。50年后，1988年当80多岁的表姨带我重临这座旧宅时，只见人去楼空，一片荒凉。这时表姨丈早已去世，他的儿子向我诉说日军占领香港时他父亲被胁迫出任“善后处理委员会委员”的情景。1996年，杨铁梁出来竞选首任特区行政长官

时，我才知道他是谭雅士的女婿。这家人与香港历史发展的紧密关系，由此可见。

告别香港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托尔斯泰的名言是我长大后才读到的，但在6岁时，我便初次尝到了家庭的不幸，又目睹了身边人们相似的不幸，这一切都发生在当时的香港。

小弟弟比我小5岁，是在我们避难香港时出生的，妈妈称他为“抗战仔”。他睡在小床上的情景，我至今仍留在脑际。原来爸爸给他取名“锡攘”，祖母认为“攘”与“让”音近，中国正在抵抗日本侵略，不能再退让，表示反对用此字，所以一直未定名。他1岁生日时，楼下的关医生和梅医生聚集几位小朋友开了个小茶会，我也分享到作为哥哥的乐趣。不幸的是，他不久便患急性肺炎医治无效，还没有来得及多看几眼这个世界，就离开人间了。最伤心的当然是妈妈了，许多亲戚都来安慰她，廖梦醒阿姨和她紧紧拥抱，感人至深。

姨妈的去世给了妈妈又一次打击。当我和妈妈去养和医院探望她时，她还谈笑风生。有一天，我和姐姐们在“巴士”上遇到香莲、香桃，他们高兴地说姨妈不久便会出院。但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我发现妈妈几乎每天晚上12点以后才回家，我已睡醒一觉了。妈妈是陪伴姨妈度过那最后的日子。姨妈去世时才40多岁，她是一位慈祥和大度的人，我很怀念她。

无独有偶。这时，楼下梅医生的养子，在学校玩酒精灯失火烧伤，抢救无效也去世了。他们这家人是我们在香港最好的朋友，这个“肥仔”和我们一起玩的，他临终前最痛苦时发出的那声叫喊，以及梅医生求上帝保佑的祷告话音，至今尚萦留在我的耳边。

为什么死亡的悲剧接连在我的身边发生？这都不是战火造成的，但它和战争环境有没有关系呢？幼小的我自然无法回答。

香港非久留之地。爸爸断定日本与英美必定交战，要我们立即移居上海英租界，暂时投靠外公和外婆。于是，我们全家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

1939年夏季，我和香港告别。那天早上阳光被云层遮盖，到码头送行的除了几位亲戚之外，就是关医生和梅医生全家。当我们乘坐的美国“总

统”客轮徐徐开动时，船上奏起《双鹰进行曲》，而码头则传来夏威夷的《珍重再见》，数不清的彩带将船旁的旅客和岸上的送客连接在一起。我们全家都站在甲板上向送行的亲友挥手，我手上的那条彩带被关医生的小女儿棕棕紧紧抓住不放，一直到轮船离岸，这彩带才被拉断。我凝视着渐渐远去的太平山和维多利亚港若有相思，当轮船驶向波浪起伏的大海，妈妈才将我拉进船舱。

回眸远眺

我们到上海两年之后，太平洋风云突变，香港被日军攻占。上海租界虽然亦沦入敌手，但战祸远比香港为小，这也许可以证明爸爸的决策是明智的。

香港的坏消息不断传来。两位表兄历尽险阻逃到上海，从他们的讲述中我听到许多真实的故事，隔岸炮战的恐怖、日军进城的残暴、流氓横行的劫难、哀鸿遍地的惨状等等，都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唯独有趣的是，这两位表兄跟在流氓的后面，冲入香港牛奶公司仓库扛走了两只大羊腿，高喊“胜利”，流氓还以为他们是“自家人”。

此时香港的若干重大事件虽发生在我离开之后，但与我在前面提及的人物颇有关系，值得说说。

香港攻防战的最后阶段，英军司令准备向日军投降之际，陈策以其海军将领的经验，组织了数十名英军官兵，乘鱼雷快艇从香港仔出发，冲出日军火力网，胜利到达惠阳海岸。他的行动大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陈策脱险记”成为当时新闻界的热门话题，我在上海的《新闻报》上也看见这个报导。而陈策的家人在上海同我们也有来往。

许崇智的遭遇具有戏剧性及争议性。日军进占香港后，他即被逮捕。日本方面企图迫他出任南京汪伪政府要职，被他严词拒绝。凑巧的是，日方香港总督矶谷廉介与许是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矶谷将他软禁了事，并对其生活给予“关照”，后来还助他迁居澳门。此事在战争结束后，曾引起过人们的议论。

廖承志参与组织对文化人的大营救行动，已尽人皆知，这个伟大的壮举包含着多少传奇性的故事。我当时只听到一些片断，后来，在粤北韶关见到几位脱险的文化人，又听爸爸讲述，才知道多些。廖承志生前，我没有机会从他那里了解更多有

关当年大营救行动以及与港英军方秘密谈判的史实，深感可惜。写到这里，我要顺便提及关于大营救的一个问题。有人质疑日本在香港有精明的特工组织，怎会让数百名中国知名人士安然逃出而无一被发现呢？据潘汉年平反资料透露，日本特工组织“岩井公馆”已被中共人员渗入，当时以“向中国后方转移情报力量”为掩护，麻痹了日本军方警戒，加上营救组织的周密，才有此奇迹。闻说还有一位充当“双重间谍”的女地下工作者，作了出色贡献。这些史料的证实，无疑大大增添了香港在战争时期的神奇色彩。

这一切变化，使香港不再是“世外桃源”了。

1942年春夏之交，爸爸突然派人来上海，接我们去粤北后方。于是，又有再一次“战略大转移”。当时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是经浙江、江西入广东；二是经广州北上。第一条路线因日军进攻金华而中断；第二条路线虽也要穿越日军封锁地带，但有熟人领路和接应。于是，我们向日军司令部申领了“难民回乡证”，从上海乘日本轮船直赴广州。我之所以讲这件事，因为它使我再次看见香港。

当轮船驶出吴淞口，面对白浪翻滚的长江，我心中念起姐姐们常唱的那首歌：

“黄浦江水呜咽，
江里满是血痕。
淞沪的同胞流离，
为国的将士伤亡。

……

朋友，
摸摸你的心，
眼看你的国。”

船走得很慢，颠簸也很厉害。在温州湾避过台风，又在基隆港停了两天之后，航船乘夜越过台湾海峡。当广东海岸出现时，两旁还有日本军舰伴随，据说是防范美军潜艇袭击。船过海陆丰，一位上海籍的船员对我们说：“大家注意，如果有紧急情况发生，请保持镇定。这里是阿拉中国人自家的地方，会开炮打日本人的船。”一切平安无事！那天半夜，我在熟睡中被人吵醒，人们拥向窗口，有些广东人叫起来：“香港，香港！”映现在我面前的是远处山头若隐若现的点点灯火，啊，这就是我离别了多年的香港，这就是笼罩在黑暗中的香港！随着轮船和海浪冲击的声音，这灯火渐渐又消失在远方。

【责任编辑：孟庆顺】

中山大学的澳门研究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的澳门研究始于地理学领域，早在 40 年代，缪鸿基、何大章教授合撰了《澳门地理》一书，此书被学术界评价为首次运用近代地理理论与方法研究澳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的佳作。

关于澳门历史的研究，在我校更占有特殊的地位。戴裔煊教授从 1956 年起致力于澳门早期历史的研究，至 1988 年辞世为止的数十年间，在学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其著述《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1557 年至 1580 年间的澳门》等提出了与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不同看法，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澳门史体系。他的专著《〈明史·佛郎机传〉笺正》，更是一部考证缜密的史料性著作，引起中外史学界对其有不同评价。戴教授的力作《葡萄牙占据澳门史》未能最终完成，令人遗憾。

黄启臣教授于 1982 年起从事澳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先后撰写《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 年）》、《澳门通史》、《澳门港史资料汇编》等专著，并对明清时期澳门史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如《明清时期澳门海外贸易的兴衰》、《明清时期中国对澳门的管理》、《澳门宗教》、《16 至 18 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汇》、《赫德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清实录〉澳门史料编年》、《近代澳门苦力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从许多方面填补了我国澳门史研究的空白。

章文钦教授是在戴裔煊教授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后起之秀，其有关澳门历史文化的考证和研究深受好评。他的代表作有《〈澳门纪略〉研究》、《谢清高与葡萄牙》、《澳门妈祖阁与中国妈祖文化》、《明清时代中国高级官员对澳门的巡视》、《澳门历史文化研究的展望》等。他的近著《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晚清卷、民国卷）以及百余万字的《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有关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与刘芳合著），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我校历史系、人类学系、地理系以及港澳研究所的教师，也发表了一批涉及澳门历史的论文。

关于当代澳门问题研究，中山大学亦走在全国的前列。港澳研究所于 1983 年成立之后，就非常重视澳门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偏重香港研究而较为忽视澳门研究的时候，我校已确定并完成了一批有关澳门当前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课题，同时与澳门的大学及学术团体建立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将澳门经济发展与珠江三角洲联系在一起，并探索其未来相互关系的前景，是我校澳门研究的重要方向。从以下论文可以看出：《澳门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时期》、《从沿海发展战略看珠海与澳门的经济合作》、《澳门在粤港澳经济关系中的合理定位》、《粤港澳大型基础设施网络化、现代化、国际化》、《粤港澳联合市场与沿海发展战略》、《建立粤港澳自由经济区构想》等等。至于研究具体实施方案的项目就有：关于港澳与珠江三角洲机场、港口建设的协调问题、关于珠澳铁路建设问题、关于澳门与珠海联合开发横琴岛问题、关于伶仃洋大桥联接澳门的桥位和走向问题等等。其中郑天祥教授和雷强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并受到有关方面人士的重视。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校对澳门各个方面的研究全面展开，“澳门土生葡人研讨会”，“澳门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角色研讨会”等先后在我校举行。杨贤坤教授的《澳门法律概论》是国内较早的同类著作。《澳门人口》（郑天祥）、《澳门宗教》（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述评》（杨道匡、郭小东）等著作的出版，都得到好评。其他如关于澳门产业结构、房地产发展、投资环境、城市规划、交通、教育、劳工等问题，亦发表了许多论文。

1987 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之后，澳门进入过渡期。当时，我校港澳研究的重点放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但是对于澳门回归问题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90 年代更是加紧了这方面的工作。法律系对澳门基本法以及过渡期的法律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并开设了有关课程。江振良教授的《〈澳门基本法〉是澳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李启欣教授的《〈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述要》是

这方面的代表成果。

随着澳门回归的临近,我们与内地以及澳门的学者密切合作,对平稳过渡和回归后发展路向等问题进行了探索。郑佩玉教授于1994年提出有关澳门经济发展的稳患与出路的研究报告,受到有关部门关注。郑天祥教授和雷强教授于1998年撰写的《从东方蒙地卡罗到东方的拉斯维加斯》,对澳门博彩旅游业存在的问题以及回归后的发展路向提出了具体而新颖的意见,引起了澳门和内地有关人士的强烈反应。孟庆顺副教授的《港澳与海峡两岸关系》、周运源副教授的《澳门回归与中国和欧盟的经济关系》以及香港城市大学郑宇硕教授与本校陈广汉教授、周运源副教授共同主编的《回归与前瞻:澳门回归暨港澳与内地关系探索》是最近的重要成果。

《中山大学学报》是全国大学学报中发表有关澳门的学术论文最多的。而我校港澳研究中心主办的《当代港澳》杂志,是国内发表澳门研究论文最多和最集中的刊物。该刊1999年第一期,为澳门问题专刊,其中《关于抗战时期澳门历史的研究》(许锡挥教授)专稿,提出了对澳门这段特殊历史进行深度研究的纲要性意见;孟庆顺副教授的两篇论文,就澳门公务员本地化及中文官语地位问题,作出全面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陈丽君副教授的论文,对澳门政团、社团以及公共行政架构,从历史到现状和前景作出系统的分析;黎熙元副教授的《澳门社会治安问题与对策》,从社会经济结构、立法与执法架构、社会次文化、黑社会以及过渡时期形势多个方面剖析澳门治安问题,并提出了治理策

略建议;其他还有涉及法律、经济、教育、航空运输等方面的论述。该刊“迎接澳门回归特辑”(1999年第二期)集中了澳门与内地学者十多篇研究论文,从多角度阐述了澳门回归以及落实“一国两制”的前景。其中有本校郑佩玉教授《依靠科技振兴澳门经济的策略思考》、周运源副教授《澳门回归与内外合作发展研究》、孟庆顺副教授《澳门回归形势分析》等多篇论文,从较为远视和宏观的角度,对澳门当前面临的问题及回归后的发展路向,作出了分析。其他方面的论文则包括博彩业、工业、教育、粤澳经济合作等内容。它可以代表国内澳门研究的水平。

中山大学在近几年为澳门努力培养人才,先后开设了行政学、工商管理、会计学、法律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澳门班。

我们中山大学长期以来在澳门研究上所做的工作,离不开澳门各界人士的支持。在此特别要感谢新华社澳门分社、澳门日报社、澳门大学、澳门基金会、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澳门经济学会、澳门历史学会等部门以及各位校友。

正如香港回归之后,我们对香港问题的研究没有结束一样,对澳门问题的研究也不会停止,而且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将确定新的研究课题,如“一国两制在澳门实践的追踪研究”、“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实践的比较研究”等。我们期望这些研究工作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

【责任编辑:陈丽君】

本刊重要启事

1. 本刊经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批准,从今年起使用粤O第1105号期刊登记证。
2. 欢迎校内外人士投稿,每稿不超过8000字,请附上论文摘要(100字以内),勿一稿两投。
3. 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以学术水平为采用原则。如不采用,一般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4. 本刊所登载的文字及图片,如要转载请注明出处。
5. 本刊所发表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中心及编辑部意见。

《当代港澳》编辑部

试析澳门外贸行政管理的产地来源制度

林锦峰 吴锦松

〔内容提要〕 原产地管理对澳门的对外贸易及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澳门的原产地规则符合国际经济贸易惯例,也体现了澳门作为受惠的独立关税区的特色。但从整个原产地证监管制度上审视,还有不够完备的地方。为推动澳门回归后经济有长足发展,进一步完善原产地管理制度,促进澳门外贸经济增长是关键之举。

当今产品因素国际化趋势越来越突出,原产地制度就成为世界各国国际贸易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澳门对外贸易及整体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完善产地来源管理制度,对于回归后的澳门的经济繁荣意义重大。

一、原产地管理在澳门对外贸易及整体经济中的地位

鉴于现代经济活动中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分工,一项产品的制造往往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生产活动才能完成。以相机为例,若相机的镜头源自德国,其他零部件来自日本,最后的组装在新加坡进行,那么,就产生了产品的“国籍”问题,可能落上“新加坡制造”的字样。产品的原产地,亦即产品的“国籍”。而产品的“国籍”的确认,是由各国或地区制定法律规则,或由各国政府间签订双边协定、国际公约来规范的。如我国就制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及其《实施办法》(1992年5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遍优惠制原产地证明书签证管理办法》(1989年8月)。在澳门则主要由原澳葡政府制定的第66·95·M号法令、28/96/M号训令来规定。

由于在国际买卖中,产品的原产地身份与所享受的关税或适用其他贸易措施(如反倾销措施、数量限制措施)的管制有密切关系,直接影响到国家(地区)的经济利益,因此,产地来源地区便成为一国(地区)在对外贸易中执行关税的重要制度。产地来源证明书的资料还是对外贸易统计的重要依据,有助于准确计算贸易逆差,制定相应贸易政策。但产地来源制度也有可能被某些国家利用作为非关税壁垒措施,谋取不正当利益,制造不正当竞争。

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为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维护自身的正当经济利益,制止贸易欺

诈行为,都制定和实施原产地规则,建立和健全产地来源管理制度,并致力于寻求各国间的合作,签订双边协定或国际公约,以确保公平、合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这对于澳门来说尤为重要。

澳门现与100多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关系,对外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43.87亿澳门元猛增至1997年的338亿澳门元,增长高达7.7倍强。^①欧洲共同体市场及美国各占澳门出口总额的三成以上。其中加工业产品的出口占主导地位,主要是纺织制衣、造鞋、电子、玩具等四大工业产品,还有皮革、食品、饮料、烟草、医药制品等部分产品。而纺织制衣因享有配额、关税等优惠,其产品出口值占工业产品出口总值比重最大,至1997年达八成半。在制造业从业人员中有近八成为纺织制衣工。澳门制造业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不仅为澳门赚取可观的外汇收入,而且还为澳门居民提供相当数量就业岗位,对于澳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出口加工业是澳门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从1990年开始,澳门出口加工业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其第一产业地位虽被旅游博彩业取代,但年产值仍保持过百亿澳门元水平,现为澳门经济中的第二支柱产业,依然举足轻重。

现今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大部分货物入口都要求出口国提供产地来源证明。在澳门,涉及产地来源证的本地产品的出口值占本地产品出口总值的90%,如果澳门本地出口产品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产地来源证明,而被进口国拒绝进口,澳门出口加工业势必遭受严重打击。如1990年10月,澳门部分纺织品生产商违反输美产品的产地来源规定,引起了原澳葡政府与美国政府的输美纺织品配额纠纷。美方曾一度单方面中止双边纺织品贸易协定,拒绝澳门生产的毛衣进口美国。虽然后来经多番努

力,与美方达成协议,但仍被削减了四类针织品的 50% 输美配额,其产品总值达 5 亿澳门元。又如,1996 年美国海关声称有证据显示,澳门一些厂商经常进行非法转运活动,而对澳门输美的五类出口成衣制品实行预先审查制度,使澳门厂商流失了一批订单。经济损失严重自不必说,还使澳门的出口产品大受毁誉。

二、澳门产地来源管理制度评析

当前在国际上产品取得原产地资格,一般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完全原产(完全以一国内的原材料及劳动力所制造的产品);另一种是产品部分或全部使用进口原料、零部件,但通过实质性的加工、改造而取得原产地资格。在澳门,确定产品原产地资格,主要以产品在澳门作最后实质性加工或装配为标准(即上述第二种标准)。此外,就是按产品输往国的地区颁布的原产地规则或与澳门签订的双边、多边协定,或澳门参加缔结的国际公约的规定为标准的。第二种标准为大多数国家(地区)所适用。但如何衡量产品的“最后制造加工和实质性改变”,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澳门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充分的转化,即外形、性质、形态或者用途发生根本性改变。所谓“充分转化”又怎样来确定?首先,以税目变更规则为依据。看产品经加工制作后,所使用的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的税目号与制成产品的税目号有没有改变。若四位数的税目序号其中一个数改变了,则表明产品已经过充分转化,可以确定“澳门”为原产地,获“澳门制造”的资格。其次,通过产品生产过程的分析来确定。税目变更规则的制定,是为了产品科学分类和资料统计的目的,本不为原产地标准之用。只因其适用较为方便、客观,也不失为作原产地标准,被一些国家(地区)采用。但不是所有产品的税目变更都能反映出其加工程度或“充分转化”。某些产品加工前后,税目号改变了,但因加工工序简单,效果缺乏恒久性,并未引起实质性变化,就不能视作产品已经充分转化,取得原产地资格。例如,在澳门加工的装饰瓷花瓶制造品的税目号为 H·S.6913,其异地进口的原料瓷瓶白胎的税目号为 H·S.6912。若只是经过水彩描绘或贴上图案贴纸的简单加工而成,即使税目号改变了,也不能作为原产地依据,落上“澳门制造”的字样。反之,有些产品经过加工制作后,其税目号并未改变,但产品的实际生产过程已经充分转化。如芥辣油的税目号与其原材料芥辣粉末的税目号都是 H·S.2013。但它是经过磨碎、煮熟、烘干、混合、调制而成的,

其外形、性质、形态、用途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符合原产地标准要求。对于原产地标准适用税目变更规则发生的冲突,澳门是通过分析产品生产过程的复杂性、时间性和技术性来解决的。如果产品生产加工工序复杂,时间性长(针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言)、技术性强(包括人工技术和机械技术),则可以确定为生产过程已经充分转化。同时,澳门属于外贸出口的受惠地区,确定其出口产品是否已经过充分转化,还根据普惠制的原产地规则确认的增值标准,以其产品在本地增值率(指产品在受惠国(地区)的成份价值,即该国(地区)生产的原料和零部件,再加上劳务价值等,与产品出厂成本之比。如澳洲规定,产品的成份价值不得少于产品出厂成本的 50%)作为参考依据,或者说,以增值标准为原产地规则的辅助原则。

澳门的原产地规则符合国际经济贸易惯例,是同国际接轨的,也体现了澳门作为受惠的独立关税区的特色。如从澳门受惠地区的实际出发,考虑到不同国家给惠方案中对原产地规则的具体要求有别,确认以增值标准为辅助原则时,并没有对产品的价值率作硬性规定。在澳门申领和签发原产地证相对较简便快捷。澳门近二十年来出口加工业蓬勃兴起,与其原产地管理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健全不无关系。但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澳门出口加工业从其在生产总值的比重上看有所滑坡,也主要是受产地来源问题困扰。其原因受产品因素国际化趋势影响,各国所实施的原产地规则缺乏国际性协调、约束和某些国家从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把原产地规则复杂化或作出新的规定有关。如美国对税目变更原则附加了新标准,并针对某些类别的针织品成衣产品适用税目变更原则作出新的特别解释,使单靠输入布料加工的产品不能取得原产地资格,而使澳门每年损失四千多万元澳门币的出口额。但气愤之余,痛定思痛,还应当从澳门产地来源工作的管理制度上检讨。

根据澳门第 66/95/M 号法令和 28/96/M 号训令规定,在澳门申请和签发原产地证的程序为:产品生产过程申报;提交原产地证明书的申请;签发原产地证和原产地证的更改、补充及重新签发等。步骤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规定大同小异,但具体要求有别。关键是对原产地证的监督管理。澳门主要采取防范与惩罚相结合的措施,指导思想是正确的。首先,以预防为上,从三个方面管住:(1)完备生产记录储存。已获签发原产地来源证的制造商,务必做好企业生产各方面的登记,如产品的生

产工序、原料、辅料、存货、进出库、产品销售情况等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以便随时检查。(2) 把住“问题产品”的出口关。“问题产品”针对的是产品的生产数量,并非质量,密切关注产品出口量与本地生产量的对应。如出口量大于本地生产量,便有“非法转运”之嫌。(3) 把好产地来源证的签发关。有违上述两项要求,不能提供充分生产记录证明产品在澳门的制造过程,或生产、出口量超出其实际生产能力,则暂停发出产地来源证。其次,惩罚警戒。对违反原产地管理制度的行为,按其性质不同、情节轻重、损害后果程度,分别科处数额不等的罚款,严重的还可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措施对加强澳门出口货物原产地工作的管理,促进澳门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从整个原产地证监管制度的审视,还有不够完备的地方。

(一) 缺乏统一的监督管理机构。按原澳门的行政架构及职能分工,澳门经济司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负责执行对外贸易规范。同时也直接参与工商业政策的实施,如规则、推行本地区的经济活动、推动及协调本地区投资、发展工业多元化,促进商业活动正常运作等。但实际情况是,澳门的具体外贸活动的监管工作是分别由两个不同政府部门的机构共同负责的。根据澳门第 64/87/M 法令第 29 条规定:“经济司稽查组附入口、出口、转口等活动以及对货物上落的管制及检验等方面参与稽查工作。”而根据第 66/95/M 号法令第 13 条规定:“本地区关口进行之对外贸易活动之监察权限,属水警稽查队。”可见,因为澳门没有设立海关,海关的监察职能分别由水警稽查队和经济司共同承担。但是法律却没有对两机构的监管权限、职权分工、职责范围作出明确规定。由于两机构分属不同政府部门的管辖,在行使外贸活动的监管权时,不时都有出现难以协调一致的情况,相互推诿、塞责时有发生。没有统一的监督管理机构,显然削弱了对出口货物原产地工作的监管力度。

(二) 签发原产地证的程序机制不够严格。签发原产地证的程序,关键在于申请、审查制度上。从各国(地区)的原产地规则来看,凡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齐备申请原产地证的法定资料和证明文件,均可向主管签发原产地证的机构申领原产地证。但申请的手续要求、审查的严格程度各异。在澳门申领原产地证的手续相对比较简便快捷。对外贸易经营人在产品生产投产前 15 天向经济司提出申请,递交产品生产过程申报表(又称产品生产成份表),即完成了申请程序。

其审查程序则以书面(文件)审查为主,即主要审核申请人提交的产品生产过程申报表所填报的内容是否符合要求,法定史交的资料是否齐全。如经审核无异议,便可确认其产品符合澳门原产地资格,获准签发原产地证,无需对申请单位作实地调查。邻近一些国家和地区则不同,签发原产地证的申请和审查程序都较澳门严格,一般都采取注册登记方式和坚持实地调查、评估原则。如我国内地申领和签发原产地证则实行事前注册、专人申请、分别情况、对口审批、书面审查兼顾实地查核的制度。^②比澳门的规定具体、明确、严格得多。虽然,澳门的简便性规定有助于提高办事效率,避免因领取原产地证迟缓导致出口货物滞留入口国口岸而带来昂贵仓租的损失,也可减少因实地现场调查而可能妨碍生产正常运作。但太宽松的审查程序,显然不利于强化监管力度,容易被不法厂商钻空子。

(三) 缺乏出口产品加工工序清单的指引,不便厂商依章操作。如上所述,澳门产品原产地标准的确定是理论上的说明,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有嫌失之于操作性的具体指引,厂商执行起来颇感困惑,在制造、加工运作上盲目性较大。往往产品制成后,申请原产地证时,才发现产品的生产过程不符合原产地规则,不能以澳门产品出口,给厂商造成很大损失,从而也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许多国家(地区)通常做法是制定较清晰的产品加工工序清单给厂商知照执行。我国内地的《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就明确规定,制造、加工工序清单,按照以制造、加工工序为主,辅以构成比例的原则,由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商国务守有关部门制定、调整。看来,这是澳门原产地管理制度中的一个较大的不足。

(四) 忽略对仿冒商品(冒牌货)的监管,颇有顾此失彼之感。从澳门现行的产地来源管理制度来看,只要产品符合澳门原产地规则确认的标准,其原产地就为澳门,并不涉及产品商标及外观设计的保护。换言之,即使冒牌货的“最后实质性加工和装配”是在澳门完成,也可以申领和签发原产地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漏洞,同时也反映出澳门法例有失衔接。尽管产品的商标及外观设计另有法律保护,但冒牌货物已经出口获利了,纵然从工业产权保护方面对其侵权行为给予惩罚,于不法厂商来说也只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可对澳门来说,就被蒙上为仿冒产品的生产基地的不光彩之名。这点内地倒是注意到了。我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实施办法》第 10 条明确规定:“在出口货

物本身及其内、外包装或说明书上,没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生产的字样或标记,方可申请签发原产地证。”这样,就使工业产权在原产地管理制度中也得到保护。澳门是可以借鉴修例的。

三、完善澳门的原产地管理之我见

为进一步完善原产地管理制度,促进澳门外贸经济增长是关键之举。其指导思想应保证工业活动的自由发展,有利于鼓励投资,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并拓展海外市场。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健全原产地管理制度。

(一) 从实际出发,强化签发原产地证的监管工作。澳门实行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是低税制、自由港,不宜照搬内地的做法。在严格审查制度上,可坚持书面(文件)审查为主,辅之以抽样实地调查,避免调查手续过于繁复、妨碍生产、影响生产效率。抽样调查可从几方面进行。1. 按产品的等级进行。把工业加工产品划分为敏感、半敏感及一般产品。敏感产品,指曾受进口国怀疑违反原产地标准的产品及列入反倾销对象的产品;半敏感产品,指享受普惠制待遇的产品;一般产品,指上述两种产品之外的产品。抽查比例强以产品的敏感程度而定,重点应为敏感产品。2. 按产品的出口数量进行。进口国有关部门对进口量大的产品,通常特别关注。因而,应列为重点抽查对象。3. 按生产商的诚信度进行。诚信度分为A、B、C三级。诚信度高的为A级(从没有违反原产地标准);次之为B级(曾违反原产地标准两次以下);最差者为C级(违反原产地标准两次以上)。对于C级的生产商应予以重点抽查。实行抽样实地调查制度是可行的。其特点或优点:一是重点主动调查,不忽视查询的调查,有助于加强监管力度。现时,澳门只实行给惠国查询的调查,即应给惠国的退证查询进行核查。属事后、被动调查,是必要的。但监管力度有限,不足以阻吓违法者。不能及时掌握情况、发现问题不在说,即使发现了问题已为时晚矣,于事无补。只有接受给惠国的惩罚,损失无法挽回,澳门的形象已受损。对生产商作主动调查,可以随时掌握其生产运作(经营管理、生产设备、加工工序及生产能力),及早发现问题(如生产能力与生产量不符等)立即采取措施处理,暂停直至取消其申领原产地证资格,有效制止非法转运活动。二是抽样调查的灵活性较强。什么时候调查,怎样调查调查哪些生产商,主动权掌握在政府主管部门。既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要求,又能尽

量减少对生产运作的妨碍和干扰。三是抽样调查以例行检查方式而为之,使调查正常化,可消除生产厂必要的疑虑,放下包袱,积极配合。这样所获的调查材料将更具真实性、可靠性、可信性,从而提高调查质量。四是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原则。施教于调查过程始终,加强原产地规则的宣传解释,鼓励鞭策守法,制止惩罚违法,增强生产厂商的法制观念,确保申领签发原产地证的正当性、合法性。

(二) 建立专责监督管理机构,严厉打击非法转运活动。在原产地证管理上加大力度的同时,对目前货物出入境的管理也亟待加强。澳门没有设立海关,对货物进出关境进行监督检查由水警稽查队和经济司共同负责。众所周知,澳门水警主要任务是负责治安防务工作。由水警稽查队监管货物进出口,打击非法转运活动,除同其自身的性质相悖外,在实际运作上又同经济司交替纠葛,常有力所不支、力不从心,成效大打折扣,远不能适应澳门作为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也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因此,尽快设立海关,把过去分散的外贸活动监管权,集中统一由海关行使。

(三) 提高原产地管理工作人员素质,是加大力度依法严格管理的关键。要采取措施,建立一支尽忠职守,廉洁高效,秉公执法,积极进取的专业化的原产地管理人员队伍。首先,建立、健全培训制度。澳门至今尚未对原产地证管理人员的资格作出规定,有待特区政府通过完善原产地工作管理制度来解决。培训方式可以是短期脱产培训、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和派往外地原产地工作管理机构对口培训。把培训与录用、培训与晋升结合起来。要建立培训评估制度,讲求培训效果,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其次,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度。按需设岗,据岗定职,依职定责,以责选人,定期评估考核。能者上、庸者下,优奖劣汰,违法、失职者追究责任。形成职能、权责、利益、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澳门已顺利回归,相信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领导下,原产地管理制度将会得到进一步完善。

注:

① 本文有关资料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提供

②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实施办法》(1992年5月1日)

【责任编辑:陈丽君】

澳门金融业的现状和发展路向

程 静

【内容提要】以银行业和保险业为主体的金融业对澳门经济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分别分析了澳门银行业的特点和存在问题以及保险业的现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澳门与内地紧密的金融联系,并结合澳门经济、对外关系和地域上的特点和优势,同时针对澳门金融业发展的不足之处,探讨使其不断健全和完善的途径。

澳门经济属微型的外向型自由经济。旅游博彩、出口加工、金融和房地产建筑四大支柱产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约占 80% 的比重,其中金融业约占 10%。澳门发展金融业有其自身的一定优势:(1)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通讯发达;(2)开辟为国际自由港已有近 160 年的历史,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经济运作灵活,税率较低,外汇进出、兑换自由,黄金自由买卖;(3)与世界各大金融中心有直接联系等。同时澳门经济规模小,对外依赖性强,与香港相比,澳门的金融体系相对较薄弱、单一。澳门没有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主要包括银行业和保险业。澳门的银行业和保险业各具特色,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以下就澳门金融业的现状作一分析,并尝试探讨使之不断健全和完善的途径。

一、澳门银行业的现状

(一) 澳门银行业的特点

从 1902 年首家银行葡萄牙大西洋汇理银行开业以来,澳门银行业已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对维持经济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澳门银行业主要有以下特点:

1、商业银行网点密集。到 1997 年底,澳门共有银行 22 间,分支机构 138 间,按澳门人口 45 万计算,平均 2800 多人就有一间分支行,网点密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2、资本充足率高。据统计,1997 年银行资本充足率高达 15.2%,远远超过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 8% 的标准。高水平的资本充足率表明澳门银行业清偿能力良好。

3、存款以本地居民定期存款为主。存款结构中,本地居民的存款多于外地居民的存款,且大部分是短期性定期存款。1997 年有 89% 的存款为本地存户所拥有,78% 的存款以定期形式存放。由于银行资金来源大部分是高成本资金,经营成本较高。

4、存款远远多于贷款。截至 1998 年 11 月,居民存款总额为 834.96 亿元澳门币,对机构及私人贷款仅有 491.30 亿元。由于香港银行同业市场拆息比澳门银行高约 1 厘,后者常常将存款超出本地贷款的部分款项移往香港拆息。

5、存款和信贷业务迅速增加。从 1984 - 1997 年的 14 年间,存款额从 80.66 亿澳门元升至 947.90 亿元,增长 11.75 倍,年均增长 61.95 亿元;贷款总额从 62.05 亿元升至 550.23 亿元,增长 8.87 倍,年均增长 34.87 亿元,增长速度相当之快。

6、银行体系对外高度开放。澳门银行资本和银行业务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国际上任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都可以在澳门设立分支机构。银行体系中国外资产占总资产的 54%,外国负债占总负债的 32%。多间外资银行拥有国际分行网络。

(二) 澳门银行业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投资需求疲弱,资金大量外流,成本不断上升,风险日趋加大,同业竞争日益激烈,银行业的经营日益维艰。同时,与经济发达国家及地区相比,澳门银行业的发展还不够成熟,与澳门作为自由港的经济地位不相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银行业对香港的依赖性强。从银行数目来看,截至 1998 年 4 月 30 日,澳门共有 23 间银行,其中总行设在香港的银行占 6 间,占总数的 26%,多于本地银行。

从存贷款结构来看,到 1998 年 11 月,港币占本地存款总额的 53.87%,占机构及私人贷款的 62.29%,而澳门币分别仅占 28.33% 和 29%。

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带动了澳门银行业的发展,但澳门往往只是被动适应香港金融业带来的机遇,而不能主动出击,迎接挑战。

第二,资本利用率低。如上所述,澳门的存款

总额高于贷款总额,同时存款的增长速度也高于贷款的增长速度。存款对贷款的比率高,说明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不能创造出最大的效益。反观香港,存贷款比重刚好相反,资本利用率也相对较高。

第三,信贷资产投向集中,资金回流困难。据货币暨汇兑监理署的统计,1997年贷款总额的88%借予本地企业,其中房地产业42%。由于澳门的信贷资产主要投向了房地产,而且多数是长期贷款,不可避免地受到目前房地产业不景气的影响。楼盘空置,销售困难,使发展商的投资难以收回,从而影响银行贷款的还本付息。

第四,银行业的垄断程度较高。澳门的存贷款业务相对较集中。葡萄牙、中国以及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银行占据了银行业大部分市场,葡资银行占了银行业信贷总额的47.8%,存款总额的43.3%,中资银行则分别占46.6%和48.7%。排在市场占有率前三位的中国银行、澳门商业银行和葡国大西洋银行的市场比重之和超过50%。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其它银行很难与上述银行竞争。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银行就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创新及提高金融产品的科技含量。

第五,市场业务单一。澳门银行以零售业务为主。虽然许多银行已进入电脑服务阶段,并开展了信用卡、证券交易、外汇买卖、保管箱和电话理财等服务,但就总体而言,金融工具和经营方式的变化不大,其收入的绝大部分仍来源于零售业务,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偏低。

二、澳门保险业的现状

澳门保险业总资产仅相当于银行业总资产的0.6%,因此在金融业中的地位次于银行业。截至1997年12月31日,澳门共有21间保险公司,其中6间为寿险公司,其余为非寿险公司。这些公司中只有4间是本地成立的,其余均为外资公司,分别来自七个国家及香港。中资保险公司在澳门保险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业务量占全澳门的1/3。各国的保险公司带来先进的经营方式,促进同业竞争,各保险公司纷纷努力改进服务,增加保险品种。

澳门的保险业务分为人寿保险和非人寿保险两大类。澳门人对保险业日益重视,货物运输险、火险、汽车险、劳工保险等已普遍为厂家和市民所接受,人寿保险也逐渐受到对市民特别是中青年人的欢迎。人寿保险市场不断发展,承保总额已接近非人寿保险市场。储蓄性险种多元化显示了澳门保险业向“银行保险”发展的趋势。

保险业近年来发展缓慢。1984年保费总收入为0.71亿澳门元,1992年保费总收入为4.15亿澳门元,增长近5倍,而1997年为4.34亿澳门元,比1992年仅增长5%。

目前澳门所吸纳的大额人寿保险中,有半数以上的投保人来自内地。虽然有利于促进澳门保险业的发展,但保险金的偿付颇为不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多外国保险公司进入内地,同时内地保险公司不断改进服务,来自内地的保单将会逐渐减少。如果澳门保险公司不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将面临客户群的大量流失。

三、澳门与内地的金融联系

由于历史和地理上联系紧密,澳门和内地的金融关系相当密切。

1、两地的金融监管机构联系不断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和澳门货币暨汇兑监理署在两地金融领域合作与交流以及加强跨境金融业务监管的问题上已取得一定进展。

2、两地金融界之间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近年来澳门金融界除了两年一度组团对内地考察访问外,还通过两地举办的各种活动增加两地同行接触机会,扩大交流范围。

3、两地金融机构互设分支机构。目前澳门的银行体系中,有中资成份的银行4家,占澳门银行资产的40%以上,占总存款、总贷款的50%以上。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澳门银行开始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澳门大丰银行、大西洋银行、必利胜银行等先后在内地设立代表处或办事机构。

4、两种货币在一定范围内可同时流通使用。澳门币已在中国银行挂牌,澳门所有的中资银行、找换店和部分其他银行都可进行人民币和澳门币、港币的兑换。澳门币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有一定数量的流通,澳门大多数的消费场所接受人民币支付。

四、澳门金融业的发展路向

金融业是澳门的支柱产业之一,金融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澳门经济的发展。巩固和发展澳门金融业,着重点可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培植本地商业银行

目前澳门银行法对设立商业银行的条件规定较为严格。按第32/93/M号法令规定,在本地区建立的银行的公司资本要超过1亿元澳门币。银行在建立时,应认购全部公司资本,并以现金缴付,至少一半的金额要暂时存入澳门货币暨汇兑监理署或其他机构,且该笔款项由监理署支配。待银行开业后,可从该机构提取暂存的款项。

由于澳门经济规模有限,实力雄厚,能达到以上标准的财团屈指可数。若从澳门实际情况出发,降低银行的设立标准,有利于发展本地银行。也可以借鉴香港的三级银行制度,制定灵活政策,根据不同类型的银行相应规定不同的设立标准,以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

2、积极引进国际性大银行

澳门应充分利用其在对外关系上特有的优势,积极引进国际性大银行,提高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

澳门与欧盟有特殊伙伴关系,澳门享受欧盟给予的纺织品出口优惠、普惠制待遇,并被欧盟纳入国际投资伙伴计划优惠名单。1992 年与欧盟合作成立的澳门欧洲资讯中心是迄今为止在欧洲以外设立的唯一的资讯中心,与全欧 250 个中心联网,为澳门和亚洲各国投资者提供关于欧盟法律、贸易、市场和投资等方面的信息。此外,根据澳门与欧盟的合作协议,澳门将作为向亚洲推广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中心,并发展相关的服务体系和法律制度。

欧盟及拉丁语系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金融实力强大,澳门可利用其独有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发挥语言文化环境优势,吸引更多的欧盟及拉丁语系国家的银行来澳门建立分行。

3、发展与中国内地的金融合作

澳门本身的经济规模不大,金融市场需求有限。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澳门与内地的贸易和投资往来迅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澳门金融业的业务空间。作为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广阔的市场对外资金融机构具有极大的吸引力。1999 年 4 月,中国有关部门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要求,颁布了进一步放宽境外金融机构在大陆设立机构的规定。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同时,随着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减少,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国内消费水平日益提高,内地的融资需求会不断增长。澳门金融业应把握机遇,充分发挥其地理位置和自由港的优势,加强与内地的金融合作,如开发适合内地市场的金融产品,开设个人消费信贷和私人理财服务,组织银团向内地贷款,为外国投资者特别是欧盟和台湾投资者进入中国提供中介服务等。

4、与香港同业加强合作,共同发展

澳门金融业无论在人员素质、经营方式、管理体制还是在金融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滞后于香港,所

以应大力加强与香港同业在机构互设、人员交流和业务往来等方面的互惠互利的合作,并不断扩大合作范围和规模。应借鉴香港金融业的发展经验,利用其培训系统提高澳门金融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向其学习新的金融操作技术和知识,利用其金融市场、通讯设备和信息为澳门服务,将香港成熟金融市场延伸到澳门,以进一步促进澳门金融业的发展。

5、加强与台湾的金融合作

澳门与台湾关系密切。澳门国际机场启用后,可以与台湾直接通航,澳台两地往来非常方便。而台湾当局对台商到澳门投资不设限制。台北中小企业银行于 1997 年初特设澳门分行。澳门应利用这一优势吸引台湾银行继续来澳门建立分行,使澳门成为大陆和台湾之间资金融通的重要渠道。

6、大力发展各类金融市场,特别是离岸金融市场

澳门应利用自由港、低税和区位优势培育债券市场、建立和发展外汇市场、离岸金融市场,逐步形成区域性融资服务中心。抓住澳门经济结构转型的时机,建立债券市场,有助于本地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通资金,增强实力,提高竞争力。从澳门目前的实际经济规模来看,建立股票市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澳门的经济规模太小,本地企业上市集资的需求不大,而且邻近的香港和深圳都有股票市场,外地企业也没有必要通过澳门来集资。

与股票市场相比,澳门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首先,澳门是自由港,无外汇管制,税率低。其次,澳门楼价和租金比香港低,对外资银行的要求也比香港低。第三,澳门金融体系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迅速发展,通讯设施不断完善,为金融业务多元化打下了一定基础。第四,澳门毗邻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可利用香港的金融市场、金融管理技术、人才和信息为自身服务。第五,澳门是外资进入国内市场的桥梁之一,内地经济发展需要借助澳门的中介力量从国际上筹集资金。澳门应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中心,促进金融业向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双城记——港澳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余振编,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出版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2. 澳门货币暨汇兑监理署 1997 年年报

【责任编辑:孟庆顺】

浅析澳门的文化精神及意义

曾清慧

〔内容提要〕 论文通过对澳门人文化精神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分析,认为受西学熏陶 400 多年的澳门,以其宽容和开放精神,既吸收了大量西方文化,又保留了浓厚的东方传统文化,从而增强了东方文化的庞大凝聚力,这种澳门文化精神对中国在未来文化竞争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澳门的文化精神——开放性和包容性

1. 文化的定义和结构

据说世界上对文化的定义超过 500 个,尽管这些定义形式不一样,但大都是从精神和物质两个角度揭示这个概念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一个社会或一些人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括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具体化的物质实体。”(戴维·波普诺)。《辞海》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则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照逻辑学上对概念的定义方法,这个定义认为文化是精神物质的一种,它的本质属性是由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大概得出“文化”这一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1)文化是一种精神,(2)文化又是一种物质,(3)文化是由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根据文化的定义,我们很容易对文化进行结构分析。就象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的划分那样,通常可以把文化分成三个层次:(1)物质层次,例如服饰、娱乐、用具等;(2)物质化了的意识,或者称为制度层次,例如法律和道德规范、社会组织方式与结构、企业制度、社会控制形式等;(3)行为和观念层次,包括人们的稳定化了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文化的这三个层次,涵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包括物质、制度和意识。

2. 澳门的文化精神——开放性和包容性

关于文化精神的定义也有不同的说法。美国人类学家 A·L·克罗伯 1948 年在《人类学》一书中提出,文化精神是支配着文化并因此而使其成员的行为方式得以控制的那些理想以及价值系统。另一个美国人类学家 R·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精神是一种群众人格所构成的整个文化的倾向。简单而言,文化精神就是一个文化所特有的精神,它是使一个群

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文化特质的总和。

不少学者,例如魏美昌先生、黄汉强先生等著名学者,透过对澳门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潜心研究,提出“开放性”和“包容性”作为澳门的文化精神。笔者对此非常赞同。澳门是个典型的多元文化社会,开放和宽容的精神处处可见;接受其他民族和种族的文化,理解并尊重其他文化的意愿、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支配澳门社会的重要价值系统特征。这种精神是在 400 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的。虽然在当代世界,多种不同文化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共存已经不是罕见的现象,但是象澳门这样历史悠久、稳定而又丰富的却不多。因而,澳门不仅具有多元文化社会特征,还具有比一般的多元文化社会更加丰富的多元文化特征。笔者认为,用“开放性”和“包容性”来概括澳门的文化精神是恰到好处的。

二、澳门文化精神的形成

人类学家 R·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是人格的放大,每个社会都无意识地从人类各种潜力中筛选出它们认为正常的或理想的成分,符合这些规范的受奖,背离者受罚,从而造成世界观和行为的某种同一性;文化精神就是一种群体人格所构成的整个文化的倾向。

这种解释相当符合澳门文化精神的形成过程。15 世纪葡萄牙人以武力占领了果阿和马六甲后来到中国,企图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遭到惨重失败。由于国力不够,葡萄牙唯有采取迎合中国的方式,通过贿赂中国官员获得在澳门居留和贸易的特权,以缴纳地租和服从中国管治来顾全中国的尊严。在宗教传播方面,葡萄牙也以迎合中国文化的方式进行,学习汉语和儒家道德礼仪,研究中国的风俗习惯,采取灵活变通的态度达到渗透中国深厚传统文化的目的。明显,开放和宽容给葡双方都带来了好处,以本尼迪克特的解释来说,这种潜力

给予双方奖励,而它的反面正是惩罚。所以说,澳门文化精神是历史上中葡文化的长期碰撞中由社会选择形成的。

此外,笔者认为文化的连续性也是澳门文化精神形成的重要原因。澳门的文化主要由以华人为主要代表承载的东方文化以及以葡人为主要代表承载的西方文化构成。澳门地处华南沿海,以岭南文化为主要文化。虽然同属东方文化,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有较大区别。中原文化以儒家的重农抑商为传统,小农经济的价值观长期占统治地位;而华南沿海地区自唐宋以来就同海外有贸易往来,已经开始突破小农经济的束缚,开放的思想在这里有一定的基础。而葡萄牙文化属于开放的海洋文化。思想和意识属于比较稳定的精神文化,所以在澳门的华人和葡萄牙人身处东西文化的冲突当中,特别容易倾向选择互相尊重,和平共处的生活方式。

三、澳门文化精神的意义

1. 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推动中国和西方社会的进步

15世纪中叶以后的澳门,以其博大的胸怀对中西文化兼收并蓄,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先驱,为两种文化的交流作出巨大的贡献,推动了中国和西方社会的进步。澳门开放和宽容的精神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

成立于四个世纪前的澳门圣保禄神学院是澳门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的突出代表。它是中国第一座西方大学,被誉为“汉学家和西方人才的摇篮”。其课程包括汉语、拉丁语、音乐、哲学、神学、数学、天文、历算、物理学和医药学等,收取的学生以来华耶稣会士为主,也有中日教徒。该学院还大力选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虽然以传播教义为宗旨,这个学院却培养出许多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才。

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仅在1620年,传教士金尼阁就从欧洲带了7000部书籍到澳门。当时传进大量的由耶稣会士用中文翻译的近代科学书籍,包括天文、数学、物理、地理等各个方面,他们还带来了放大镜、世界地图、天球仪、地球仪等科学器械,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和通向近代科技的门户。在传教士及他们带来的书籍的影响下,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以当时先进的方法和知识研究中国的人口、农业及其他问题。例如徐光启对宗室人口的增长、春秋以后的蝗灾都作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统计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还撰写了《农政全书》等的著作。方

以智撰写的《物理小识》、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都是西学东渐的卓越成果。

通过澳门传入的西方文化,也推动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传教士王箫丰以汉字著有《西学修身》、《西学平治》、《西学齐家》和《童幼教育》等,把西方的教育介绍到东方。1839年英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创办的玛利逊学堂,是洋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也是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学校。其课程包括英文、中文、算术、代数、几何、生物、地理、历史、音乐等,成为中国新式学校的雏形。在澳门西式教育影响下,广东提出《新学制系统案》,并成为1921年通过的全国《学制系统草案》的基础。广东在1923-24年间便大致实施新学制,完成了从古代的传统教育向近代新教育的转变。

在澳门开放自由的环境之下,西方思想的传播非常迅速,澳门成了中国人感受和学习西方思潮的前沿地带,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维新思想家容闳、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医黄宽都曾在澳门学习,并在澳门受到西方人的鼓励出洋留学;林则徐和魏源在澳门得到西方的信息,编辑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制夷”的先进观点;郑观应在澳门写下《盛世危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有志青年学习西方知识,改变祖国落后挨打的地位;康有为、梁启超也曾在澳门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孙中山直接在澳门感受到西学冲击,立志出洋留学,后来还在澳门建立了革命基地。13岁就从澳门登船赴美革命先驱孙中山回忆当年在澳门的所见所闻时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有慕西学之心,穷天下之想。”从中可见澳门作为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先驱,对启发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起了相当的作用。

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在澳门活动的传教士也把中国文化精华介绍到西方,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

哲学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有深远影响的一个领域,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数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有巨大贡献的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明确指出,“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教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莱布尼兹大量吸收儒家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孔子、老子关于“道”的思想精华,以及宋代新儒学对“理”、“气”和阴阳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创立了单子学说。他的古典思辨思想为康德批判接受,进而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此外,从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迪卡

尔和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都可以找到中国哲学的渊源。可以说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儒家哲学的影响不无关系。

中国重农经济思想对欧洲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受到中国古代自然秩序思想的启发,将自然秩序视为法则具体化,完成巨著《经济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受魁奈的影响,了解到中国经济思想和政策的资料,并吸收了孔子的“天然自由”和司马迁的“自由经济”的思想精华,写成经济学上划时代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书中多次提到“天然自由”和“自由经济”,抨击英国保守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

中医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传播,对西方的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波兰会士卜弥格著有《中医津要》,翻译了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向西方介绍中医以舌苔、气色诊病的方法,以及中草药数百种,在西方产生较大影响。法国会士巴多明对中医向欧洲的传播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的工艺美术、绘画、建筑、数学等文化精华陆续透过传教士的推介和国际贸易传入欧洲,受到欧洲人的欢迎,对欧洲的艺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此不一一赘述。

2. 对解决当前宗教和民族冲突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有一定启发

虽然随着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世界“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自冷战之后,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民族纠纷和种族问题引起的流血冲突延绵不断,甚至还有加剧的趋势。文化冲突的严重性和经济领域的冲突一样,开始得到全球有识之士的重视。

而澳门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恰恰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生激烈冲突,唯有在澳门一直保持相互的理解和宽容。不少澳门人信两种宗教或参加两种宗教的活动而不受干预。天主教的主教和佛教的大师经常在同一个庆典上以自己的方式祈福。正如潘日明神父认为,“深晓以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相处共存的人民和民族,将本身的存在和所拥有的一切互相影响对方,在身体和心灵上持续不断地互相渗透,比其他文化形式更能代表反映出在特定时空中谱写的中葡历史。中葡两种源远流长的丰富文化在澳门这儿相遇相融,创造性地互相影响移植。”

俗语说“有容乃大”,从澳门这个历史文化名

城身上我们看到开放和包容的魅力和成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的理解,找到通向解决世界各地民族和宗教矛盾之路的方向。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池田大作教授对澳门文化精神意义做了高度评价,“澳门从来就是一个各种思想相互宽容的社会,在澳门,葡萄牙人文主义和中国宇宙观和谐相处。中西文化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在澳门这种开放而兼收并蓄的精神给各国不同文化增添了色彩。不言而喻,澳门文化将象灯塔一样给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带来光明和希望”。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差异将是永远存在的,如果大家都以宽容、求同存异的态度来处理这些差异,那么,我们就能相互调整,相互适应,避免对立和战争,如何更加积极地展开文化交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适应,寻求共同发展和繁荣的道路,是人类走向 21 世纪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澳门文化的精神应该能为此提供一些启迪。

人类社会目前还面临环境、犯罪、疾病和人口膨胀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和西方文明在当代占主导地位有关。东西文化大家季羨林先生认为,东西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处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东方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同自然形成一体,也就是以自然为友,研究自然、理解自然,再向自然要求衣食住行等必需品。而西方文化追求“征服自然”,同大自然为敌,对自然强行勒索生活必需品。由于西方国家在近代的兴起,西方文化占据了人类文化的主体地位,环境污染、新型病毒涌出、人口爆炸和犯罪率居高不下可以说是其必然结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中西方文化的深层交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通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得出结论:要建设“世界一体化”的美好未来,必然要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如历史上通过澳门的中西文化交流高潮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和中国的进步,人类社会现在也需要全球文化的全面交流产生的动力走出目前的困境。无可置疑,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可以为这个问题的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料和例子。

3. 有利于把澳门作为联接中国与拉丁世界的桥梁,推动多极社会的形成。

澳门 400 多年前是中国唯一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相比之下,现在澳门在沟通中西方面的优势可说相当有限。特别是由于通讯技术和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全球各国的信息瞬息可到达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甚至不少边远山区。而且邻近的香港已经

是国际性大都市，对中外经济、文化交往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澳门的文化精神在沟通中国与世界方面，还有什么独特的作用呢？

和香港或者其他中国城市不同，澳门文化是中、葡和其他民族在 400 多年和平共处、互相交融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澳门高度宽容和开放的文化精神，经过多年历史发展的沉淀才形成，其他地区难以取代。对于希望真正感受中西文化交流的魅力的人，只有身临其境和深入研究才能达到目的。因而通讯技术和网络对文化的传播能激起大众对文化的兴趣，从而激起对澳门作为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视，这样更能发挥澳门文化精神的作用。

澳门的文化以中华文化和拉丁文化为主，和香港的盎格鲁撒克逊为主的文化有较大差异。其宽容的文化精神，造就了澳门深厚的拉丁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拉丁文化扣中华文化交融的现象，就是在整个中国大地也是少见的。因此澳门现有的独特功能之一，就是利用她在语言、法律和习俗方面的双文化特色，大力发展同拉丁欧洲、拉丁美洲和拉丁非洲的关系，和香港主要联系英语语系的国家为主的功能有所区别。世界上的拉丁国家和地区有 80 多个，人口接近 10 亿，约占全球人口六分之一。此外有一点很重要，葡萄牙是欧盟成员国之一。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日益独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前苏联分裂之后，美国在世界上就扮演着唯一的超级大国角色，在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一国独大，在实施制裁、废止核试验和国际贸易谈判等问题上表现霸道，引起国际社会不满。中国如果加强利用澳门和拉丁世界、欧盟关系密切的优势，增进与这些国家的来往和了解，在国际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意見，以共同的声音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就能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起到阻遏作用，推动多极社会的形成。这是澳门文化精神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

4. 有利于提高中国在 21 世纪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21 世纪的全球竞争是“知识经济”的较量，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投入和产出比例大大下降，它是以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为动力，以全民文化素质 and 创新能力的大幅提高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知识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它不单需要尖端的技术，更需要具有能动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的人才。虽然澳门本身的技术水平不高，但是充分利用澳门文化

兼收并蓄的特点，长远来讲对发展中国的知识经济不无益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属于物质文化）是在交流中进步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最主要动力，因而我国要在 21 世纪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加大和其他国家的交流。由于澳门在对外交流，特别是对拉丁世界和欧盟的交往有渊源流长的历史，拥有掌握中文、拉丁文和了解中外文化的人才，它对促进中国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欧洲的交往将大有作为，这对中国了解、购买和掌握新技术有很大帮助。此外，澳门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开放和包容的精神，如果能在全国掀起澳门文化热潮，深入研究和推广澳门文化精神，对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培养开放精神也有一定促进作用。这是澳门文化精神对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意义。

21 世纪的全球竞争还是深层的文化竞争。由于文化的交流融合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长期来看，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必然趋势。精神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随着经济领域竞争的加剧，精神文化的竞争在 21 世纪将日益突现。可以预见，和经济一体化过程伴随竞争和冲突一样，深层的文化一体化也将伴随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美国为了维护和扩大其国家利益，不遗余力地在全球推广其文化和价值观，对巩固其国家安全，开拓美国产品（包括物质和文化产品）市场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要在下世纪提高竞争力，就必须进行深层的文化竞争，为此，中国必须弘扬东方文化，向世界推广东方文化的精髓。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增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无疑目前主宰世界的是西方文化。西方国家科技水平明显占优势，出于民族偏见而轻视东方文化；东方国家为了改变经济落后状况，出于务实原因而重视西方文化，并没有贯彻东方文化的精神。而澳门作为一个小城，受西学熏陶 400 年之久，却以其宽容和开放的精神，既吸收了大量西方文化，又保留了浓厚的东方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内地有过之而无不及。研究澳门精神和推广澳门精神，可以挖掘东方文化的优势，增强东方文化的强大凝聚力。这大概就是澳门文化精神对中国在未来文化竞争方面的意义。

（本文蒙中山大学雷强、姜伯勤和章文钦教授聚会指导，以读书笔记形式写成，谨此向三位老师致以衷心感谢。）

【责任编辑：黎熙元】

澳门经济转型中工业企业的发展*

孙 昭

〔内容提要〕 澳门经济面临着转型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定义这种转型,它的实现都应以工业的发展为基础。促进工业发展应从宏观、微观两方面入手。澳门的工业企业规模小、资金少,而且存在着经营上的问题,文中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同时从现代经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几点意见,并探讨了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政府的指导、辅助作用。

七十年代,澳门凭借港商向外转移出口加工业的机缘,迅速的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并为整个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而澳门工业发展显现出明显的后劲不足,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就已出现了负增长。众所周知,澳门经济面临着转型的挑战。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现代后工业社会的经济是第三产业占很大比重,同时工业的现代化程度也非常高的体系。所以,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具有澳门特色的经济转型,它的最终实现都应以工业的发展为基础。

澳门工业现状

1. 从总体上来说,澳门工业是一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单一结构。澳门工业主要分为制造业、采矿业、电力及自来水等几大部门。虽然,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工业的转型就成为了各界人士的关注焦点,但到目前为止,工业转型尚未取得良好的效果,某些劳动密集型部门在工业中的比重反而有轻微回升。以纺织、成衣为例,从 1989 到 1993 年,它在工业结构中的比例从 72.13% 上升到 72.87%,而出口比重则由 68.9% 上升到 72.9%。^① 而从就业人口分布来看,工业积聚了 28.1% 的就业人口,其中有 70% 以上分布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中。^②

2. 工业企业的规模小。在澳门的企业中,除个别大企业外,都是中小型企业。从雇佣的人数来看,制造业中规模小于 100 人的占了 39.7%; 100-499 人的占了 52.3%; 500 人以上的只有 8%。^③ 从资本来看,有 80% 以上的企业固定资产不足 100 万澳元。

3. 出口导向型工业的产品市场相对集中。澳门作为一个微型经济体系,本地区的需求有限,但长期以来对外有广泛的经济联系,并且得到了一些地区的配额优惠。在整个亚太区,澳门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仅次于香港、新加坡,处于第三位。澳门的出口市场以前是以欧洲为主,现在则转向美国。1996 年,澳门对美国的出口量占总出口额的 40.3%。

澳门工业的这些状况是微观个体经营活动的总和,虽然澳门的企业被一些经济观察家看做是具备了 (1) 即时生产反应系统; (2) 零存货管理等优势的灵活个体,但许多因素表明,澳门的企业还不能被称为现代企业。

1. 从资本的来源看,几乎所有本地企业的开业资金均来源于自己的积累或亲友的资助,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多为独资、合伙企业或家族企业。股份有限或有限责任公司所占的比例很小。在企业的运营中,澳门的企业主也多依赖于自身的资金,向银行借款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是件不可理解的事。企业的扩张也都要依赖于企业自己的积累。这种资金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传统的保守思想造成的,企业主都想通过保持资金的“纯度”来保证自己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这种陈旧的资金观念使得企业的扩张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妨碍了现代化企业制度在澳的推行。

2. 从企业的生产上来看,澳门企业的生产是一种被动的、消极适应市场的生产。产品的设计、创意均来自于客户的要求。企业是极少设立专业的设计部门的。在澳门的中小型企业中,由大客户或中介商提供设计方案的占了 70% 以上,并且仍有 5% 左右的企业对设计没有明确的概念。企业基本

* 本论文得到导师孟庆顺的指导

上不对国际市场的变化作调查,不去积极寻找适应市场的办法。同时,澳门企业的产品附加值低。3/4 的澳门企业无自己的品牌,企业为客户代为生产并冠之以对方的商标。同时,企业的生产过程是一种简单的劳力操作,技术、科技含量不高,产品增值额低,而且,技术型企业的发展速度是缓慢的,以电子产品为例,在 1989—1993 的四年间,它在工业中的比重仅从 0.95% 上升到了 3.46%。^④

3. 企业一般不用去寻找客户,订单大多来源于老客户或其他企业的“转包”。澳门的企业一般都没有自己的品牌,也极少为自己做广告,近 45% 的订单是通过一些私人关系获得的(包括同行、朋友和老客户),而仅有 10% 左右的订单是市场推广的结果。总的说来,澳门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它导致了产品对市场变化反应的惰性。在生产的旺季,企业习惯于把一部分订单转发给其他企业生产,以平衡产需的差异。利用这种方法,企业很少体会到扩大生产规模的压力,所以,企业扩张的动力也很小,导致企业满足于较小规模的生产,从而无法享受到边际成本下降的好处。

4. 劳动力水平低下,但劳动力成本并不经济。在澳门的就业人口中,工业领域就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最低,大部分未接受过教育的就业人口大都滞留在这一部门,其中制衣业的文盲比例为 3%。工业就业人口水平的低下与企业不积极推行职业培训活动有关。全社会培训程度最高的行业是通讯及服务(100%),而工业只有 20% 左右。^⑤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已令澳门失去了开业初期的劳动力优势,当业主能支付的工资小于求职者的预期时,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大多数企业都会面临劳力紧缺的压力。同时,企业为了避免过高的工资开支而不会考虑扩大生产规模。

总的来说,澳门经济微观个体属于传统式的保守经营,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企业规模较小。所以,澳门的经济还处于资本主义的中低阶段,只能说是一个发育不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为转型留下了空间。

工业转型: 微观改革和政策指导

工业的发展不仅仅是工业自身的事,制度安排在其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制度包括行政的安排,也包括人们的思想、传统的制约等等,工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微观的配合。澳门由其

自身条件的制约,它的转型具有一定的特色,可表述为:内部改善投资环境,提高人口素质,外部利用自由港和作为大陆开放窗口的作用,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同时,积极推行经济的现代化、高级化,实现整个经济体系的升级。对于澳门的企业个体而言,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崇尚竞争的市场,他们更需要的是直接的微观改革和决策积极配合。

1. 澳门企业的经营者缺乏现代资金运作的观念。对现代企业而言,零负债率不见得就是好事,它代表的很可能使企业无上进心,扩张的动力。一间成长的、有活力而有健康的企业,应保持一定的资产负债率(通常为 1—2),利用经济杠杆获得更多的资金。澳门企业的零负债率经营局限了企业的发展、营运空间。

2. 澳门企业应逐步转向一种“市场导向”的生产模式,而不是保持现有的“大客户”模式。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要适应市场,就必须掌握第一手的市场资料,并积极的组织调查、研究,掌握一定的市场分析、预测能力。澳门企业由原有的“大客户”模式得到的只能是一些第二手的资料,再进行被动的、应激式的生产。澳门企业要想成为一流企业就不但要成为市场的互动者。还要最终发展为市场的引导者。

3. 澳门企业应树立营销的概念,如果澳门企业直接面对国外的需求者,而不通过中介的话,不但可以拥有更好的客户关系,还可降低产品对最终客户的成本,加强产品的竞争力,这就要求企业树立营销的观念,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在现代的经营中,“营销”意味着“以满足人类各种需要为目的,通过市场变潜在交换为现实交换的活动。”^⑥企业应具有自己的标识,自己的品牌和独特的营销手段。好的营销不但可以将产品销售出去,还可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是产品升级的一种途径。

4. 澳门企业应导入科技,进行机械化、科技化的生产。下个世纪将是知识的时代,知识将取代其他的生产资料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投入。利用知识进行生产的企业将是增值最快、产品附加值最高的,在生产中应用科技,一方面可应用高科技去促进传统工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建立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在这两方面,澳门都进行了一些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澳门企业涉足高新产业,一般可采取三种方式:本地企业与科教、研究机构合作,如现已建成的浙大—贺田工业技术研究所,清华—宝法德技术开发中心等;本地企业与国外或内地中小型企业合

作开发；独资经营。对于澳门本地工业而言，由于目前企业的规模不大，所以当它们要涉足科技产业时，适于进行中小规模的投资。高新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企业在运作时，应多借鉴西方国家风险投资的具体做法，积极筹资，并审慎投资。由于起步较晚，企业要注意投入的生产不要与周边经济区域有大多重复，但又应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在澳门周围，珠海打算建立以电脑软件、生物工程和新材料为主的高新产业；深圳高新产业的两大支柱为通信和软件；台湾面积一平方公里的新竹工业园，主要是以电脑辅助生产设备和电脑游戏软件为主。遵照相关而不重复的原则，澳门企业可以考虑发展电脑周边设备和生物工程。

总之，企业应从资金结构和寻找新的发展点、新市场两方面来考虑经营的改革。当然，企业的投入，企业的改进还需要得到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政府除了在基础设施、制度方面有所作为外，还可以通过直接的产业政策或企业经营指导来帮助企业扩大规模，改善产业结构。

1. 政府要确定全澳的发展规划，合理的使用土地，引导工业转移。在凼仔、路环两个离岛上，土地的闲置现象严重，而市区的容量已趋饱和，如果把工业逐步迁出市区，不但可改善市区的环境，还可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澳凼第二大桥的建成和半岛与离岛内公路网的完善又增加了这种迁移的可行性。政府除了在政策上引导外，还应联合银行对企业进行支持，如建立调整援助基金、提供廉价土地等。

2. 政府应着力进行学校教育的改革和推行职业培训，提高全民的素质和劳动力的适应能力。一方面，为工业的改造升级提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同时也为疏导因产业结构转型而淘汰下来的闲置劳动力寻找出路。

3. 在对企业的经营指导方面，政府应积极鼓励、组织企业间的合并。澳门企业的规模较小，资金总量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显得力量过于薄弱。这种小企业也往往得不到银行的贷款支持，限制了企业的发展空间，得不到规模经济的效益。澳门经济的目标首先应是打破这种小规模瓶颈。在澳门企业家队伍尚未完善、企业家族式管理盛行的时候，政府有必要介入市场，制造出一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集团，以它们为现代企业的试点和规范，带动全澳工业及至贸易、金融旅游等行业的发展。

具体做法主要有两种。政府设立一两个大型项

目，并投入资金进行前期的筹备、组织工作，同时大力宣传，鼓励民间私人资金和投资基金的入股，组织起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导入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和经营方法，另外一种则是政府有目的地、有选择地收购一些私人企业，进行所谓的“国有化”，然后对这些企业进行重组和改造，组织起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集团，并聘请专家进行管理。该集团成熟后，政府可靠逐步出让集团的股份，即实施“私有化”。后一种方式类似战后法国所采取的方法，它对法国经济的复苏和科技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并有效的提升了这个国家的国际经济竞争力。

4. 在科技发展方面，政府应注意引导传统工业向内地的转移，并为新型工业的投资和发展提供信息和指导，政府在企业的升级改造时可以起到咨询的作用，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并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企业间的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

5. 在与内地的合作方面，政府应逐步明确并贯彻两种合作、一种为基于工业转移、寻求低价劳动力方面的合作，一种为互补互利共同发展高新技术的合作。而后一种合作在将来所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广东省多年来的科技出口额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与澳门相邻的珠海、深圳在发展高技术项目开发方面都做出了不少成绩，并聚集了不少的专业人才。这两地因地理位置的关系，与澳门合作起来将更加便利。它们不但可以为澳门的科技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更可提供人才、资金的支持。吸引中资来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

注释：

①杨允中等：《论澳门产业转型》；《澳门总览》（1996年版）

②澳门统计暨普查司，《就业调查》，1998年

③澳门统计暨普查司，《人力资源需求及薪酬调查》，1998年

④R D Cremer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Conditional Of International Dependency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⑤澳门统计暨普查司，《企业职业培训需求调查》，1998/1999

⑥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

【责任编辑：陈丽君】

依托内地

粤港合作推动中药现代化发展

郑佩玉

〔内容提要〕进入 90 年代以来,天然药物开发已成为世界医药发展的潮流。中药是中华民族国粹,它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已列为我国产业发展的重点。广东是我国中药产业的主要基地之一,香港亦拥有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种种潜在优势,粤港两地依托内地、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的技术创新体系和运作良好的合作机制,将有力地促进现代化中药产业的发展,并成为粤港区域经济增长点。

一、粤港合作发展现代化中药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医药产业与人类的生存健康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一直被人们称为“朝阳产业”,是目前世界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在国际市场中其销售额仅次于计算机产业。仅美国每年销售额达 600 至 800 亿美元。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素质的提高,防病、治病、提高健康水平、延长人们的寿命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对保健食品和药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对其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对于疾病的病因、病机的认识愈来愈深刻,单纯的疾病治疗将可能逐渐被预防、保健、治疗、康复相结合所取代(冯国荣)^①。可以预料,生物医药将仍然是 21 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

近几年,天然药物开发已成为世界医药发展的新潮流。这是由于以化学合成为基础的新药开发已面临着日益艰难的困扰:一是开发周期长、成功率低、难度大、费用高;二是化学药物毒副作用较大,药源性疾患日益增多,以及容易产生抗药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化学药的发展;三是近年出现的世界性疑难病症,如肿瘤、艾滋病等,还没有找到有效治疗的方法,促使人们产生了“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90 年代青蒿素、紫杉醇等植物有效成份的发现,极大地鼓舞了人们从动、植物、矿物和海洋生物中去寻找新的药物品种或先导化合物。因此,日本等国已开始进行中药材标准提取物的生产,美、德、法、澳、加和韩国等国家亦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天然药物的开发^②。今天世界上约有 20% 的人口在使用天然药品来防病治病,天

然药物已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的食谱。由于市场需求的日益增加,天然药物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额每年均以双位数增长,高于化学药品的增长速度,1997 年约达 270 亿美元(含保健品),占全球药品市场 30% 左右。从市场结构看,欧洲是最大的市场,占全球销售额 45.5%、亚洲第二位占 33.3%,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市场占 18%。预计未来其市场占有率将不断提高。可见,天然药物开发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由于天然药物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市场需求急速增长,潜力巨大,近几年一些国家已先后对传统中草药的政策作出重大的改变,给予正式承认,并立法管理。对药物管理最为严格的美国药品食品管理局(FDA)从 1995 年开始受理中药复方药物的注册申请,制定了专门的审批办法和程序,随后又实施了“植物药品在美上市批准法”、“植物药研究指南”等。1997 年欧洲药物评审局(EMEA)成立了草药工作小组,该小组已提交了有关草药的管理草案。1996 年新加坡政府亦开始受理中药产品注册。这表明,中药正面临着进入药物主流市场的机遇。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国粹。在“回归自然”的潮流下,中医中药日益受到世人的重视和接受。目前,全世界 124 个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中医药机构(陈凯先)^③。临床研究表明,中药品效性性和安全性优于化学药品,其毒性和副作用小,在防病、治病、治疗慢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疑难病症以及增强体质、抗老防衰、延年益寿等方面具有许多化学药物所没有的效用。与化学药物相比,中药还具有开发周期短、成功率高、投资少、

收效快的特点。因此,它的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今天,我国中药业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对中药进入国际市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中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极低。据海关统计1997年仅占草药市场的2.6%,约4.2亿美元,并以原材料为主,粗制品为主。中药难以打入国际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基础研究薄弱,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工程技术水平滞后,大部分民间方剂是由长期的临床经验积累而成,缺乏科学化的成份、活性、安全性和临床疗效数据分析。再者,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中西医药在哲学思维、医学模式、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也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和中医药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而这些又使以西医药为主的国家难以衡量中药的效用,对中医药国际化构成很大的障碍。因此中药进入国际主流药物市场必须凭借中医学的传统优势,大力加强多学科融合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按照国际认可标准进行开发、生产,在质量控制和临床试验达到国际规范便成为现阶段中药现代化的目标。

二、粤港合作发展现代中药业的有利条件

1. 广东发展中药业的优势

广东中成药生产已有1300多年历史,基础雄厚,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成为我国中药产品的主要基地之一,总体水平多年来在全国居前列。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多年来中药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

多年来我省在中药产值、效益等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1997年,中成药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拳头品种103个,数量居全国第一,占全国22%,拳头品种产值占25%,为全国之冠。

(2) 剂型齐全 名优品种多

广东生产的中成药剂型齐全,品种过千种,名优品种多。至1997年底,卫生部公布的国家中药保护品种360个,其中广东有77个,占21.4%,居全国首位,从“八五”以来广东开发中药新药数量是全国较多的省市之一。

(3) 拥有一批骨干企业

广东拥有一批历史悠久,在华人中享有盛誉的中成药生产企业,1997年全国中成药国有企业50强中,广东有10家。明朝万历27年建立的陈李济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号称我国中成药三大名家。最近,它与广州奇星制药厂等联合组成广州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最大的中成药企业,并成功在香港H股挂牌上市。三九企业集团是国家中药管理局重点扶持的全国50家重点中药企业之一,该企业自1987年投产以来,已积累了110亿元的资产和47亿元的无形资产,三九胃泰已获俄罗斯药品注册认可。最近,该集团提出力争在五年内建成世界最大、最先进的植物药厂。可见,广东拥有一支中药现代化的中坚企业。

(4) 研究开发实力雄厚

广东中医药教育、科研和临床等方面的实力居全国先进行列。广州中医药大学在抗癌药和抗艾滋病药物研制方面处于全国先进水平,第一军医大学、中山医科大学、中山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中药和天然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实力。

近几年,广东还先后建立了一批符合国际规范的研究机构,国家建立的四个中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就有一个在广东。

(5) 拥有与中药相关的工业技术优势

中药饮片浓缩颗粒生产技术和传统中药饮片的创新技术,广东在这一领域已处在国内之首。可供食品工业和医药辅料应用的甲壳素等海洋产品已进入规模化生产。中药复方有效成份提取新工艺已成功应用于“藿香正气胶囊”和“六味地黄胶囊”等现代中药的生产中。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萃取分离技术和控释制剂技术的应用推广,广东也处于国内先进水平^④。

2. 香港发展中药业的优势

香港许多居民是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和保健,对香港发展中医药抱乐观的态度。最近,工联会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有85%的市民认为特区政府应在经济上扶持本地中医药的发展。特区政府提出香港要发展成为国际中医药中心,要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

(1) 香港中药生产有一定基础和经验

据香港中医药发展筹备委员会对519家中药制造商、出入口商和批发商问卷调查的资料显示,至1997年9月1日止,在274家经营中药材的商户中,有99家兼营加工炮制;在310家经营中成药的商户中有151家兼营中成药的制造。目前,香港生产500多种中成药,其中一些以单方、验方、秘方、古方和传统工艺进行生产的名牌中成药,在华人市场中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极受欢迎。香港还拥有一批如“李众胜堂”这样历史悠久的生产企业。进入90年代以来,中药制造商开始密切注意在剂型、

包装设计和质量控制等方面向国际接轨,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2) 香港中药业与内地有着深厚的渊源

长期以来,香港中成药生产和药材市场主要依靠内地提供原材料、中药材和半成品。香港现在经营的中药材 2000 种,中成药 3300 种,其中 80% - 90% 来自内地^⑤。进入 80 年代以后,有的中药厂已北移内地,与内地形成“前店后厂”的生产格局,为今后进一步扩大合作发展奠定了基础。

(3) 香港是内地中药、药材出口贸易的中介

截至 1997 年 3 月底,香港约有中药零售店 1270 家,在上述 519 家问卷调查中,从事批发业务的有 458 家,出入口业务的 261 家(多为兼营)。据海关统计,1993 年内地中药、药材出口的 30% 经香港转口。香港拥有中药、药材广阔的国际营销渠道和国际市场营销经验,成为传统中药全球最大的国际集散中心。

(4) 教学、科研队伍初步形成

据调查显示,1996 年香港约有 7000 多名执业中医师,其中 40% 拥有中医全科学学历,其余为祖传或师传^⑥。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和香港生物研究院等已先后开展了中药研究。最近,科技大学研究出利用基因芯片鉴定中药品种、产品及品质真伪的方法,这为中药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条件。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浸会大学等三所大学都开办了四年全日制中医课程。除大学以外,香港还有 30 多家机构进行中医药人才培养。这些机构开设的 150 多项的中医药培训课程中,涉及内容也很广泛。这些机构在培训中医人才,提升业界的专业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切说明,香港中医药的教育培训、科研的基础力量已经形成。从 1995 年开始,政府通过“工业支援资助计划”投入了 1.1 亿港元,支持 22 个有关中医药项目的研究,其内容涉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草药及中成药质量控制、改良生产技术、建立资料库以及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等。

(5) 香港拥有国际商业服务中心的种种优势

香港金融市场发达,国际融资渠道畅顺,融资环境优越,国际风险资本云集,创业板市场已投入运作,更有利于中药业筹集资金。香港是一个国际商业服务中心,以自由经济闻名于世。它拥有先进、迅速的国际信息和国际商贸网络、市场声誉好和管理经验丰富,在品质控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亦具有优势。同时,社会、经济运作机制完善,法制健全。在“人才全球化”的今天,香港又是世

界上最能汇聚人才的地区之一。

上述一切都为香港中医药的研究开发,开拓国内外市场,实现中药产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提供了基础条件。

3. 粤港合作有内地强大的中医药基础力量为依托

内地中医药资源十分丰富,中成药制造已具规模,是中药的发源地和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科研开发实力雄厚,基础坚实,是粤港合作发展现代化中药产业的强大后盾。

经过历时 10 年的调查发现,我国已知的 3500 种高等植物中可开发利用的天然药物共 12807 种,其中植物药 11146 种、动物药 1581 种、矿物药 80 种(周俊)^⑦。几千年来临床实践,我国积累了数以万计的秘方、验方约有 300000 余项,被国际上称为人种药理学的原始资料。

近几十年来,我国中医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中药材、炮制、化学、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药理、毒理及临床等方面的研究,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药典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为进一步研究开发高效优质中药新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国家实施了一批重点科技项目,获得了一些重大的中医药科技成果,中药新药研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在药理、临床方面已超过日本,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及中药化学研究虽略逊于日本,但也有达到或超过日本的品种和新技术。这为中药现代化创立了重大的科学技术基础。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科研、设计和生产开发相结合的学科齐全、多层次、多元化的中医药科学研究体系。拥有一支中西医结合,多学科相互渗透,素质较高的科研队伍。据统计,我国现有 2500 多家中医医院,30 多所中医药高等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名牌大学也参加中药研究)、50 多所独立医药科研机构 and 上百个新产品开发机构,以及数万名中药研究开发专业技术人员。近几年国家还先后建立了四个中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些科研机构正努力按照 GLP、GCP 的国际规范进行建设。

中药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全国现有中成药制造厂约 1000 家,其中一些已发展成为制药集团。中药品种 8000 多个,其中常用品种 1000 多个,保健食品 3000 多种,有的已进入国际市场。内地中药市场巨大且具开拓潜力,1998 年中药产值已达 300 多亿元,大部分为内销。粤港合作不仅在开拓

国际市场方面前景广阔,在开拓国内市场方面亦具有巨大的空间。

三、推进中药现代化的合作模式和合作领域

1. 合作模式

按照上述两地合作的优势,粤港中药现代化合作的模式应是:以内地为依托,充分利用内地的丰富药材资源、研究成果和中医药研究人才,通过香港引进国外资金、先进设备和新技术,聘用熟悉欧美药物法规、品质控制和研究开发的专业人才,在香港进行应用研究,使香港在粤港两地合作中定位为中药商品化、国际化的“孵化器”和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培训中心,广东应着重成为基础研究、进行临床试验和中医药制品生产的基地,通过香港营销网络把产品推销到其他国家,从而在两地之间逐步形成一个包括产品研发设计、资金、原材料和装备供应、生产工艺和技术、管理创新、人才组合、职工培训,市场营销网络建立以及现代企业形成等环节在内的,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医药产业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

2. 合作领域

(1) 大力加强中医药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合作

这方面的合作主要是在中医药理论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开展对传统中药物质基础、药理学、毒理学和临床学以及传统中药的提取工艺、制剂工艺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按国际认可的 GLP 和 GCP 的规范标准制定出指导生产操作和反映药物质量的可控指标;通过对代表性中药复方药物的系统研究,总结、概括出中药复方药物研制开发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标准化规模,为建立国家标准,争取国际公认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利用广东已建立或正在筹建的 GCP 中心和 GLP 中心共同合作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 GLP 实验室和 GCP 临床药理研究基地^{⑧⑨}。

(2) 选择重点产品进行合作开发

从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目标出发,粤港两地应根据国际市场需要和对草本药技术的要求,分期分批选择一些质量好、安全、有效、加工精细的品牌中药进行合作开发,推向国际市场。一是合作进行二次性开发,选择一些符合上述标准的品牌药品,根据目标人口国(近期应以周边国家为主)的相关要求,进行二次开发和改良包装。这是一个投资少,投资期短,收效快的途径。二是开发保健品,

中药还可作保健、护肤之用,因此应尽快组织力量,两地合作开发一批中药保健产品。保健品适用范围广泛,入口管制较中成药宽松,投资少,而且时间短,一般只需 1-2 年。三是合作进行新药开发,中药开发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复杂系统工程,粤港两地依托内地进行合作开发,有利于各自优势的发挥,加快研究开发的进程。

(3) 加快两地企业实施 GMP 生产管理的步伐

目前,粤港两地大多数中药生产企业规模小,技术设备和生产管理落后。香港传统中医药业长期处于没有中医药立法、没有中药注册的状态,生产企业亦无推广 GMP 规范管理。广东中药生产企业正在开展大规模的 GMP 规范化改造,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其进展与形势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两地企业都需要更新生产设备,引进技术、更新生产工艺,提高制药工程技术和生产管理水平。

(4) 按 GAP 规范共建无公害药材生产基地。

中药的研制开发,没有优质的药材,再好的药方也失去疗效,不能生产出好的中药产品。中药材的质量和药理活性成分的可控化是中药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也是一大难点。按照国际标准建设无公害药材生产基地,对提高粤港两地中药材出口贸易地位和中药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意义。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一些大的贸易机构通常是要求药材生产必须符合 GAP 规范。该规范标准主要包括:①种子与培育,②耕作,③收获,④初步加工,⑤包装,⑥储存和运输,⑦设施,⑧人员和仪器,⑨文件管理,⑩培训,⑪质量保障等。

(5) 合作进行中药知识产权注册保护

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尚在起步阶段,中药知识产权的内容并不十分明确,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还很薄弱。中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获得国际公认的知识产权,并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广东需要与香港合作,参照国际惯例,建立专门机构和专项基金,对发明者的知识产权给予保护,还要在培养一流的国际法律专家方面进行合作,以对付越来越多的国际诉讼。

(6) 合作建立开放性的中医药信息网络

中医药合作需及时获取大量的有关技术、金融、人才、科研、产业、市场以及法律、法规和标准等多元化的信息。粤港两地拥有相当丰富的中医药信息资源。广东可先行一步,与香港合作建立中医药信息网络,以满足两地中医药合作发展的需要。

(7) 加强中药现代化人才培养的合作

现代化中药产业的发展,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础。粤港两地在人才培养方面各有优势,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高等学校是中医药高等技术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两地高校可建立一个相互沟通、紧密联系的机制,以促进两地学术交流与合作,互为对方输送所需的人才以及共同合作培育人才。

(8) 联手建立跨国企业集团

当前,医药产业国际化程度极高,世界医药市场却为少数跨国制药集团所控制,它们为取得国际竞争优势而走上联合发展的道路。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未来的十年国际医药市场 80-90% 的销售额,由约 50 家跨国医药企业集团所控制。我国要在世界医药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参与国际竞争,就需要粤港联手组建跨国企业集团,不断提高中药在国际市场占有率。

3. 合作机制

为实现两地合作的上述目标,需要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合作机制。政府、企业、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在其中要各尽其责、各施其政,缺一不可。企业是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主体,把中医药的新技术、新工艺,通过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商品。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是知识创新的载体,必须通过企业才能把知识创新转化为商品,实现产业化。政府在两地实现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合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为两地合作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医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建议两地政府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推动。

(1) 在两地政府高层联席会议的基础上,建立创新科技合作委员会,就合作中的各项事宜进行指导、咨询和协调。

(2) 广东省政府成立一个由常务副省长领导,由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高层决策小组,负责制定和协调发展现代化中药产业的政策,以及两地合作的政策,并组织力量就两地合作发展中医药开展追踪研究。改善目前研究力量过于分散、研究工作时断时续的现象。

(3) 建立完善的法制。加强两地有关中医药法律、法规的研究,对两地合作过程中出现纠纷所产生的法律冲突,应通过法律途径进行协调解决,并制定双方认可、清晰的指引、政策或法规,尽量减少因两地法律不同而造成的种种障碍。

(4) 鼓励两地合作共建科技市场,发展中医药技术贸易。

(5) 根据两地共同研究开发的需要制定政策措施促进多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制定两地人才流动政策,简化人员进出手续。

(6) 加强与香港有关支援服务机构(如生产力促进局、工业科技中心公司、贸发局、职业训练局和商会等民间机构)的沟通与合作,鼓励这些机构来广东合作开展服务业务,提供如设备、培养新的科技型公司、技术扩散和改善,培养人才、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服务。政府要调查了解过去它们在广东开展服务业务所遇到的困难,为它们建造一个开展服务业合作的良好环境。

(7) 强化金融扶持政策

对具有市场发展潜力、技术含量高、经营效益好的中药企业,提供贷款的优惠,对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发前景好的创新项目给予融资支持。研究对在广东的香港中药制造商提供贷款的可能性。有关部门应对符合香港创业板条件的中药企业加强指导,提供咨询服务,推荐上市。充分发挥香港引进国际风险资本的桥梁作用,积极开展在深圳创立第二板市场的研究工作。

(8) 合作组建创新与科技合作基金

创新与科技合作基金是为推动两地厂、校、研究机构合作进行中/下游研究发展项目,实现成果商品化,其中以中药研究项目为重点和起点。

(9) 尽快落实国家关于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成立中小型企业协会,加强与香港中小企业协会的沟通与合作。

(10) 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的活动,坚持不懈地大力普及科普教育、知识产权教育,宣传中医药文化,培养科技创新的风气。

注释:

①③⑦ [香港] 科技产业合作论坛——发展香港现代化中药产业, 1999 年。

②⑧ 国家科委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内地香港生物医药领域合作发展战略研究》,广东科技出版社,1997 年。

④⑨ 广东省科委:《粤港合作推进中药现代化前瞻》,1998 年。

⑤⑥ 香港中医药发展筹备委员会报告书,1999 年。

【责任编辑:钟言】

论新时期内地与香港 经济合作的若干问题

周运源

【内容提要】 1997 年 7 月 1 日,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焕发出新的活力,她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与合作呈现新的格局。事实上,香港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特殊贡献,同样,祖国内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对香港经济的繁荣也有着特殊的作用。本文主要从经贸、金融业、旅游业和制造业方面,提出今后内地与香港经济联系合作中的若干对策。

一、内地经济发展对香港影响的要素分析

(一) 内地经贸发展对香港产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内地对外交流的日益密切,经贸活动的正常,有序的进行,内地整体对外贸易得到蓬勃发展,并对香港的经济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1. 进一步强化了香港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功能作用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香港整个对外贸易额中的 80% 以上是来自内地,因此,内地经贸的发展无疑为香港的整体对外贸易提供了稳定的货源,这有利于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作用的继续保持和稳定的发展。近年来,香港整体对外贸易水平得到提高,其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排名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1997 年香港对外贸易在世界上的排名已由 1996 年的第 12 名,上升为 11 名,而 1998 年又从 1997 年的基础上再向前提升,在世界排名第 10 位,1999 年又上升为第 9 位,这足以说明香港经济贸易发展,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香港整体对外贸易这种地位和作用,毫无疑问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分不开的,正如香港有识人士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如果没有内地商品、货物对香港稳定的供给和相互间商流、物流的

畅通进出,香港在国际上世界贸易中心地位持续保持也是很难想象的。

2. 进一步促进了香港与世界各地的经济交往和合作关系

香港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地区),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贡献良多,特别是香港回归中国后,由于社会经济保持稳定的发展,加上 1997 年 9 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在港成功举行,亚太地区不少大公司(企业)仍然涉足香港地区,由此进一步加深了香港与亚太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和合作关系。因此,香港的发展前景被持续看好。

再从更广的范围考察,经过重新改组的世界贸易组织已于 1995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运作,这同样为香港拓展与世界的经济贸易联系与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香港回归后仍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保持和发展与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贸协作,无疑为香港在新世纪继续拓展与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此外,作为外经贸依存度高达 90% 以上的香港,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关于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纳入协定的要求,也为香港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因素,因为无论是知识产权还是服务贸易,香港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均呈领先发展的有利地位,这必将进一步推动香港与世界范围的经贸联系与合作关系持续发展。

(二) 内地金融业的发展对香港金融业产生的

影响

1. 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作用的维持和加强

作为香港第二大银行集团的中银集团, 据 1997 年底资料显示在香港地区已有 13 家兄弟行, 共有分支机构 378 家, 员工 21.8 万人, 中银集团的总资产达到 5880 亿港元, 几乎占了香港地区金融资产总额的 12%。近几年来, 中国内地除中银集团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也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 涉足香港的金融(服务)业的业务运作。与此同时, 内地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骨干企业在海外上市的资产有 90% 选在香港上市, 而 1997 年的统计, 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 H 股 20 只, 筹资金额达到 235 亿港元, 市值 190 亿港元。如此等等, 中国内地成份股在香港股市的增加, 不仅使香港金融业中的整体实力增强, 也十分有利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继续和稳定发展。

2. 内地金融业的持续发展, 为内地与香港在新世纪的金融(服务)业的联系合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一般讲来, 地区之间或者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或具体在金融方面的联系与合作, 除了某些极个别或特殊因素制约下会存在政治制度的约束外, 就一般普遍的规律性而言, 经济的或金融合作的核心点, 主要在于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开放的程度或者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 内地的金融体制也逐步向市场化、国际化等方面加经改进和提高, 内地的金融市场也通过借鉴香港金融运作的成功经验, 开展与香港的卓有成效的全面合作, 并且正逐步改革和完善今后与国际金融市场对接中提供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方面的保障。因此, 假以时日, 建立在金融市场化、区域化程度不断提高基础上的内地香港金融(服务)业的全新的合作体系, 必然随着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完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得到形成。

(三) 内地旅游业的进一步开放、发展对香港旅游业的影响

1. 有利于继续保持和发挥香港国际旅游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据香港旅游业的业内人士普遍的共识, 香港旅游业真正得到长足发展, 乃至成为国际旅游中心, 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事情。事实上, 70 年代末, 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并且取得的成效, 包括宽松的公民的出境探亲、旅游等政策, 毫无疑问对香港国际旅游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 中国政府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更加松动有关内地香港经济、旅游等全面合作的政策, 包括进一步开放和拓展内地旅游资源, 内地休闲旅游等旅游产业的强劲发展, 出境旅游的居民比率大幅上扬, 尤其是近期世界级的旅游集团迪士尼公司已选址在香港落户, 等等, 这些都为进一步开展内地与香港旅游合作, 继续发挥香港国际旅游中心的作用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2. 为香港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旅游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早在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久的 1998 年初期,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接见香港旅游协会的代表团时就表示, 中央政府根据内地香港旅游业合作发展的实际, 同意进一步放宽内地居民赴港旅游的配额和限制, 香港旅行社在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联系合作中可以与内地各有关旅行社合作经营, 有效地利用内地旅游资源, 共同拓展内地的旅游业。1999 年 4 月中央政府又进一步作出政策性规定, 允许包括港澳地区在内的境外资本可以与内地有关部门合资举办旅游公司等。加上其他一系列与合资举办旅游社配套措施的实施, 无疑为香港旅游业进一步自由地拓展两地的旅游合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机遇。

3. 旅游业作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

香港回归祖国为其旅游业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作为素有无烟工业之称的旅游业, 在香港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自 90 年代初, 特别是 1996 年以后, 香港不仅是亚洲地区旅游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而且香港旅游业的增长率是世界同行业增长率的 3 倍。仅 1996 年来港的旅客数达到 1170.27 万人次, 旅游收益达到 845.20 亿港元, 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8%, 成为该年度香港第二大创汇行业。目

前,在香港大约有 20 多万人从事旅游业及有关工作,占到全港就业人数的 12%。因此,可以预期,随着香港整体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香港的旅游业必将在新时期得到持续发展。

(四) 内地香港制造业的合作对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1. 粤港两地双方政府高层的沟通,拓展粤港两地的高新技术联系与合作,是双方共同利益的根本需要

香港回归祖国后,就如何加强香港与内地,特别是加强粤港两地的经济科技合作,共同促进整体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两地经济界、科技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经过各不同层次的联系和接触,特别是 1998 年 3 月粤港两地政府高层首次联席会议在广州正式举行,双方就经济科技等全面合作达成了共识。并且这次高层联席会议约定,每年在广州或香港按例举行一至二次这样的会晤。由此可以预见,粤港两地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以及合作拓展高新技术对双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十分积极的和深远的。正如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田长霖先生指出的,香港的繁荣和经济发展,香港和内地的合作是必要的。

2. 推动了香港对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有资料证明,香港在工业科技的研究上投入不足,一直以来落后于亚洲的其他“三小龙”。而在香港工业大规模转移到内地及其他地区已达 20 多年的今天,随着内地生产成本的逐步上扬,也迫使香港必须下决心拓展高新技术工业,否则就难于确保香港持续发展的后劲。原中国国家科技部宋健主任认为,香港是靠商业发展起来的,但是未来几十年能否继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决心转向高科技产业化。香港应该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这是香港前途所在。董建华特首也曾在多个不同的场合重申,要加强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因此,香港除了在 90 年代中期以来增加对工业的支持和投资,成立香港工业及科技发展局,建立工业科技中心,开展对香港建立科技园的可行性研究的实质性工作外,又于 1998 年初正式成立了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由中国内地、美国和本地的 12 位著名科学家组成(其中 2 名为特区政府的官员),研究和落实香港的科技产业与创新科技的协调发展等问

题。

3. 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的科技互动

近年来,香港有的工业已与内地的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开展 R&D 的合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面有的港商在珠江三角洲的深圳、惠州、东莞等地兴办了一些高科技的企业。而且香港有的部门和深圳市也已考虑在深港交界地,联合兴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再就是在广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自创办以来也吸引了不少港商的进入,开展高科技产业的合作。此外,内地正利用本身的科研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结合香港在科技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等方面的优势,实施互补、互利共谋拓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

二、若干对策研究

(一) 内地与香港工业合作的构想

1.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两地工业合作机构

实行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管”齐下的方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内地香港工业的协调机构,从机构组织等方面保证工业合作的持续发展。

内地香港的工业合作与发展,从根本上来讲,离不开双方共同利益的所在。为了协调共同利益,从以往的经验来考察,仅有半官方的或者民间的工业协调组织仍是不够的,其作用也有限的。因此,内地香港今后应当在健全已有的而且已被实践证明有效的协调机构的基础上,突出双方官方协调机构的建立和完善,类似粤港工业合作协调促进会组织,以专门研究和组织实施双方工业合作发展的有关政策,促进内地、香港各自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2. 建立邻界工业走廊

选择一定的特殊地区,建立工业走廊是工业发展中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据此香港可以在边境邻近的地方与内地(主要是毗邻的广东省深圳市)建立起具有鲜明特点的工业走廊,以进一步加强两地的工业联系与合作。工业走廊中投资办厂的企业,可以让内地香港的企业界自由选择投资方式、投资规模和具体的经营运作形式,在工业走廊内没有经济边界可言,完全由企业按照自由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经营运作活动。

3. 创建“深港湾区”

早在前些年有香港学者曾提出,香港不应该将本身局限于特别行政区范围内,而应与珠江三角洲的有关市镇(如深圳市的南山区和广州番禺的南沙)组建成类似美国旧金山湾区那样的“深港湾区”或称“深穗港湾区”。在此湾区内可以分别选择内地香港双方迫切需要发展的制造业,或服务业加以联合发展,或者在湾区内选择为制造业、服务业配套的航运业等联合发展,如此使内地与香港的工业合作迈上新的层次。

(二) 拓展内地香港贸易合作的思路

1. 松动加工贸易政策及建立和健全配套措施

事实上,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最早的也是通过引入香港等境外工业进行加工贸易的活动,当然早期是通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形式进行的,后期大规模发展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的“三资”企业。据有关资料显示,1998 年仅广东省的加工贸易业务总量中,“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承担了九成八,可见广东省加工贸易基本上是由境外加工完成的。当然内地其他省份加工贸易由境外资本承担的比例要低些,因此,为着继续保持和促进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合作,在加工贸易的有关政策上要进一步松动。同时,也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与加工贸易新政策相配套的具体措施,才有利于从真正意义上落实 1999 年中国关于下发加工贸易新政策 35 号文件的精神,促进内地香港经贸合作的持续发展。

2. 进一步加强内地香港服务贸易的联系与合作

近年来,服务贸易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据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专家分析,21 世纪初,世界服务贸易额有可能占到贸易总额的 30% 左右。香港也顺应这一发展势态,在服务贸易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以年均增幅 20% 的幅度上长,而香港服务贸易占其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 1982 年的 32.5%,增长到 90 年代末期的接近 50%,而且今后香港的服务贸易仍然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反观内地,长期以来不重视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的发展,这也与内地服务业长期滞后其他产业的发展有关。因此,“97”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为带动内地服务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机遇,内地有关部门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应

在重视采取相关政策和措施,加快本身服务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外贸经营体制,加大对服务贸易支持、扶助的力度,强化内地与香港发展服务贸易的政策和措施,使内地香港在服务贸易和相关联系合作中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3. 通过加强香港对离岸贸易的信息收集和反馈,带动和促进内地离岸贸易的发展

由于离岸贸易的特殊性,尽管香港近年来离岸贸易得到较大的发展,然而,它一般仅是根据转运或直接付运进入国际市场的实际的进出口(包括转口)贸易额进行估算的,因为长期以来香港都未有把离岸贸易的数额统计在香港对外贸易数字内,这样就难免使离岸贸易数量的准确性、科学性打了折扣。而在另一方面,对内地而言,离岸贸易基本上没有开展,这与内地对外贸易的发展极不相称。因此,今后应通过进一步加强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合作,通过现代化的信息网络手段,及时做好香港离岸贸易的信息收集和反馈工作,提高香港离岸贸易数字的准确度和可信度;另一方面在内地的发展对外贸易,应学习香港发展离岸贸易的成功经验,加强这方面的人员培训和业务运作的切实开展,以此促进内地整体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

(三) 内地香港金融业合作的对策

1. 松动相关的规定,增设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内地香港金融业的联系和沟通,通过协商进一步宽松互设金融机构审批条件,使内地在香港,或者香港在内地设立更多符合两地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金融机构。

以内地的上海为例,历史上它曾经有过金融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上海外滩也曾被海内外金融界誉为金融业云集的重要场所。中国改革开放后上海又列入“龙头”加以发展,因此,上海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又如,广州在历史上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改革开放后广州经过 20 多年发展,又被作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因此,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包括香港在内的境外金融机构进入广州,也和广州在香港等境外建立金融机构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2. 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发挥内地香港资本积聚的优势,切实提高两地的筹(融)资功能。

众所周知,作为亚洲银团贷款中心地香港,其

金融业务运作功能、辐射功能是很强的。而内地随着经济建设全面展开,特别是国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建设与发展的新政策的实施,全面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短缺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香港在与内地的金融合作中,可以发挥其对内地筹(融)资的重要作用,积极支持内地社会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近年来,内地的工商企业境外上市的数量逐步增加,而这些在境外上市的公司(企业)有 90% 以上选择在香港上市,这对于增加香港股票市场的中国成份股,使内地工商企业学习、吸收香港股市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内地、香港股票市场联系和合作,无疑具有跨世纪发展的重要意义。

3. 进一步加强内地与香港在外汇、期货和保险等市场的联系与合作,以促进两地金融业整体合作的全面发展。

香港的外汇、期货和保险市场都是比较成熟的市场,这些市场比较规范运作的成功经验,十分值得内地学习。内地在逐步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境外在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的有益的成功经验,而且,近年来内地一方面在加大培育外汇、期货、保险等要素市场的同时,另一方面也相应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例如,2000 年 3 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等地允许外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基础上,又再次拓宽了地区范围。1999 年初中国有关部门又作出规定,扩大境外保险公司与内地合资组建保险公司的范围。中国的期货业也在进一步作出调整和整顿,允许境外资本涉及内地期货业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了。因此,所有这些都为在新时期进一步拓展内地与香港在金融业整体局面的联系合作准备了重要的条件。假以时日,中国内地与香港金融业联系与合作的范围、层次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四) 加强内地香港现代化旅游业合作的建议

既然,内地与香港在旅游业方面的联系与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那么,笔者认为必须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拓展两地的旅游合作:

1. 继续简化游客的出入境手续,提高内地香港两地互相之间在商务、会议、展览、观光、购物和休闲等旅游活动的互流。

内地方面,应在总结以往居民出境旅游等活动

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有关的限制,特别是由于内地工作日的缩短,人民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居民出港澳游、出国游等仍有强劲增长的趋势。因此,有关方面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内地居民出境旅游的有关政策。同时应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吸引更多的境外旅客。例如近年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率先提出拓展“都市旅游”,尤其是上海打起“海派文化”、都市风光的旅游特色,广州则拉出羊城旅游的招牌——吸引境内外旅客。

香港方面,也应当把旅游业的重点放在拓展内地旅游的发展战略上,应该充分认识到,内地 12 亿人口是香港最大的客源市场,开拓这一市场,旅游业的前景十分可观。同时,还应当切实把握拓展内地旅游与拓展台湾、日本甚至其他的境外旅游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内地地大物博,名胜古迹多,尤其是目前许多新开辟的旅游景点,可以吸引游客前往观光。因此,香港旅游协会可以通过加强与内地有关旅游公司(企业)的合作,联手拓展为香港居民所喜闻乐见的内地旅游活动。

2. 建立更多的旅游公司(企业),做好发展特色旅游业的“红娘”。

更多地建立合资和合作等形式的旅游公司(企业),为香港人内地游、内地人香港游当好“旅游红娘”。从 1999 年初,中国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先后出台了允许中外合资建立旅游公司等规定,这无疑为香港、内地合资建立更多的合资旅游公司,吸引更多的内地人游香港、香港人游内地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这也是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加强内地香港旅游业的联系与合作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当然,内地香港旅游合资公司(企业)的兴办,可以考虑多种形式,有的可以香港为主建立跨境旅游公司(企业);有的则可以考虑以内地为主建立合资旅游公司(企业),甚至在内地应适时松动政策,可以由私人举办旅游公司。香港旅游协会也可以考虑与内地私营性质的旅游公司(企业)合作,进一步促进内地与香港旅游业在新世纪的更好发展。

【责任编辑:许锡挥】

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特征与形成机制

毛艳华 郑天祥

〔内容提要〕大都市连绵带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本文对大都市连绵带的概念进行了充分的论述，通过与国际上发展完善的大都市连绵带相比较，刻画了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基本特征，并探讨了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形成机制。

一、前言

大都市连绵带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城市地域空间及其影响范围发生了根本变化，大城市逐步被城市化区域所取代，形成规模庞大的大都市连绵带。如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的波士顿—华盛顿大都市连绵带和中部五大湖地区的芝加哥—匹兹堡大都市连绵带以及欧洲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集聚区。从 70 年代开始，亚洲环太平洋沿岸经济高速发展，也形成了新的大都市连绵带。如日本东海道的东京—名古屋—大阪大都市连绵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达、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也开始出现了向大都市连绵带发展的趋势。如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等地区。大都市连绵带是一个国家产业、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社会经济要素的集中分布区，它的发展牵动着整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并对世界经济运行格局产生着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成为我国城镇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朱剑如博士等在 1986 年就指出：“目前，我国最有条件、能迅速建成的城市带，莫过于以穗港澳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带，这是过去人为隔裂而未被人注目的一个新颖、特殊的城市带”。中山大学郑天祥教授等（1991 年）从城市网络的角度描述了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的雏型特征。随着国际性城市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回归，珠港澳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不断加快，城行间的功能联系也将进一步加强，珠港澳大都市带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内对外联系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将更突出。1999 年 10 月 6 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题为《培育优秀人才，建设美好家园》的第三份施政报告中强调要协同发展珠江三角洲，并指

出：穗港澳深珠之间的五万平方公里，必将形成更紧密整合的区域经济。……整个区域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亦将成为香港进一步富裕繁荣的动力。”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铨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庆祝大会上发表题为《团结奋进，共创新机》的讲话中也提出：“澳门与香港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这是必然的趋势。对珠江口地区的基建项目进行经常性的协调，有利于澳门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把处在“一国两制”特殊背景下的“珠港澳”作为一个整体，从大都市带的视角对其进行城市功能地域方面的研究探讨，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二、大都市连绵带的概念和划分

大都市连绵带是由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群体，是大都市区的空间联合体。大都市连绵带的概念最初是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 Gottmann）提出的，称为 Megalopolis。1957 年，戈特曼把美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密集区域用原意为巨大城邦的希腊语 megalopolis 来命名，说明这一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由纽约、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纽黑文、费城、巴尔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组成的功能性地域。在这一地域，城市沿主要交通干线连绵分布，城市之间联系密切，产业高度集聚，形成主轴长 600 英里，人口 3000 多万的大城市连绵分布带。

大都市连绵带的划分标准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总人口规模。戈特曼将总人口的下限定为 2500 万人。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总人口达到 0.35—2.5 亿才是典型的大都市连绵带。（2）人口密度。戈特曼认为人口密度至少达到 250 人/平方公里，核心区人口密度应更高。

戈特曼的 Megapolis 概念比较含糊与笼统，仅反映总人口规模与密度，对在城市连绵带中起核

心作用的中心城市数量和规模以及城市之间的关联性并无具体标准。在大都市连绵带发展比较成熟的欧美和日本等国家,一般意义上的大都市连绵带由若干个大都市区联合而成,它只是一种城市地域空间形式概念,而不像大都市区既是一种地理空间概念,又是一种城市地域行政管理单元。另外,由于亚洲以及中国的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在发展背景、功能特征和成因机理诸方面与欧美国家存在着很大差别,而且各国学者由于研究的背景和理解的空间尺度不同,因此对大都市带现象的价值判断、概念定义和指标界定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议。例如,对于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有称为珠港澳大都市带、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紧密结合的珠江三角洲大都会区以及黄金三角区等等。但是,无论采用什么名称,给以何种解释,这些概念的内涵之间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表明,作为城市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大都市连绵带的形成有其必然的一面。

三、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地域范围和构成

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包括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 28 个市县和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东西长约 300 公里,南北宽 200 公里,总面积 4.78 万平方公里。在这个经济区域内,1999 年总人口近 3000 万(若加上常住流动人口则在 4000 万以上),平均人口密度 836/平方公里,已超过戈特曼提出的城市带最低人口 2500 万人的规模指标和人口密度下限 250 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指标。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由 26 个城市组成,包括 1 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香港)、1 个中国特大城市(广州)、1 个大城市(深圳)以及澳门、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番禺、顺德、南海、新会、肇庆、台山、三水等 13 个中等城市和花都、从化、增城、惠阳、开平、鹤山、四会、恩平、高明、高要等 10 个小城市。在珠江三角洲 1995 年进行的城市群规划当中,首次提出了中部都市区、东岸都市区和西岸都市区的概念。在珠江口的东岸,香港和深圳紧密相联,互动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东部大都市区的核心;在珠江三角洲的中部,特大城市广州已成为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同时还是全国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广州是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中部大都市区的核心;而在珠江口的西岸,澳门和珠海构成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西部大都市区的核心。

四、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现状特征

与欧美和日本等国发展较完善的大都市连绵带

相比较,正在成长中的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中心城市数量与规模

中心城市在大都市连绵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是人口和产业集聚的引力中心。在世界上已形成的大都市连绵带中,其中心城市都是规模在世界居前位的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如美国东北部沿海和五大湖以南以及西部太平洋沿岸 3 个美国最大的大都市连绵区集中了美国的主要大城市。日本、英国等国家大都市连绵带也都以首都等大城市为核心。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以国际经济中心城市香港为其核心城市,还有国际中等城市澳门和国内特大城市广州等中心城市。

2、城镇密度高

大都市连绵带是一巨大城市群体,除数个大的中心城市外,其间还有大量中小城市,是一个城市等级体系完整的高密度城市分布区。发展程度高的大都市连绵带内的城市最终将首尾相连,形成以城市景观为主的地带。例如,美国东北沿海大都市连绵带内包括几十个中小城市,形成一个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市镇的城市群体。中小城市发展快、数量多、密度高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一个显著特征。1996 年共有城市 26 个,城市之间的最远距离一般不超过 100 公里,大多数在 50 公里以下。以广州、深圳等城市为核心的次级城市群用地向中心城市靠拢,连片趋势已十分明显,如广州市与周围的南海、番禺、花都、佛山等城市之间由准城市化地区相连,呈连绵之势。目前,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共有建制镇 392 个,城镇密度为 100 个/万平方公里,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足 10 公里。如深圳到广州之间穗港经济走廊,城市沿广深公路、广九铁路分布,形成城镇密集带,连片趋势十分明显。

3、中心城市功能向周围小城镇扩散

在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内,主要中心城市的城市功能已出现向周围小城市扩散的现象,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经济活动特点的地理区域。如中部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广州与周围的佛山、南海、三水、花都等城市有快速交通干线相连,通勤时间大多在 1 小时以内,已出现居住地点和就业地点分离的趋势,形成周围城市与广州市之间通勤、城市之间的人流与物流以及社会、经济都密切联系的都市化地区。在东部大都市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香港与以深圳为龙头的城市群具有密切的生产联系和社会经济融合。深圳、东莞、惠东、惠阳以外向型经济为

主,在生产组织、销售上与香港有密切联系。香港受发展空间、地价、劳动力价格的局限,资金、技术、产业向深圳、东莞等城市分流,同时居住空间也向这些城市延伸。

4、人口城市化水平高

大都市连绵带是一高度城市化地区,世界上几个主要大都市连绵带大多达到很高的城市化水平。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广州,集中了广东省近 70% 的城市人口。1995 年该城市带按户籍非农业人口计算的城市化水平已达 70% 以上,若包括大量的外来暂住人口,实际的城市化水平达 80%,因此,珠江三角洲可列入世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5、形成了优越的区域经济发展网络

欧美大都市连绵带的空间结构大多沿交通轴线呈带状发展,具有发达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道、通讯干线、运输管道、电力输送网和给、排水管网体系等等。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发展网络、产业发展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发展迅速,人流、物流、资金移动规模大,速度快,城市与农村联系紧密。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大都会连绵带内已形成了二条经济发展轴线。包括:香港——深圳——东莞——广州主轴线以及广州——顺德——中山——珠海——澳门次轴线。目前正在论证的万山群岛“桥港结合”方案,将形成澳门——香港经济发展轴线,这样三条经济发展轴线首尾相连,真正形成“黄金三角区”的环状经济发展网络,会比其它国际大都市连绵带的经济发展轴线更为优势。

6、大都市连绵带内部的分工与合作

目前世界上发育比较完善的大都市带,其内部都有着高度发达的分工与协作。以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的波士顿——华盛顿大都市连绵带为例。一方面,各中心城市都有各自的个性特征,有占优势的产业部门。作为核心城市的纽约,其城市职能是综合性的,它不但是国际经济中心,而且是国际政治中心;费城是该都市带的第二大城市,为美国东海岸主要的制造业中心;波士顿是有名的文化城市,为美国的科研院校集聚区,也是高科技产业基地;位于该大都市带南端的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而另一中心城市巴尔的摩市,为美国东海岸重要的海港和工商业中心。另一方面,大都市带内各城市彼此间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群中流动,促使人口和经济活动更大规模地集聚,形成大都市带巨大的整体效应。这种整体效应首先表现在大都市带内部进行

的产业结构转换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即核心城市纽约依靠其科技、资本和产业优势,在大都市带内产业结构调整中所起的先导创新作用;其次,整体效应表现在大都市带多样化、综合性的整体功能远大于单个城市功能的迭加,“波士华”被视为全美的心脏地带,对美国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最后,整体效应表现在大都市带在世界经济中的枢纽作用。“波士华”大都市带具备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各种通道,国内外各种要素和信息在这里汇集、交换和流动,都市带集聚的产业、金融、贸易、科技、信息等力量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发挥着枢纽的作用。

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内各中心城市之间也开始出现城市功能的分工与协作。作为核心城市的香港,其功能也是综合性的。香港凭借其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在该都市带中起着重要的金融服务、商贸服务的作用;深圳毗邻香港,为珠江三角洲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中心城市广州,是珠江三角洲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也是该大都市带的技术创新基地;而以澳门为核心的大都市带西部地区,将发展成为旅游中心和港口中心。但是,珠江三角洲的其它大城市却普遍存在产业结构的重复和城市功能的类同;另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核心城市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内的其它城市形成为很好的协作关系,推动了整个大都市带的工业产业化进程。然而,如何解决好“一国两制”条件下大都市带内的分工与协作以及提升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国内与国际地位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性的研究课题。

五、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形成机制

九十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开始从理论层面和实证角度探讨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的形成机制。中山大学许学强教授等(1994 年)从劳动分工和工业生产组织的角度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大都会区形成的基本原理。阎小培教授等(1997 年)从都市区的界定入手,剖析了港澳珠地区都市区的特征并探讨了穗港澳都市连绵区的形成机制,认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良好的地区条件、资金集聚、技术和人才集中、行政联系减弱、城市地域扩张、非农化速度加快、城乡一体化显现和综合交通网络的轴向促进作用是穗港澳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形成的主要原因。另外,胡兆量等(1993 年)分析了广东沿海城市发展的动因和优势,描绘了 2010 年广东城市带的发展蓝图。香港大学薛凤旋(1995 年)

从城市化的角度说明了珠江三角洲城市地域空间格局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带,也不同于麦吉的“kotadesasi”模式,他称为“外向型城市化”空间地域。

综上所述,由于所处的城市化时期不同,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形成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连绵带。另外,与辽中南、京津唐和长江三角洲等国内城市密集区相比,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成因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发展无论是区域条件还是内外动力都具有其独特性和典型性。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形成机制包括以下 4 个方面。

1、国家政策——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形成的先决条件。

首先改革开放的政策。自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以来,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高达 15—20%,超过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使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结构和城乡空间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都位于中国的前列。相比之下,以上海为核心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虽然早在 70 年代就被戈特曼确定为世界第六大城市带,然而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该城市带未发育完成,上海也未成为远东最大的经济中心,这与该地区长期的封闭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其次,各种优惠政策的综合作用,形成了“经济特区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城市”的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城市地域空间类型,与港澳紧密相连,协同构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最后,“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为珠港澳协同发展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成为可能。

2、港澳窗口——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形成的区位优势。

毗邻港澳、以港澳为对外联系的窗口以及拥有国际城市香港,这是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区位优势,这些是我国其它城市密集区都不具备的。香港和澳门是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形成的重要促进因素。一方面,珠江三角洲长期接受国际城市香港和澳门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经济飞速发展,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便缩小了与港澳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步实现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雏型;另一方面,国际经济中心城市香港,是世界第三、四位的国际金融中心、第六大航空港、第十一大贸易中心和十大消费品生产

中心,拥有世界最大的货柜码头。澳门是国际中等城市,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另一重要通道。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拥有香港和澳门,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一个真正具备完全意义的国际大都市连绵带。

3、外向带动——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形成的外推力。

外向带动战略对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外资对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形成所起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大量的外资投入是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带能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短时期内形成其雏形的动力来源,同时也是该大都市连绵带持续发展的资金保证;其次,外资是大都市连绵带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动力来源。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方向发展,劳动人口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最后,外资(包括港澳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流入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强化了香港的离岸金融服务、资讯服务和商贸服务的职能,使香港真正成为了国际城市。

4、工业化——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形成的内驱力。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走出了一条以外资驱动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它依靠港澳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和出口销售渠道,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它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双向并举的发展战略,其产品面向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市场(莫安达,1997年)。这种珠江三角洲特色的工业化模式对大都市连绵带形成的驱动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乡镇工业的空间集聚极大地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的小城镇建设。“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工业企业集聚模式是珠江三角洲乡村城镇化的具体表现;(2)工业化使香港这一核心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并得到合理转换;(3)以农业为主导的乡村经济向以工业为主导的城镇经济转变。在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劳动力呈现出以结构性转移而非地域性转移的特点,这种“离土不离乡”的特殊转移方式使人口城市化的水平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快速提高;(4)工业化极大地促进了基础设施网络的发展。基础设施网络的大力发展,使珠江三角洲的城乡交流和融合进一步加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都市区、大都市区和大都市连绵带。

【责任编辑:多天】

对粤港澳经济研究的一点思考

袁持平

[内容提要] 以往对粤港澳经济研究的文献,较多的集中于研究两个互有关联的问题。一是研究粤港澳经济合作;二是研究粤港澳经济一体化。本文拟对这两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发展作一探讨。

一、粤港澳经济合作的研究

对粤港澳经济合作问题的探讨,一般是从如下几种思路来展开的。

1、通过优势的比较来说明粤港澳经济合作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澳门具有资本、技术、市场、管理和信息优势;而广东拥有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因此,遵循国际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广东与港澳地区各自根据相对优势进行经济往来,对双方的经济发展都有利,据此,粤港澳经济形成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

2、通过产业的更替和升级来阐释粤港澳经济合作的现实性。在广东改革开放之初,港澳地区由于市场经济较为成熟,产业正处于升级、更替时期,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逐渐兴起,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急待转移。此时,广东经济百废待兴,接纳港澳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好构成了广东经济的一个增长点,于是粤港澳经济在产业交替方面实现了有效的合作。

3、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来说明粤港澳经济合作的必然性。尽管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新情况会遇到一些障碍,但两百多年前“看不见手”的原理仍足以说明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粤港澳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的长期合作,港澳商人为什么愿意到广东来投资,广东为什么又愿意接纳他们。简言之,利润使然,或者说优化资源配置使然,萨缪尔逊在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用市场原理给予了一个巧妙的说明,他指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如同国内贸易一样,只要存在着产品的价格差异,只要存在着利润,就会有贸易。正是由于粤、港、澳三地间,存在着许多产品和要素方面的价格差异,存在着利润,因此,就存在着粤港澳的经济合作。

4、粤港澳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的一点展望

研究粤港澳经济合作的许多文献,在分析了粤港澳经济合作的必要性、现实性和必然性之后,大都提出了加强三地经济合作的对策。譬如,应加强粤港澳地区的基础设施、金融、工业等方面的合作,概言之,应加强粤港澳地区所有经济要素的全方位的合作。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感慨:深圳、香港、珠海、澳门这一片不太大的地区,竟有四个国际机场,简直就是资源浪费。但事实上,假若这四地要是只有一个机场的话,由于通关等原因带来的不便,可能将会造成更大的效率损失和更大的资源浪费。这里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加强粤港澳三地的经济合作,能够通过资源的流动和政府的努力,而使三地的所有经济要素都达成有效配置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一般而言,在市场成熟且没有壁垒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会导致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如果上述条件不成立,则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阻碍粤港澳经济全方位合作的一个关键因素,从表象上看是在于存在着两个关税壁垒,从而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但从实质上看,依据国际经济学的观点,是三地经济体制的差异,影响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国际经济学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区域之间的合作,既存在合作的利益,也存在合作的成本。只有在各经济区域之间经济体制相似程度大,经济关联紧密,区域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性很大时,加强经济区域的全要素、全方位合作的利益才会大于合作的成本。换言之,经济区域之间的经济体制相似程度的大小,与经济区域间全要素合作的利益多少,有强的相关。

目前,香港是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澳门是政府干预较强的半市场经济体制,而广东总体上离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如何在现

有条件下,降低体制差异造成的不利影响,实现粤港澳经济的有效合作,这就需要展开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研究。

二、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研究

有关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除了有从总体上探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文献,还有探讨深港一体化,珠澳一体化,深港珠澳一体以及珠三角地区与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层面探讨了一体化的现状、阶段性、前景及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国际经济和制度经济的视角来探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问题。

1、建立深港珠澳最优货币区域的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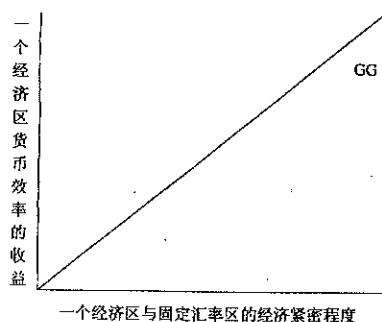
根据国际经济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紧密程度,是这些区域实现一体化的必要前提。考虑到广东的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市场化的程度较高,加之由于地缘等优势,两地与港澳的经济联系亦较紧密,故应首先建立深港珠澳一体化的分析框架。

确定不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分析框架,优先要考虑的是何时一体化的问题。国际经济原理表明:浮动的汇率,可使各经济区域减少各种经济波动带来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浮动汇率也有负作用。它使相对价格难以预期或使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降低。为了权衡一个经济区域加入相互固定汇率的集团后的得失,就需系统地考虑不同经济区域一体化后,它带来的牺牲保持稳定权力的损失和提高效率和信誉的收益。下面分析将说明,一个经济区域加入固定汇率区后的得失主要取决于该经济区域与区域内贸易伙伴的一体化程度。固定汇率是适用于通过贸易和要素流动而成为一个体化的地区,这就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其理由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说明。

1) 经济一体化和固定汇率区的利益: GG 曲线。

一个经济区是否加入固定汇率区,可以通过构造一个简单的图形来说明其选择,画出一个 GG 曲线,它表明一个区域加入固定汇率区后的收益大小,取决于该区域与固定汇率区的经济紧密程度。或者说一体化的程度。如图 1 所示。

固定汇率的主要优点在于简化经济结算,并且与浮动汇率相比,在进行贸易决策时提供一个更具预测性的基础。由此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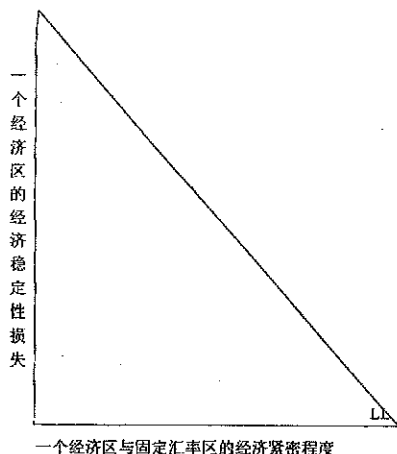


(图 1)

个经济区域与固定汇率区的经济联系非常一体化,那么当这个经济区域与固定汇率区的汇率固定以后,将获得很大的货币效率收益。跨区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则货币效率收益就越大。斜率为正的 GG 曲线表明了一个经济区域加入固定汇率区后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货币效率收益之间的关系。GG 的斜率为正,说明一个经济区域与固定汇率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获得的货币收益越大。

2) 经济一体化和固定汇率区的成本: LL 曲线

固定汇率区的成员有得有失,即使在该区域通货膨胀率非常低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为一个区域加入了固定汇率这就意味着放弃了运用汇率和货币政策工具使就业和产出保持稳定的权力。加入固定汇率区后的经济稳定性损失与货币效率收益一样,和一个经济区与固定汇率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有关,可以用第二个图形 LL 曲线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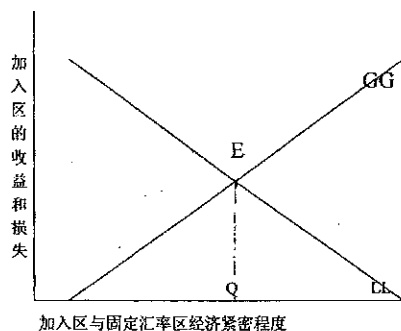
为了推导 LL 曲线,必须了解一个经济区与固定汇率区的一体化程度如何影响经济稳定性损失的大小,如果一个经济区是固定汇率区的成员,并且

对这个经济区产出的世界总需求减少了——即这个经济区的 DD 曲线左移。如果其它固定汇率区的 DD 曲线也恰好同时左移,那么由于自动稳定性的作用,所有固定汇率区的货币将相对于区域外的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导致世界总需求上升。一个经济区与固定汇率区的一体化程度和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经济衰退越少,相应所需要的经济调整也越少,其理由主要在于,这个经济区与固定汇率区内成员之间的贸易和劳动力流动增加,减少了区外世界总需求减少的影响。同样的理由,上述结论也适合一个经济区域的世界总需求增加的情况。如果一个经济区与固定汇率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经济区价格水平的轻微上升,将导致区内成员资本和劳动力的涌入,从而很快使这个经济区产品的超额需求消失。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经济区和它加入的固定汇率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在产出市场波动时,经济稳定性损失越少。LL 曲线说明了这个结论,LL 曲线的斜率为负,这表明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加入固定汇率区使该经济区遭受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越小。

3) 加入货币区决策:把 GG 曲线和 LL 曲线结合起来。

图 3 把 GG 和 LL 曲线结合起来,说明一个经济区应如何决定是否加入固定汇率区。



(图 3)

GG 与 LL 交点 E, 决定了一个经济区是否加入固定汇率区所依据的经济一体化的临界程度 Q。在大于 Q 的任何经济一体化程度上,加入固定汇率区都会给该经济区带来正的净收益。

上述最佳货币区理论,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不同经济区域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益处,并给出一个经济区何时加入一体化的条件。当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欧元面世以后,欧盟已将上述理论变成了现

实。尽管这一转变的历程有数十年之长,但它毕竟为我们研究粤港澳经济一体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复杂且生动的案例,由于不同经济区的经济紧密程度是实现一体化的必备条件,而不同经济区域经济体制的相近程度又是确定经济紧密程度的前提,因此,将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研究,首先定位在深港珠澳一体化的研究上,是有其理论依据的。

作为深港珠澳一体化的重要环节——最优货币区的建立,本文拟提出一个三步走的初步构想:第一步:借鉴进化博弈论的思路,寻求加速深圳、珠海乃至澳门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路径依赖。第二步:在深港珠澳市场经济体制已趋成熟的前提下,于经济区域内固定三种货币的汇率。第三步:四个经济区域统一货币。往下理出第一步的分析思路。

2、加速深、珠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路径依赖。

进化博弈论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是近年经济学常用的博弈论的一个领域。传统的博弈论是分析当一个游戏者会给另一个游戏者的行动带来战略性影响的情况下,合理的游戏者会如何行动的理论 (Von Neumann 和 Morgenstern 1984)。进化的博弈论则是不假设游戏者的合理性,而运用进化的观点,分析游戏者会如何行动的理论 (Dwarkis, R 1989)。

从进化博弈看经济体制的进化,其基本结论是:经济体制是由历史的初期条件以及过去的环境变化过程、社会中的实验、政府的介入以及同异文化的接触等因素决定的。一种经济体制向更优均衡的经济体制的进化机制,至少可以列举三点:第一,社会中的创意和实验具有把一种经济体制转换为更优的均衡的经济体制的可能性;第二,通过政府的政策性介入,将人们在原经济体制下的行为转换到更优经济体制下的行为。第三,通过积极推进原经济体制的人们与更优经济体制人的交流,原体制下的习惯也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从进化博弈论的角度看,促进深、珠经济体制转机的路径依赖有:1) 深、珠两地个别经济主体所进行的创新革新,能通过学习和模仿向全经济区普及。2) 政府的介入及政府对革新、学习和模仿的协调。3) 通过与港、澳经济体制的接触来促进革新、学习和模仿。4) 任体制自由发展直至迎来悲剧性的结局,再从中探寻进化的方向。

【责任编辑:孟庆顺】

粤港合作发展老人服务问题

黎熙元 周静

【内容提要】近年,香港人口老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老人服务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香港政府为发展老人服务而投入的资源虽然越来越多,但与老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和社会舆论的期望之间仍然存在差距。如何在资源投入增幅有限的条件下使老人得到更好的照顾?本文根据广东和香港的发展状况,分析了粤港两地合作发展老人服务的问题,并认为这是一项两地互补互利的事业。

一、粤港两地合作发展老人服务的必要性

香港的安老制度不完善,有多方面的原因。近 20 年来香港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人口老化速度加快。而随着香港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人们的观念以及家庭制度有了很大变化,年轻人往往不愿意和老人同住,或者没有时间照顾老人。反之,由于生活习惯和观念不同,不少老人也不愿意与年轻人同住。过去,港英政府认为照顾老人是家庭的责任,提倡家居照顾老人,90 年代以后才开始制定发展老人服务的政策,积累的问题较多。1997 年通过执行强制性退休金计划,但退休金制度只能解决下一代人的养老问题,而现时的老人仍然只能通过政府的公共援助实现安老。

就香港目前的情况来看,为老人提供的居住单位及院舍比较缺乏,有很多老人仍然独居在环境恶劣的笼屋。由于笼屋特殊的结构及环境,屋主一般不允许老人在屋中做饭,如果老人要出外吃饭的话,所领取的综援金是不够用的。现在香港大约有 200 家老人中心,27 间老人服务中心,26 间老人日间护理中心,430 间私营安老院。香港政府资助的老人院大约有 8000 床位,有 7000 多的老人在轮候入住;私营老人院的环境虽然不理想,但仍有超过 22000 多老人在其中接受服务;提供长期照顾的护理安老院,现有 9600 多个床位,却有 17000 多老人在轮候^①。环境较好的房屋租金都很高;依靠捉襟见肘的综援金几乎不可能租用;而申请政府所提供的廉租公屋,则需要轮候多年。

要进一步扩大对老人的援助必将加大对财政的压力。目前,社会福利支出已占香港政府支出的 10% 左右,近年社会福利开支的增长速度已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香港历来是实行低税制以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的地区,财政扩张的允许幅度有限,因而仅依赖政府支出的扩大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取的。

从香港人口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根据 1996 年香港的人口金字塔^②,塔的上下两部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上半部分逐渐向顶部缩窄,而下半部分先是比较庞大,然后骤然缩小。这主要是由于香港向工业社会转型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表现在生育上面,即是出生率的下降、青少年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降低;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死亡率下降,这种变化的结果,是香港人口年龄的中位数由 1986 年的 28 岁上升到 1996 年的 34 岁,人口老龄化逐渐从底部老化向顶部老化过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金字塔中位凸出的部分会逐渐上升。大约在 20 年之后,进入老年的人数会激增,老年问题会更加突出。所以从长远考虑,现在就应该寻找解决的方法。

内地尤其是毗邻的广东地区是绝大部分香港老人的故乡,许多老人经常来往于两地探亲,而香港与内地之间在多方面存在合作发展老人服务的比较优势,如能进行区域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内地市场中的资源,则既能减轻香港政府的压力,也能让老人们享受更好的服务,安度晚年。

二、《长者定居广东省续领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前后

1996 年以前港英政府的规定并不允许无限期离港的老人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金。香港政府认为综援的经费来自于政府的一般收入,应该将其用于照顾居住在香港的老人的福利需要;而且综援金额为了切合受助人的需要,是根据香港特有的经济环境和生活费用而定的。另外,如果老人无限期离港,香港政府难以调查其真实的需要和经济状况,而且难以确定其是否仍符合资格领取综援,从而无法侦查多付的综援金的滥用情况。

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老人过去为香港的繁荣做出过贡献,不管其居住在哪,对其发放综援都是应

该的。香港的物价很高，政府发放的综援金对于老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迫于传媒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港英政府寻找新的出路，开始考虑和内地合作发展安老。在政府福利署 1996 年关于综援检讨报告中提出：“很多老人视中国大陆为家，希望退休以后到内地居住，安度晚年；此外，香港回归以后，中国内地应有别于其他地区”，这一检讨结论推动了《长者定居广东省续领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的通过。

根据《计划》，选择在广东省长期居住的老人可以继续申请享受综援，其“符合申请资格”是指，除需要符合综援计划规定的经济状况外，还必须是香港的永久居民，在香港居住最少七年，年龄在 60 岁以上，而且，在申请‘长者定居广东省综援’之前，已连续领取综援金达三年。（在这三年内，如果曾经停止领取综援金，以合共不超过 30 天为限。）按此计划，离港在内地定居的老人必须香港的银行开户存综援金，并在内地自行安排从上述户头收取综援金。但是，回内地定居的老人不能获取特别津贴（包括医疗费用），只能获取一般标准金额和长期个案补助金。据此，返内地定居的老人每月获取综援金 2187 元。

计划出来后，香港红十字会和多家银行（中国银行，东亚银行，汇丰银行）立即做出反应。香港红十字会提出为申请者提供复核及调查长者移居后的生活情况，处理申请人查询及更改资料以及特别护送返港等三项服务；而各家银行则承诺为申请者提供优惠的服务，如中国银行对申请人免收手续费，只收取每次的邮费 30 元或电汇 100 元^③。

香港舆论界则对这一计划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对两地都有利。大批的老人回乡，成了医疗、交通、住房及老人院服务的消费者，能为内地创造不少就业机会，带动经济的发展。而香港政府也可以节省为提供上述服务而支付的津贴。但也有评论认为这是一个不完善的计划。

三、粤港两地合作发展安老的可行性

广东与香港毗邻，两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大；语言环境、饮食习惯以及民风民俗等方面都相似，老人若返回内地定居，不会产生对周围的环境过于排斥，也不会有背井离乡的感觉。况且，很多香港的老人都是祖籍广东，有很多老人会因为落叶归根而选择回乡定居。两个社会的相同性有利于安老服务的合作发展，而合作更大的优势还在于二者之间的差异。

首先是价格的差异。香港的物价要比广东高得

多。香港的报纸曾经刊登过这样的情形：一些老人抱怨香港政府给的综援金太少了，一个月两三千元不足以支付日常需要。按广东省现在的物价情况，每月两三千日子却可以过得比较宽裕了。两地物价的差别尤其表现在住房方面，香港房屋的租金非常高，即使租住公屋，月租金都要 900 元左右，扣除这一费用之后，综援金就所剩不多了。老人回广东省定居，如果是租住房子，面积较小的每月 300 - 400 元即可；如果是入住老人院，一般每月交费 600 - 800 元，不能自理的老人每月则要 1000 - 1200 元^④，已包含了住宿、膳食、护理等费用。因而，相比起来，两三千港元在广东省就实用得多，在解决了食宿问题后，老人仍有较多的节余可用于生活的其它方面。

再就是资源的差异。几年前提出房改计划后，广东省的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可是，房改迟迟不到最后期限，因而很多单位对商品房仍持观望态度，使得房地产的出售不象预计的那样火热。最近政府已明确表示房改已到最后期限，单位的集团购买很可能会给房地产商造成巨大的出货机会。但由于广东省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存在着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所以仍然存在着商家独守空置房、闲置地皮的情况。如果此时粤港两地能就老人服务进行合作，则可通过这一计划的实施，促使广东的商家投资于这一领域，利用这些闲置的房地产发展民办老人服务。一些民营企业已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有兴趣。

近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开始在一些大城市出现。广东的投资者对这一社会需求十分敏感，1994 年就开始进军福利领域。以广州为例，广州市民政局颁布的《广州市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促成了民办老人院的蓬勃发展。1995 - 1997 年间，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等民间力量共办起了 11 所老人院^⑤。这批民办老人院以个人投资兴办为主，硬件设施起点较高，服务质量比较好，入住的老人及家属普遍对其护理工作比较满意。可是由于内地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所以老人们普遍觉得老人院的收费偏高。经有关机构调查，在广州，70% 以上的人认可的老人院的收费是：能自理的老人每月 500 - 600 元，不能自理的老人每月 800 - 900 元；而实际上的收费是：能自理的老人每月 600 - 800 元，不能自理的老人每月 1000 - 1200 元^⑥。由于实际价格偏高，所以老人院时常住不满，老人服务的潜在需求不能转化成为有效需求。而老人服务的其它领域，诸如老人家政服务、保健服务、咨询服务以及文化服务等等，则由于没有形成专业服务或是

老人承担不起服务费用,而未能形成明显的需求。因而,广州一些民办的老人服务中心在开始时都出现亏损。现在国内的舆论也提出要按“人口老化”的趋势发展老龄产业。从理论上来说,发展老龄产业的前景是好的。

如果粤港之间能进行合作,将香港一部分的老人服务需求转移过来,首先,这些领港府综援金的老人相对内地来说比较有钱,而且又有服务的需求,将成为带动老龄产业发展的诱导商机。其次,由于香港的老人服务较内地发展得更全面,有老人日间护理中心、家务助理服务、度假娱乐服务等等。

在商人大量投资这一领域后,这一新兴行业的发展必将需要很多人从事管理服务、医疗保健服务、心理咨询服务、日间护理服务、膳食服务以及家政服务等等,从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于缓解内地的就业压力,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四、合作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粤港两地合作发展安老从其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是必要的、可行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不注意和解决的。

1. 两地政府的共同推动与互相配合

《长者定居广东省续领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自1996年通过以来已经实施近四年,据香港社会福利署的资料,每年这类返乡养老继续申请政府综援金的个案并不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香港政府宣传不足,其他制度不配合,以及粤港两地相关机构不协调造成的。计划实施近四年,香港的老人对此计划的了解仍然不多,对申请程度更陌生,而且申请返粤养老形式的综援金在实际收入上比在香港养老形式少,所以老人多不愿选择。该计划是当时港英政府通过的,特区政府成立后没有再对之进行检讨,也没有就这类计划的实施问题与广东政府深入讨论。缺乏政府的推动与配合,两地合作发展安老就难以展开。虽然中山、东莞等地方曾对这类项目表示兴趣,但至今仍没有实质启动。因此,两地政府的共同推动与互相配合,对两地共同发展安老事业是非常重要的。

2. 解决老人的医疗问题

这一计划公布后,舆论对其最大的批评在于这一计划中发放给返粤定居的老人的综援金“不包括医疗费用”,老人一般身体状况较差,所以医疗费用是其日常开支中最大的一块,如果政府不负责这一块的话,则使得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大大下降。其

实,虽然粤港两地物价差别较大,但由于返广东定居的老人并不纳入内地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统筹的范围之内,所以香港返回内地定居的老人的医疗费用无论巨细都得自己负责,再加上国内的处方权、售药权等尚未规范,医疗费用参差不齐,因而,若老人遇上大病,每月两千多元的综援金将不足以支付。对此,香港政府如果可以考虑对返回广东省定居的老人发放的综援助金不扣除医疗费用等特别津贴,而是全额发放,将有助于老人解决这一问题。与政府发给在香港定居老人的综援金数目相比,香港政府的开支并没有增大。

3. 规范行业管理

根据计划实施以后的个案跟踪调查,返乡的老人由于环境不熟而被人骗钱,或是回乡下居住与乡人不和的事情时有发生。因而,在这一合作计划中,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对老人定居后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这种调查机构不应由内地的政府单方设立,因为香港移居内地的老人并不在内地社会保障统筹的范围之内。比较妥当的作法是由香港政府在内地委托一个中介机构对老人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以保证返内地定居的老人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内地也应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对与养老有关的行业进行必要的规范,不但保障香港返乡老人的利益,也保障本地老人的利益。

综上所述,由于粤港之间的物价差异,而且香港老人的综援金相当于内地平均工资的两倍,因而老人若在广东省定居,有限的综援金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可以刺激内地商家利用闲置的房产、地皮、劳动力,发展内地的老龄产业,是一种对两地都有利的发展方式。从特首董建华关于把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大都会的新施政方略来看,特区政府重新把施政的目标放在经济发展而不是福利发展上,但与此同时安老问题也是特区政府所不能忽视的问题,这样,香港政府将迫切地需要寻找一种所需资源相对节省的安老方式。粤港两地合作发展安老服务,值得两地政府深入探讨和推动。

注:

①《信报》,1997年5月22日

②参见香港《1996年中期人口统计简要报告》。

③《香港经济日报》,1997年3月26日。

④⑤⑥数据来源:《社会保障制度》,1999(9)。

【责任编辑:许锡挥】

香港与澳门固定汇率制度的宏观经济学比较

张继东

【内容提要】固定汇率制度是香港与澳门的基本金融制度，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对政府调控货币供应量能力的影响较小，这得益于香港的货币外生性没有澳门严重，港币在香港市场上的占有率大大高于澳门币在澳门市场的占有率，及香港外汇基金通过新会计安排、外汇基金票据、流动资金调节机制 3 项改革措施，明显加强了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近期香港要维护联汇制，而澳门或许应该放弃与港币挂钩的联汇制，转而与人民币挂钩，这样澳门特区政府将会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实行较为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是符合澳门的自身利益。

一、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与澳门最基本的金融制度

香港于 1993 年 10 月实行联系汇率，官方汇率定于 1 美元等于 7.8 港元，港元追随美元一起浮动，港币由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发行。发钞银行在发行港币时，首先必须向外汇基金缴付折算为美元的多种外汇换取负债证，然后才能发行与缴付外汇同值的港钞，港币发行有了十足的外汇准备。

1976 年《澳门组织章程》颁布，澳门地区获得行政和财政自治权。1977 年 4 月 7 日，澳门币放弃与士姑度的联系机制，改与港元挂钩，汇率为 107.5 澳门币兑 100 港币，上下浮动不超过一个百分点，以后汇率曾经多次调整，之后稳定于买入价 103.1 澳门币兑 100 港币，卖出价 102.9 澳门币兑 100 港币。由于这个时期港元是采用浮动的汇率制度，故澳门币与外国货币的兑换价也自由浮动，到了 1983 年 10 月 17 日以后，随着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度的建立，澳门币自动跟随港元与美元挂钩。

二、港澳地区固定汇率制度的共性分析

1. 有利方面：

(1) 香港和澳门都是小岛型经济，具备了小型开放经济的典型特征，即缺乏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大量依赖进口，外资在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本地经济增长要受许多不可控的外部因素的制约。

(2) 美元是香港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为了减少国际贸易中的外汇风险，缔结长期贸易契约和集中国际资本，而采取盯住美元稳定汇率的办法，是

具有现实经济价值的。

(3)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和国际货币的重要地位是已经确立了的，美元币值虽然也有波动，但它有国内经济的强大支持，不同于 60 年代的英国经济，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在可预见未来，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还不大可能发生动摇。

(4) 稳定货币，稳定金融秩序。联系汇率制以事实证明它具有极强的承受政治冲击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冲击的能力，在数次政治风波和国际金融动荡中保持了极大的稳定性。1995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 年东南亚金融风波等多次冲击中，香港的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发生巨大震荡，唯独港元对美元汇率安如磐石。澳门的情况也很相象，由于澳门币的发行量太小，不能承担巨大的外风险，需要寻找一种更强大的货币作为后盾，港元正是符合条件的货币中最合适的。

2. 不利方面：失去货币自主权，无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

(1) 利率失去了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

由于固定汇率制度的实行，港元利率政策须与美元保持一致，而澳门的利率政策，则必须与美国和香港保持一致的步伐，所以无法运用货币政策来收紧或放松货币的流通量。从理论上讲，孟得乐·费列明 (Mundell - Fleming Model) 模型告诉我们，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效应不大。80 年代中至 90 年代初，美国因为经济衰退，不断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香港当时经济已经过热，本应浚加息，但因固定汇率制而不得不跟随美元降息，结果经济过热明显，地产、股票市场高涨，形成泡沫经济，而澳门同期也减低利率使澳门的实质利率为负

* 注：本论文得到陈丽君导师的指导

值,很多市民把资金转移到房地产,股票等金融投资领域,资本性投资(实业投资)的金额减少,发展工商业的长期贷款不足,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同时金融投资又导致了泡沫经济。

(2) 容易造成汇价扭曲,影响投资效率

从贸易条件的角度,固定汇率制度容易造成汇价的扭曲,澳门从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每年的经济增长都是两位数,所以一直被认为澳门币的汇价低估,这虽然对出口有利,但是澳门是一个完全依赖进口的地区,必然导致进口价格偏高的情况,产生输入型通胀,而且影响投资的因素有利率,储蓄率,贸易条件等。一个地区的贸易条件下降,即进口商品价格相对上升,必然导致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价格上升,一方面不利于大量引入机器设备和新技术一方面,投资回报率降低,导致投资额下降,使地区的经济成长放缓。虽然低利率可以刺激私营部门的投资,但澳门的外来投资很少,投资来源主要是储蓄。低利率令储蓄意愿降低。

(3) 造成通胀问题

一般来说,由于利率政策不自由,不能运用提高利率的方法来打击通胀,这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至于输入型通胀问题,这也是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不良后果。尤其是对香港、澳门这样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而言。国外高通胀的恶果通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大量输入,直接提高了香港、澳门的通胀水平。

三、香港与澳门联系汇率制的差别

1. 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对政府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较小

香港的货币外生性没有澳门严重,港币在香港市场上的占有率大大高于澳门币在澳门市场的占有率,并且香港的外汇基金通过如下的改革措施,明显加强了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改革措施1.新会计安排(New Accounting Arrangement)

联汇制实施初期,汇丰银行担当结算银行,外汇基金和其它银行都要在其开立帐户,它们的交易通过这些帐户结算。出于外汇基金抛售美元或借入港币并不会影响银行同业港元的减少,同业拆息难以上升,因此干预效果不大。鉴于此,1988年7月外汇基金与汇丰银行达成协议,实行新会计安排,改变以往的结算制度。根据这一安排,汇丰银行必须使银行体系的净结算额不出现赤字,和使净结算额与其在外汇基金的结余保持一致。这一安排的实质是不仅使外汇基金成为银行体系的最后结算行,而且能够通过调节汇丰银行帐户资金余额。

调节整个银行系统的资金供应水平,最终达到影响汇率水平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为外汇基金及1993年成立的金融管理局对货币市场的操作提供了条件。外汇基金通过控制汇丰银行的帐户余额,可以调节整个银行体系的资金供应情况。新会计安排类似于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政策。

改革措施2. 外汇基金票据(Foreign Exchange Fund Notes)

为了稳定港元汇率,维持联汇制,香港政府于1990年3月13日首次推行外汇基金票据外汇基金票据是港府以外汇基金名义,发行的短期无抵押票据,其性质与其他国家发行的短期国库券性质相同。

外汇基金为了调节港元供应水平及维持港元联汇制,除了在发行市场发行外汇基金票据之外,也通过外汇基金票据市场庄家(Market-Makers)买卖外汇票据。外汇基金通过向银行同业买入(卖出)外汇基金票据,可适度放松(收紧)港元银根,降低(提高)港元利率,从而稳定港元汇率。其交易结算仍通过汇丰银行在外汇基金的帐户进行。发行外汇基金票据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具成本效益的金融政策工具,用在左右银行同业流动资金水平,达到维持汇率稳定的目的”。与新会计安排比较而言,外汇基金票据发行可避免市场的剧烈震荡和减少干预成本,可起到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效果。

改革措施3. 流动资金调节机制(Liquidity Adjustment Facility, LAF)

为了强化政府干预资金市场的能力,经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和调整后,港府于1992年6月又推出了维持联汇制的另一手段——流动资金调节机制,该机制主要规定:第1,在每天港元同业市场休市之后,银行公会会员单位发现资金头寸有多余,可将多余金额存入外汇基金,以拆入利率获取外汇基金支付的利息。第2,如果会员单位发现头寸不足,而结算帐户余额为负数时,可与外汇基金管理当局签订“售卖与回购规定”,出售价与购回价的差额就是外汇基金拆出资金的利率收入。外汇基金可凭此作为调节资金水平和利率的工具。流动资金调节机制首先改变过去香港同业资金受大银行操纵的局面,平抑了银行同业隔夜拆息的波动,有助于汇率的稳定;其次,取代了政府过去主要通过香港银行公会调整利息来反映官方利率意图的做法,使得官方利率政策的执行更加迅速、及时和明确。最后,流动调节机制实质相当于中央银行的再贴现机

香港与

水平, 最终达到影响
这为外汇基金及
市场的操作提供
的帐户余额, 按
新会计准则
change

· 67 ·

金对银行同
金融市场体
度, 而不
元汇率
和流动
三大传
大政
以资
利率影响的投
新的投资, 主要是普通的制
等的投资; 而自发投资与利率没有关系, 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直接投资意愿。在现今的社会中, 高科技的投资明显是属于自发投资的, 因为一旦成功, 高科技的回报率是银行的贷款利率的成百上千倍, 而且在投资的初期, 相比普通的制造业而言, 资金的投入量也不大, 因此高科技的投资与利率的关系不大, 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投资项目。在这方面, 香港目前正决定建立数码港和中药港, 为香港整个经济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机会。

2. 固定汇率制对澳门尤其不利

(1) 澳门商品、货币市场的单独分析

澳门金融市场不发达, 没有股票市场, 金融体系规模小, 尤其是近几年来, 金融市场稳定, 84 年到 91 年这 8 年中, M2 是初期的 5.014 倍, 年增长率为 50.18%, M1 是初期的 6.325 倍, 年增长率为 66.9%, 92 年到 98 年这 7 年中, M2 是初期的 1.628 倍, 年增长率为 8.97%, M1 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了 0.124 倍, 是初期的 0.876 倍, 年增长率为负 1.77%,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货币市场基本上没有大的波动。

相比之下, 90 年代商品市场有较大的波动, IS 曲线有明显的移动, IS 曲线有明显的移动原因如下:

第 1. C 下降, 就是消费数量的减少, 由于消费信心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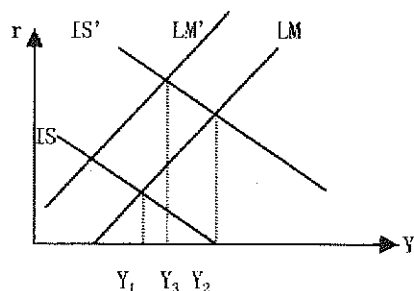
第 2. NX 下降, 因为制造业本身的原因 (数量少, 且竞争力弱), 加上配额的原因, 使出口受阻, 贸易顺差减少。

第 3. 财富效应: 当财富增回时, IS 右移, LM 左移。相比较而言, IS 的变动大于 LM。具体分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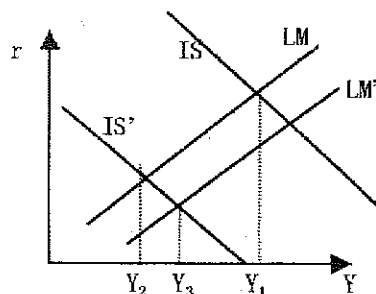
IS: 曲线的位置取决于自发支出水平, 它的构成包括 $C + I + NX + cTR - cTA$, 自发支出水平越大,

IS 越向右扩张。财富增加时, C 变大, I 变大, G 变大, NX 变化不确定 (Y 变大, 一方面, 由于进口值 $= e * P_f * Q(P, P_f, Y, e)$, $\partial Q / \partial Y > 0$, Y 变大导致进口增加, 出口值 $= P * X(P, P_f, Y_f, e)$, 资本净流入 $CF(i = i_f)$, 总之, 净出口 $NX = P * X(P, P_f, Y_f, e) - e * P_f * Q(P, P_f, Y, e) + CF(i - i_f)$, Y 变大导致 NX 下降。如果从另一机制来分析, 根据汇率的决定理论, 短期内汇率上升, 既本国货币贬值, 这在正常情况下, 会使出口增加, 如单纯从理论上比较, 不能判断 NX 的情况), 总之 Y 变大、AD 变大, IS 右移。

LM: 当财富增加时, 货币需求变大, 具体机制是: 从上面的分析知道, Y 变大, $K(Y)$ 变大, L 变大, 货币需求增加, 均衡利息率上升, 同时, 如果把财富效应分离出来, 得到新的 LM 函数: $M/P = K(y) + H(i) + W(v)$, $v = \text{value of assets}$, W 表示财富效应引致的货币需求, $W' > 0$, 当财富增加时, 既 v 变大, 因为 $W' > 0$, W 变大, 在 M 不变的情况下, K 或者 H 变小, 因为 $K' > 0$, $H' < 0$, 导致 r 变大, Y 变小。上面两种情况都会使 LM 左移, 见图例



IS 右移, 使均衡产出水平, 从 Y_1 上升到 Y_2 。LM 左移, 使均衡产出水平, 从 Y_2 下降到 Y_3 。总之, 均衡产出水平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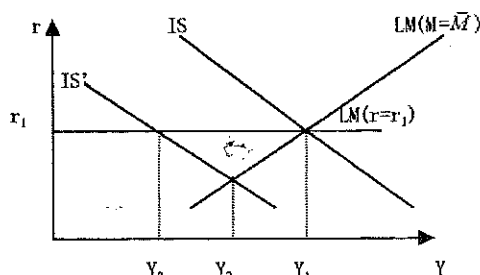


联系澳门, 90 年代以来, 房地产市场的大滑坡, 使人们拥有的财富减少, 导致自发支出水平下降, 情况与上面相反, IS 左移, Y 减少, 原本 LM 右移, 可以挽回部分 Y, 但是由于利率固定, 不仅不能可以挽回部分 Y, 反而是下降的更加厉害 (内容见下文分析)。

第 4. 其他自发支出的部分, 例如投资 I 的减少, 政府的转移支付的 (TR) 减少, 政府的税收收入 (TA) 的增加等。

(2) 在 ISLM 总体模型的图形中表示澳门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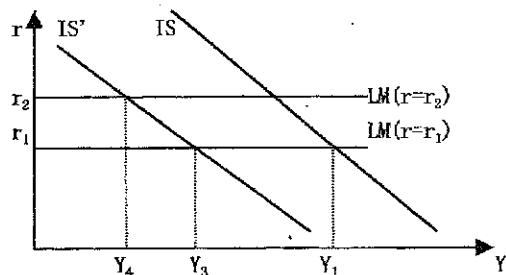
总体上, IS 左移, LM 不变 (忽略财富效应对 LM 的影响)



LM 曲线为 $LM (M = \bar{M})$, 当财富减少时, IS 左移到 IS' 位置均衡产出水平, 从 Y_2 下降到 Y_3 。结果是产出量 (Y) 下降, 利息率下降, 这种分析是基于一个完整的大国经济上的, 考虑到澳门是微型经济体系, 且对外的联系多, 依存度大, 尤其是澳门的利息率受外部控制, 表现为外生变量, 以上的分析应该做如下的修改。

第 1, 在给定的利息率下, LM 曲线为 $LM (M = \bar{M})$, 当 IS 左移到 IS' 位置时, 均衡产出水平从 Y_1 下降到 Y_3 , 产出量 Y 下降的幅度更大 (见上图), 这便是今天澳门的真实情况。

第 2, 如果利息率随外部走高 (例如美联储加息), 港元利率也随之走高, 迫使澳门币的利率提高), 更是雪上加霜, 见图



由图可知, 如果利率从 r_1 上升到 r_2 , 均衡产出水平从 Y_3 继续下降到 Y_4 。

(3) 具体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措施

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具体的实施方案是, 当经济衰退时, IS 曲线向左移动, 在给定的利息率下, 均衡产出水平从 Y_1 下降到 Y_3 , (见图 5), 这时政府可以扩大澳门币的投入, 在其它货币, 主要是港币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M 增加, 使得澳门币的利率下降, 刺激投资, IS 曲线重新向右移动, 带动产

出量 Y 的增加, 即达到了恢复经济的目的。但是这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只适用于短期, 从长期的利率决定来看, 澳门币的市场利率必然与香港, 间接与美国走势保持一致, 动态的分析如下: 当 M 增加, 使得澳门币的利率下降保持了一段时间后, 由于澳门的资金可以自由流动, 在澳门币的利率低于香港, 美国的利率的情况下, 资金必然会流出澳门, 当实行浮动汇率制时, 澳门币对港币或美元的价值会上升, 由于人们以一定量的澳门币可以换得的港币或美元不断减少, 从而使资金的流出逐渐减少, 最终停止, 且保持较低的利率。在实行联系汇率时,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由于澳门币对港币或美元的价值不会上升, 一定量的澳门币, 人们可以换得的港币或美元并不减少, 从而使资金的流出一直进行下去, 直到整个社会的货币量 M 减少, 导致利率回升, 当澳门币的利率等于香港, 美国的利率的情况时, 资金的流动才最终停止, 但一个最大的后果是利率又恢复了以前的较高的状态。

由此可见, 联系汇率制是最终的决定条件, 如果联系汇率制不废除, 所有政府扶持经济的努力都是枉然。

四、港澳地区固定汇率制度的前景展望

1. 近期香港要维护联汇制

在金融风暴刚刚过去的短期内, 我们仍应坚定对联汇制的信心。因为这种汇率制仍是目前最好的汇率安排。但是从长期看, 香港应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 反映自身经济实力并且有更多自主权的汇率安排。

2. 澳门放弃与港币挂钩的联汇制的前景展望

固定汇率制度, 使得澳门币失去制定自己货币政策的主动性, 成了港币的附属货币, 其情况与港币和美元间的关系十分相似。但澳门币的供应量呈现多元性和内生性等特殊现象, 使澳门固定汇率制尤其不利, 但以目前的发展趋势, 在未来的短时间内, 不会有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澳门的影响比香港更大, 而且其货币又符合国际流通的要求, 所以, 短时期内汇率制度不会改变。另外, 如果按照最适量通货区的传统分析也可以知道港元远较其他货币更适合作为澳门币的挂钩货币。如果可能的话, 澳门仿照香港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或许可以减少固定汇率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主要取决于澳门经济今后的发展规模和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各界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进展和变革的决心。

【责任编辑: 多天】

新时期珠澳经济互补合作再认识^{*①}

邓咏莲

【内容提要】1999 年 1 月在珠海召开的“粤澳关系研讨会”上，我们曾对珠澳经济互补合作关系提出过思考，主要认为珠海、澳门在跨世纪的发展中，双方应当冰释前嫌，重归好合，进一步拓展具有时代特色的互补互利的珠澳合作。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新时期赋予珠澳互补合作以全新的形式和内容。据此，我们对有关珠澳互补合作中基建、旅游业等问题，提出进一步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国际化、多元化以及竞争日趋激烈，建立区域性合作组织，实现地区之间优势互补，已成为发展的潮流。我国在 80 年代初建立深圳、珠海等第一批经济特区，就是为了利用它们分别毗邻香港、澳门的地理优势，达到连通内地与港澳以至国际的目的。时至今天，深港合作取得了瞩目成果。

澳门与珠海的经贸关系也日趋紧密。据有关资料显示，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 1978 年至 1998 年 10 月，澳门在珠海投资项目共达 1779 项，占珠海全市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总数的 22.3%；同时期珠海实际利用澳门的外资额达到 7.576 亿美元，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12.3%^②。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珠海澳门之间的互补合作尽管有新发展，但与深港互补合作相比，珠澳合作不尽人意，不仅互助互利的目的没有达到，相反，还出现了一些重复建设，不协调的问题。

一、珠澳合作中的若干问题

1. 大型基建协调不足

澳门自由港经济决定其政府的经济影响力较弱，缺乏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策略，一直存在“小而全”、自成系统的思想。珠海产业与基础设施的迅猛发展，也忽略了在规划上作为区域联动发展的必要衔接与协调，加上珠三角西部各市均希望通过加快本市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使自己成为珠三角西部地区的龙头或中心城市，于是出现恶性竞争的情况，酿成了大型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浪费资源。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澳门和珠海各建大型机场、赛车场，还各自筹划建设大型港口、跨海大桥等等。

珠海和澳门各有按照国际大型机构的标准兴建的机场。由于机场和航空公司都是高成本进出的行

业，有相距不到 24 公里，人口不足 120 万的两个城市，各自修建一个国际大型机场，机场的规模收益肯定难以达到，而且来自广州白云、深圳、香港三大机场的竞争压力也很大。珠海机场的航班次数、客流量都远远达不到预期标准，处于亏损状态，澳门航空公司由于实行“一机到底，换航班号不换机”的方式实现了两岸的间接直航，吸引了大批台湾旅客，但是澳航的这种客源高度集中情况也有很大经营风险。因此，客观上来说，珠海机场与澳门机场，珠航与澳航已形成“合则两利，争则两伤”的态势。

在港口方面，澳门由于沿海水浅，一直缺乏一个深水港口。最近在东边海域 10 公里处发现一深水槽，有 10 米深，有集团已计划在该处海面上建深水码头，停泊万吨世轮。珠海则有着长达 700 多千米的海岸线，具有建设大型深水港口的优良的自然条件，因此有学者提议，澳门回归后可向珠海租借附近的深水海岛如东南面的牛头岛建大型深水港，效益大投资小。目前珠海已在高栏岛建成两个 2 万吨级码头泊位和在建一个 5 万吨级码头和 10 万吨级煤炭中转泊位^③。澳门是建设自己的深水港，还是利用珠海港更为有利，或者两地合作另选良址建新的深水港，两地对此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

2. 澳门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由于澳门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不及香港，且内地各界对澳门的优势认识不足，认为澳门搞的是以赌业为主，内地是严厉禁止的，没什么好合作，因此产生“重香港，轻澳门”的倾向。珠海在产业方面的合作大部分是低层次的加工贸易，近年才开始向酒店、娱乐领域发展，澳门的优势并没有

* 注：本论文的写作得到周运源导师的指导

被充分利用。其实,澳门有三大功能优势可为珠海以及广东发展外向性经济充当窗口和桥梁作用:

首先,澳门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是独立关税区,实行国际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政策和低税制,对进出口货物免征关税,商品、资金、人员进出自由,所得补充税税率为 2%—15%,比香港还低。澳门工业方面也有一系列税收优惠。如能善用澳门的这些政策优势,实现互补,对促进珠海经济转型和增创经济新优势必将起有效作用。

其次,澳门与台湾关系密切。澳门国际机场通航后,澳台两地来往极为方便,且台湾当局对台商到澳门投资不设限制。例如台北中小企业银行就在 1997 年开设了澳门分行。

再次,澳门与欧盟及拉丁语系国家具有特殊的紧密联系。欧盟在投资、贸易、关税、信息、培训、环保等方面给予澳门充分照顾。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根据“一国两制”和澳门基本法的原则,澳门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继续保持和发展与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在经贸、金融、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联系与使用。这无疑为拓展新时期的珠澳互补合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机遇。此外,于 1992 年在澳门建立的欧洲资讯中心是目前为止唯一在欧洲以外设置的资讯中心,与全欧 250 个中心联网,肩负着沟通欧亚商贸信息的重任。亚洲地区的企业可以利用澳门作中介,同欧洲的投资者结成伙伴,以取得无息贷款,培训人员等方面的优惠待遇,使澳门具有推动欧洲、澳门、香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企业界之间的贸易合作功能。澳门还同巴西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同遍布欧、亚、非、美四大洲的八十多个同属拉丁语系的国家和地区有着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的联系。1997 年 2 月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成立,其目的是要为中国、亚太地区与拉丁语系世界建立联系桥梁。

以上这些政策优势与广泛的国际联系是澳门最为有利的优势。积极利用澳门与欧盟以及拉丁语系国家的特殊关系和通道,可以使广东在开拓欧盟和拉丁语系国家市场,实现外经贸市场多元化方面取得新突破。

3. 旅游业合作有待开拓

澳门是具有“东方蒙地卡罗”之称的亚洲最大的旅游博彩中心。澳门的产业结构以旅游业为主,并以博彩带动旅游。澳门的这种特殊产业广东不能搞,港台目前还没有,是澳门的独特的产业和优势。此外,澳门对许多国家和地区免签证,人员进

出自由,这些条件都很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但近年来,由于澳门博彩业经营手法过于单一、保守,加上澳门的治安差,缺乏旅游景点等原因,以及受到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赌业解禁后的激烈竞争,澳门的亚洲博彩中心地位正受到严重的挑战。因此,澳门必须开拓新的旅游优势。借鉴欧洲地中海的旅游半环、东南亚新马泰旅游三角等旅游协作区域的成功例子,建立“粤港澳旅游协作区”的想法日益受到各界的重视。

二、解决问题的几点对策

澳门回归祖国后,以往由于主权原因造成的两地合作障碍将消失,澳门特区政策应建立新的特区政府的形象,积极与珠海政府进行有效的协调。

珠澳两地相连,加强合作的重点应放在交通基本建设和海岛开发方面。而在工业、旅游业领域,则不应该局限于珠澳两地的合作,应更多地从粤港澳三地合作考虑,否则会失去大部分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所以,应把珠澳两地的合作看作是粤港澳经济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大型基建合作

大型基建合作对珠澳经济发展前景有重大影响。澳门虽有澳门虽有广泛的国际经贸联系,但它是微型经济体系,对内地及香港有很重的依赖性,却缺乏必要的对内联系通道;珠海虽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却未能充分显现,向外拓展能力和经济管理相对较差。珠澳一衣带水,合理的基建合作对两地的现有优势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机场、港口、公路、铁路、通讯建设等方面,必须加强合作,作好对接,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效益,使之成为密切联系两地的重要纽带。

对于两地机场的重复建设问题,现在最急需的是如何进行综合利用,而不是再继续相互指责和埋怨。首先,在国内干线航空的合作方面,由于澳门、珠海均有至北京的航线,将来国内恢复多种票价制度后,为避免两败俱伤,两地航空公司可考虑联营运作,防止票价战。其次,两地机场可进行互补定位。澳门航空公司立足于发展国际航线,珠海航空公司立足国内航线,完善国内干线、支线航空网络。这可为两地之间的合作拓展更大的空间。合作模式可以是两地开展旅客连程飞行。由澳航提供国际、台湾旅客,珠海转运至内地;珠海提供国内旅客,澳航转运国际、台湾。目前这种合作的最大困难在于澳门机场与珠海机场如何联接。珠澳两地政府可合作在两地机场开设中转旅客的特殊通道,例如开通两机场间的水上、公路高速巴士,在海

关、边检上给予特殊安排,完善保险、货运体制等。第三,由于两地航空公司都引进空中客车飞机系列,在航材合作上具有很大潜力,可签订航材使用协议,两地互相补充航材,减少重复购置,综上所述,两地的航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合作,把重复建设转化为规模优势,形成双赢局面。

在其它大型基础建设方面,两地要吸取机场建设的教训,认清双方的利益必须在相互协调中才能达到最大化。在海运方面,随着香港货运业务的饱和,而澳门具有转运出口的货物成本比香港低15%的价格优势,以及与内地陆路交通不断完善,澳门要重新成为贸易和航运中转港,已具备一些有利的条件。珠澳双方必须在深水港的选址和建造方案方面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作好两地之间的保税区、联系通道等工作,并注意与香港等邻近地区的港口协调好,避免恶性竞争,还要争取内地的大力支持,吸引到足够的货运量,保证足够的经济规模来维持一个大型深水港的运作。因此,通过港口合作,珠澳可共同扩展海运业务,争取成为珠三角西部的区域性的贸易和航运中心。

在陆路交通方面,多项大型基建工程已开始动工。例如北京至珠海的京珠高速公司的广东段在澳门回归前开通,连接广州、茂名、佛山至珠海的广珠铁路也在筹建中。澳门需要分别兴建对接工程将这两大纵贯南北及沟通西部的交通干线引入。目前有些接驳工程正在进行,其中珠澳共建的连接澳门路环和珠海横琴岛的莲花大桥,已于1999年12月澳门回归前建成,珠海也在加紧完成横琴至湾仔的大桥。这样,澳门通过这两条大桥可以接驳京珠高速公路直达北京。此外,对于珠海与澳门接壤的拱北海关大楼,澳门也须相应的增加关卡的出入境通道和设施,以适应回归后交通流量增加的需要。这些基建工程完成后,澳门与内地之间缺乏完善交通网络的问题得以解决,对澳门和珠海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必将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2. 旅游业合作

随着澳门与内地的交通联系越来越完善,珠澳以及粤港澳旅游业合作将得到更大的发展。旅游合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发挥各地的优势。澳门旅游最大特点是博彩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珠海及临近珠三角城市旅游则以自然景观、水乡风土人情为主,再与香港的国际大都市现代景观相配合,形成一个“粤港澳大旅游区”,必将大大提高珠江三角洲旅游区的吸引力与竞争力,成为亚太地区的旅游热点。

珠澳旅游合作的重点应是为旅游业合作创造必要的条件。针对澳门的治安情况,珠澳两地应合力打击黑社会,改善澳门社会治安状况。其次是改革口岸管理体制。一方面,珠海口岸各检查单位要借鉴深圳口岸改革的成果,在口岸通道逐步实行边检管人、海关管物的查检监管模式。口岸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体制,加快计算机在口岸查检监管中的应用;一方面,加强珠澳口岸之间简化查检环节与手续的合作,分步延长通关时间,创造条件实现出入境旅客单边验放。再次,珠澳必须在机场、公路、铁路和大桥等基建工程上充分协调,为两地旅游业合作在交通上扫清障碍。最后,还应在增加旅游景点,增强对观光旅游者的吸引力上多做工作。

在增建澳门旅游设施方面,可考虑建葡萄牙特色小镇等能体现澳门文化特色的旅游景点。澳门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其文化具有浓厚的拉丁色彩,在语言、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和饮食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尤其在建筑方面蕴含着浓郁的拉丁风格和中国传统风格。此外,还留下了大量的人文景物,如妈祖庙、大三巴牌坊、主教山教堂、澳督府、屋村博物馆、17世纪初兴建的大炮台城堡等。这些都是澳门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决定了澳门旅游业的文化特色。珠澳还可合作把横琴岛建成“国际特别旅游区”。这种定位最有利于珠澳两地的优势互补,也特别有利于拓展澳门经济空间。横琴“国际特别旅游区”是以旅游业发展为龙头,综合发展商贸、饮食、金融、房地产等产业,突出以“中西文化交汇”为主题,向度假、休闲、娱乐、会展、购物等全方位发展。要办好“国际特别旅游区”,必须对人员的进出实际特殊的监管政策,如实行方便外国国内旅客出入横琴岛的口岸管理政策,充分体现其开放度更高、按国际惯例运作的国际性特点。同时给旅游产业开发、旅游产品经营等方面以特殊优惠,以吸引国际性大型旅游项目落户。

注释:

①参阅曹翔,周运源《澳门回归与珠澳经济的互补合作》,(香港)《信报财经月刊》1999年第257期。

②引自邓开倾等著《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223-226页,珠海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③引自张晓君等文《珠澳优势浅析——珠澳经济合作研究(二)》,《珠海特区报》1999年3月14日

【责任编辑:许锡挥】

学术动态

一部论述香港对外经济关系的专著

本校郑佩玉教授主编、黎熙元副教授副主编的《香港对外经济关系发展与展望》一书，已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国家教委“八五”社科研究规划重点项目。著名经济学家童太林认为，这是一部全面研究香港对外经济关系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专著。他特别指出，该书“提出了‘九七’后香港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应如何充分发挥其特有的优势，进一步发展与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策略，还提出了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具有较高学术水平”。

《港澳与海峡两岸关系》出版

孟庆顺副教授近著《港澳与海峡两岸关系》是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专著将港澳问题与两岸关系联系加以考察，具有鲜明特色，是本校的一项可喜的学术成果。

论澳门·中国·欧盟关系

《澳门回归与中国和欧盟的经济关系》（由周运源主编，郑天祥、郭小东副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该书论述了澳门在中国和欧盟关系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并提出了今后继续发挥这些作用的可操作性对策。雷强教授评价此书时特别指出，作者提出，80年代我国错过一次进军欧盟的机会，今天机会又来，若不抓住时机，中国又将遭受巨大损失，“这话不假”。

两校合作的成果：《反思与前瞻》

最近在香港出版的《反思与前瞻——澳门回归暨港澳与内地关系探索》，是香港城市大学与我校合作项目的成果，由郑宇硕教授、陈广汉教授、周运源副教授主编，收集论文39篇，内容涉及回归后澳门经济发展战略、港澳经济关系、港澳与亚太经济关系以及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港澳的合作格局等。

《粤港澳关系研究丛书》即将出版

由我校李耕、许锡挥教授主持的《粤港澳关系研究》，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现已完成。该课题从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各方面进行探索，包含历史考察、现状分析及未来展望。成果将以丛书形式分《经济篇》、《社会篇》、《法律篇》、《文化篇》四册出版，作者有郑天祥、李萍、程信和、李伟民等20多位。

（佟憬）



中山大学主办的香港公共行政人员外事训练班于1983年
底在广州结业，学员参加了由该班教授主持的七门课程。